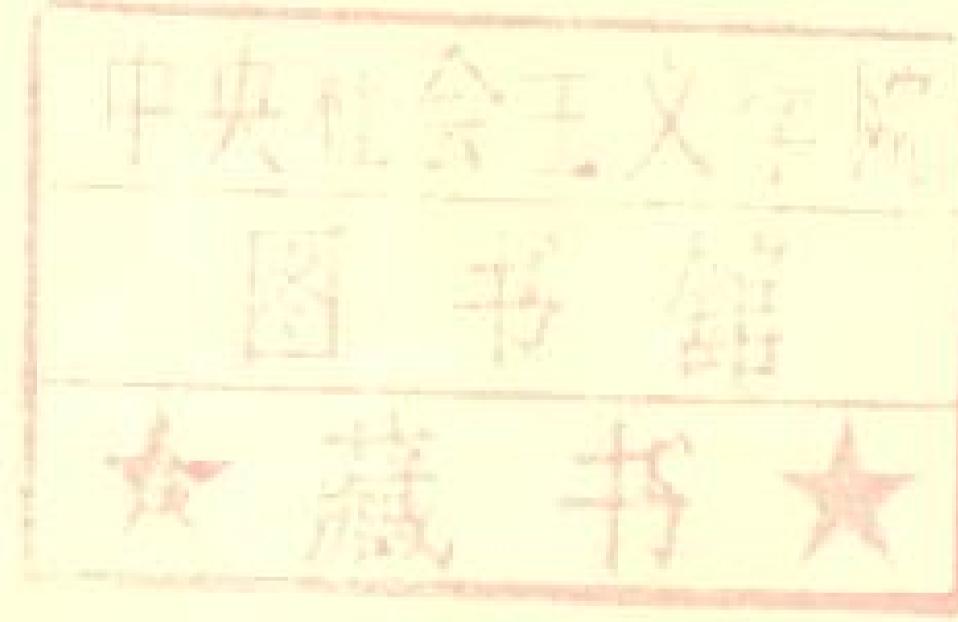


包尔汉选集



DI30/22

序 言

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同志，是一位国内外著名的维吾尔族政治家和学者。我同他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夕相识，至今已快四十年了。

过去，包尔汉同志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为新疆的和平解放曾经作出过不懈的努力。解放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新疆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胜利前进，贡献了自己的心力和智慧。他在从政之余还积极致力于著述，他撰写的回忆录《新疆五十年》、编纂的《维汉俄词典》和创作的剧本《火焰山的怒吼》等，在出版和上演以后，都曾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他还针对学术界和社会上流传的一些错误观点，撰写了《论阿古柏政权》等学术论文。

这本《包尔汉选集》，是包尔汉同志从事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的一部分记录。在这些作品中，他热情歌颂了各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团结、捍卫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热情赞颂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的巨大变化。他的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学术观点，曾经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得到全国和新疆各族人民的赞同和尊重。它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民族观，照亮了这位毕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兄弟民族政治家和学者所走过的道路。

人生七十古来稀。包尔汉同志已经九十多岁了。这位高龄的长者至今还不辞辛劳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接见各方同志的访问，而且还经常有文章问世。在他身上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特有的生

命不止奋斗不息的崇高品质，十分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在这本《包尔汉选集》付梓之际，谨志数语，以表敬佩之情，并祝包尔汉同志长寿、康乐，为各族人民贡献更多的余热！

邓力群

1988年1月6日

目 录

在新疆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会议上的讲话	(1)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2)
在新疆省暨乌鲁木齐市机关干部元旦团拜大会上的祝词	(5)
在新疆八一面粉厂开工典礼上的讲话	(7)
在慰问解放军代表团大会上的慰问词	(9)
在伊犁、塔城、阿勒泰哈萨克自治州筹备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	(12)
在新疆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15)
在新疆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的闭幕词	(18)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届人民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22)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26)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29)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32)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为纪念国庆而作	(36)
进一步加强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友爱团结合作	(38)

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40)
新疆各民族的团结在不断加强.....	(44)
亚非五国访问记.....	(49)
中近东各国人民对我国人民的友谊 ——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谈访问阿拉伯国家的观感	
.....	(59)
学习孙中山先生热爱祖国的精神.....	(64)
天山万里故乡行.....	(67)
和王震同志最初相识的日子.....	(76)
 “西伯利亚”名称的由来.....	(80)
关于新疆历史的若干问题.....	(90)
论阿古柏政权.....	(99)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在新疆的兴灭.....	(126)
在列强的觊觎下 ——抗战时期在新疆的一段往事	(133)
盛世才在新疆	(136)
汉语拼音方案的确定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的大喜事.....	(158)
民族语文工作的道路 ——在第二次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163)
我的希望 ——祝贺《新疆社会科学》创刊	(168)
《丝路游》创刊词.....	(170)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总论.....	(172)
 附录：我的自传.....	(193)
编后记.....	(196)

在新疆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新疆530万人民期待已久的、民族的、民主的、联合的省政府，今天已经正式成立了。今后应该实施的施政方针也决议通过了。这个施政方针与新疆有史以来的历次宣言、政策、施政纲领等等相比，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根本的不同。以往遭受压迫的本省人民也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自由和平等。我们的英明领导者毛泽东主席曾经说：“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我国各族人民在全人类面前踏上了光明的道路。中央人民政府及新疆人民把光荣的任务很信任地交给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誉。所以，为了完成我们所肩负的这一个光荣任务，就应该彻底执行今天所通过的施政方针，为实现人民、国家和领袖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的期望而奋斗！

不过，在执行这个施政方针之初，以及在完成这个施政方针的全部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还会有很多困难，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同志都能百分之百地执行自身所负担的责任，同时，在中央人民政府、英明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在西北五省军政领导者彭德怀主席和各位副主席领导下，我们的使命一定能圆满的、胜利的完成。因此，我希望各位同志，为执行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和我们目前的施政方针而共同努力。

（原载《新疆日报》1949年12月19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上的发言

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首先让我代表新疆13个民族的530万人民，向大会致以崇高的敬意与热忱的慰问！

这一次大会，我们听了毛主席的开幕词，刘副主席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各负责同志关于军事、财经、文教、法院等工作问题的报告。从这些报告中，我们明显的看出，我们的国家，在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后的短短8个月中，由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巩固了我们国家的基础，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这些事实，使得我们新疆各族人民感到异常的兴奋和无上的光荣！

很久以来，我们新疆各民族人民受尽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欺骗蹂躏。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挑拨离间，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过去的新疆，是充满了血泪的民族仇杀与民族压迫的牢狱！

但是，这个情况，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而改变了，从今以后，民族间的压迫和仇杀是一去不复返了，代替这种情况的新的民族关系，乃是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与友爱合作。

在过去，新疆的各族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与反动统治阶级的各种压迫，曾进行了许多次英勇的斗争。但由于当时没有正确的领导，没有坚强的组织，每次斗争都被反动统治阶级镇压下去

了，直到1944年在伊犁爆发的革命运动，在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取得了胜利，才形成了一支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力量。这个力量和七区人民的民主力量汇合在一起，配合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具有决定性的辉煌胜利之下，新疆的革命力量与全国的革命洪流相汇合，遂使本省获得了解放。

新疆的各族人民，从过去许多次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中知道：只有这一次的解放，才是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并且这种解放，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及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实现、巩固。

其次，对于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土地改革问题，我们认为不仅是解放农民的基本问题，并且也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因素之一。

至于在新疆什么时候实行土改，刘少奇副主席在土改问题报告中说：这要看各少数民族全部的工作情况与群众的觉悟程度如何，才能决定。这更是符合少数民族人民大众利益与照顾少数民族特殊情况的具体表现。我们代表新疆各族人民对新的土地改革法表示热烈的拥护，并努力为在新疆实行土改创造条件。

在两个月以前，当新疆人民听到，中苏两国签订在新疆创办开采石油和有色金属的两大公司与贸易协定的消息时，如同过节一样的高兴，因为这两大公司的创设，不仅将在发展本省经济、文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起很大的作用，并且在使新疆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区方面，也必然要起重大的作用。为此，本省13个民族530万人民谨向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和盟邦苏联斯大林大元帅表示诚挚的谢忱！

再次，新疆人民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在新疆的领事馆采取有效措施，因为他们一向扶助压迫我们的国民党反动派，妨害新疆人民与我们盟邦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并公开干

涉本省的内政，扶植并嗾使土匪破坏本省人民的和平生活。例如：美国前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即曾于去年九月间给予土匪乌斯满、贾尼木汗等以金钱援助，并鼓励这些匪徒及与他们在一起的白俄进行公开武装叛乱，反抗我人民政府，从而使人民生活受到极大损害。

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曾提到中央准备组织访问团访问西北，征询当地少数民族的意见。我们认为中央组织访问团前来西北，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一定会加强中央与西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与了解。我们在这里谨代表新疆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们新疆人民坚决执行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我们深深相信，中国的民族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共同纲领正确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一定能够获得彻底完满的解决。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决心和全中国的各族、各阶层人民一起，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周围，为坚决执行中央的一切号召，为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为使自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友爱合作大家庭中的优秀进步成员而奋斗！

新疆13个民族530万人民像爱护自己眼睛一般，热诚爱戴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的贤明领袖毛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境内各民族兄弟般的友爱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英明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大会的成功万岁！

（原载《新疆日报》1950年6月25日）

在新疆省暨乌鲁木齐市机关干部 元旦团拜大会上的祝词

1954年来到了！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胜利地度过了我国有计划经济建设的第一年——1953年。在新的一年开始的今天，首先让我敬祝毛主席身体健康，祝全体干部、全体同志、各族人民新年快乐，并预祝大家在今年的各项工作中取得更大胜利。

在去年，我们继续深入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基本上完成了全省农业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并顺利地开展了普选运动和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在农牧业和工业生产方面，我们获得了很大成就；我们的文教卫生等工作，也都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去年九月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后，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新的动力，使各项工作加速向前推进了一步。由于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全疆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各族人民的友谊团结也进一步加强了。一年来我们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各族人民和全体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汉族人民对各族人民兄弟般的援助下，在伟大友邦苏联的援助和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大力帮助下获得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二年，全疆各族人民要在1953年各方面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根据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结合本省具体情况，做好以下各项工作：

一、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积极地、稳步地开展农业生产互

助合作运动，兴修水利，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交通运输和内外贸易事业，办好地方性的中、小型工业，提高产品质量，适当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生活所需要的手工业。

二、继续完成普选工作和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

三、逐步地发展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积极培养各民族干部。

四、继续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争取朝鲜停战协定的彻底实施和争取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援助朝鲜人民进行恢复工作。

这些就是省人民政府今年所要进行的主要工作任务。

同志们！我们1954年的工作任务是很艰巨的，也是很光荣的，只要我们全体干部和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依照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紧密团结，加强集体领导，不骄不躁，永远保持谦虚和坚韧的精神，不断地克服前进中的阻碍和困难，我们是能无往而不胜的。

同志们！让我们为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原载《新疆日报》1954年1月3日）

在新疆八一面粉厂开工 典礼上的讲话

同志们：

新疆八一面粉厂今天举行开工典礼，这是我们新疆继乌鲁木齐电厂落成之后又建成开工的一个近代化工厂，它标志着我们新疆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正在为逐步实现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努力，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正在逐步地增长。在庆祝新疆八一面粉厂开工的时候，首先让我代表新疆省人民政府和全疆各族人民，向参加建厂的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同志、工人同志、技术人员，向全体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新疆解放前基本上是没有现代化工业的。解放后，在驻新疆人民解放军的艰苦努力下，在关内汉族工人兄弟的支援下，加上苏联友邦的援助，已陆续建设了许多近代化的工厂，满足了各族人民的一部分生产和生活需要，培养出了一大批各民族的工人兄弟，积累了一些工业建设的经验，从而为新疆逐步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新疆八一面粉厂建设过程中，大部分工程都是由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同志承担的。他们在工作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了不少困难。事实证明：驻新疆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部队，同时也是一支生产建设的主力军。

我们新疆和全国各地一样，将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在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向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学习。学习他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他

们努力建设祖国边疆的劳动热情，学习他们努力学习和克服困难的坚韧精神。让我们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新疆工业化而努力，为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努力。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原载《新疆日报》1954年2月11日）

在慰问解放军代表团 大会上的慰问词

亲爱的新疆军区代政治委员、各位副司令员、参谋长、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和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在1949年新疆宣布和平解放，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并和坚持三区革命的民族军及新疆起义部队会师，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新疆省人民政府以后，新疆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新疆解放后的四年中，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在冰天雪地、严寒酷暑中忍受着一切艰难困苦，肃清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支持的乌斯满等匪徒，维护了社会治安。

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帮助和各民族人民亲密团结、辛勤劳动下，经过一系列社会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恢复与发展了生产，使新疆的社会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现在，新疆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各族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友爱和睦的大家庭里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因此，让我代表新疆各族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解放军全体同志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礼！

同志们！今年我们的国家已进入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第二年。回顾一下新疆四年来的经济建设成就，将会更加鼓舞我们努力建设伟大祖国边疆的热情。

在农业生产战线上，1953年全疆的耕地面积较解放前增加了29%，产量增加了59.63%，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33%。参加互

助组、合作社的，1953年全疆已占农业生产总户数的30%强；农业生产合作社有10个。在水利建设方面，四年来共建设大小渠道2083条，大小型水库11处，可增灌面积430多万亩。在畜牧业生产方面，由于我们坚持执行了保护与发展畜牧业的政策，1953年牲畜较解放前增加了44.97%。解放前新疆根本没有现代化的工业，解放后在你们的大力协助、辛勤劳动和各族人民的热烈支持以及苏联的援助下，除了中苏合办的石油、金属两大公司外，先后兴建了发电厂、钢铁厂、纺织厂、机器厂、露天煤矿等13个近代化的厂矿。以1953年和解放前相比，工业产品总值比解放前增加了25倍（石油、金属两大公司除外）。培养了一批各民族工人和技术干部，积累了工业建设的经验。此外，在贸易、合作、交通运输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发展。

由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各族人民生活逐步得到了改善。新疆各族人民饮水思源，深刻地认识到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都是与你们的艰苦奋斗、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同志们！新疆是我们祖国的边疆，它和全国各地一样是有着无限发展前途的。它有占祖国六分之一的土地；有13个民族500多万勤劳勇敢的人民；有广大而肥沃的已耕地和未耕地，最宜于发展机械化和集体化农场。它有着很大的农牧业潜力。过去四年中，军队所经营的许多作物如水稻、棉花的产量，都创造了全国最高纪录。新疆生产的棉花，质量是最好的。新疆有着许多天然的良好的牧场和草场，最适于发展畜牧业。目前新疆的畜牧业，在全国的畜牧业中已占有很大的比重。今后我们的畜牧业将要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工业方面，新疆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铁路的向西修建，新疆将成为我们祖国重工业建设基地之一。

由于有了你们这一支保卫与建设新疆的力量，对增加新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将起着重大的保证作用。你们经营的社

社会主义性质的农场，不仅会帮助新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会在全国农业集体化道路上发挥它一定的作用。以上这些优越的条件，对促使我们新疆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有着巨大的作用。

亲爱的同志们！新疆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为了向你们——自己最亲爱的朋友和最可爱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慰问，在今后将以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支援你们，并将虚心学习你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建设祖国边疆的劳动热情。在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和你们一道为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而奋斗！

（原载《新疆日报》1954年3月10日）

在伊犁、塔城、阿勒泰哈萨克 自治州筹备委员会成立会 上的讲话

各位委员、各位代表、各位同志们：

今天，伊犁、塔城、阿勒泰哈萨克自治州筹备委员会成立座谈会召开了。首先让我代表新疆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委员会祝贺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

我们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根据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来讨论和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听取本省一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和通过伊犁、塔城、阿勒泰哈萨克自治州筹备委员会的人选，正式成立筹备委员会，以开展各项工作。

同志们！代表们！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在解放以前，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各少数民族残酷的压迫和剥削，造成了新疆各少数民族之间长期的互相歧视和互不信任，因而也阻碍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汉族人民和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兄弟般的帮助下，我们坚决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实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恢复和发展了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各民族间建立起平等友爱、互相团结的新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正在一天天地巩固和发展，从而为在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条件。

大家知道，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保证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从而进一步巩固我们伟大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够激发各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逐步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面貌；也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进一步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加强中央和边疆的联系，并且把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事业，进一步纳入我们伟大祖国有计划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轨道，从而有利于祖国国防的巩固和各民族人民共同的发展和繁荣。我们新疆从去年开始已经建立了相当于县、区、乡级的民族自治区16个。从全国和我们新疆的实践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以后，各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了，各民族之间和各民族内部进一步团结了，各自治机关和人民之间的联系更加亲密了，从而也就促进了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和文教事业的发展。

同志们！代表们！我们在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贯彻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以及多数民族帮助少数民族的精神。维吾尔族在新疆是主体民族，因而，维吾尔族的干部要如同汉族在全国范围内团结、帮助和照顾各少数民族一样，注意团结、帮助和照顾新疆境内的其他民族。同时，自治区内的民族干部，应该欢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干部的帮助，因为汉族的劳动人民和干部有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不仅争取了本民族的解放，并且援助全国各少数民族建立了自己的幸福生活。今后，各民族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更需要汉族人民、汉族干部和其他民族干部的帮助。同时，在各自治区里，人数比较多的民族，应该团结、帮助和照顾其他各民族的人民。

今天到会的同志，有准备参加哈萨克自治州筹备委员会的伊

犁、塔城、阿勒泰三区各阶层的代表，各地被邀请的代表，以及有关方面的同志们。这次会期只有两天，时间是很紧促的，希望全体到会同志能够很好地听取这次会议的有关报告，仔细地阅读文件，充分发扬民主，在加强民族团结的基础上，提出意见，以便集思广益，为今后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最后，让我预祝座谈会胜利成功，各位同志、各位代表身体健康！

（原载《新疆日报》1954年4月29日）

在新疆省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各位来宾：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疆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现在胜利开幕了。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新疆各族人民史无前例的一件大喜事。它标志着本省人民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标志着各族人民的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增强。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为建设幸福繁荣的社会主义的新疆而奋斗！

四年多来，新疆各族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英明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兄弟般的、钢铁般的团结一致，积极地进行了以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为中心的爱国主义教育，胜利地进行了镇压反革命、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的民主改革运动，迅速地恢复并发展了农牧业生产及文化教育事业。这就不仅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提高了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而且使新疆各族人民与关内其他民族人民一样走上了计划经济的轨道。这就不仅使我们有条件召开这次会议，而且给我们创造了于明年成立全省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条件，使我们从此能更好地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发展经济和文化。

当前，全疆各族人民正在深入学习国家过渡时期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正在深入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正在紧张进行生产建设。我们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的规定，选举本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讨

论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省人民政府九个月来的工作，以及如何搞好农林、畜牧生产、水利建设的问题；最后还要检查省人民政府的工作。

关于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毛泽东主席曾作了如下指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因之，我们不能不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今后如何在新疆贯彻执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它不仅把我国人民建国以来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胜利固定下来，而且保证我国可以通过和平的道路逐步消灭剥削和贫困，建立全国人民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之，对于这样一部关系全国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国家根本大法，我们不能不在这次会议上认真讨论，并将我们讨论的情况和提出的意见一并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本省以发展农业、牧业生产为主，但同时也要注意搞好现有工矿企业和手工业生产，根据需要与可能，适当的兴建与扩建部分自给性的地方国营工业，并做好商业、合作、交通、运输及财政、粮食等工作。对这些工作的方针，我们也不能不在此次会议上加以讨论。人民政府应当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做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人民代表有责任检查政府的工作，因之，我们不能不在这次会议上深入地讨论省人民政府九个月的工作。

我们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我们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是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有力武器，因之我们要更加巩固它。我们各族人民的亲密团结是建设伟大祖国的力量源泉，

因之我们要更加亲密地团结在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既有责任讨论、决定国家和地方的事务，也有权监督对决定决议的执行。因此，希望与会代表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充分发表意见，使会议开得更好。

出席这次会议的357位代表，代表了本省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各方面都占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名额。因此这次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毫无疑问，它将更能集中各族人民的意见，发挥各民族的智慧与力量，实现其庄严的使命。

最后，我预祝会议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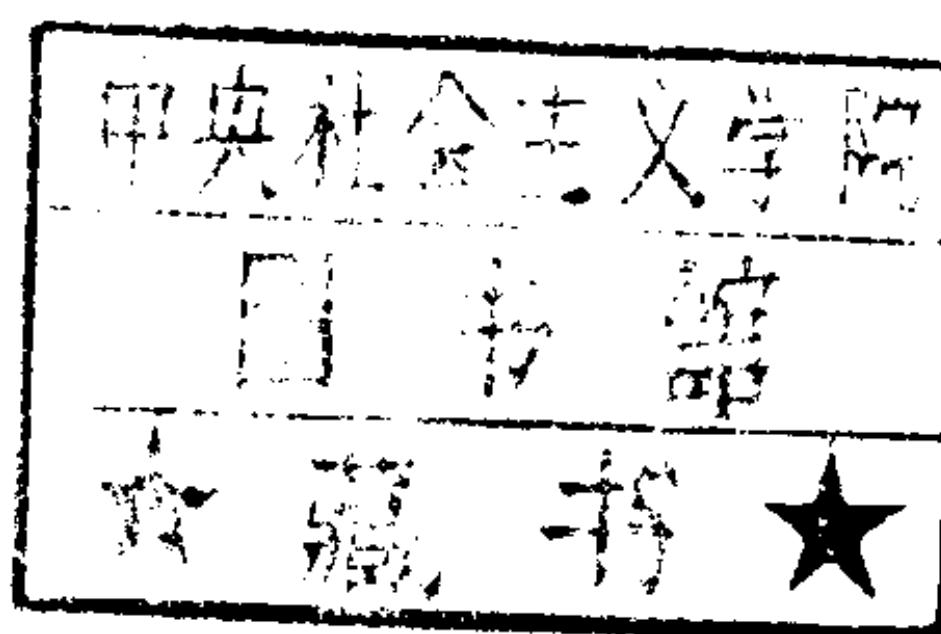
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原载《新疆日报》1954年7月22日）



在新疆省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的闭幕词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们：

经过十二天时间，新疆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工作。会议讨论与通过了王恩茂书记《为在新疆地区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报告，赛福鼎书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高锦纯副主席《为进一步做好农林畜牧生产和水利建设而努力》的报告；审查与批准了《省人民政府自省协商委员、省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以来九个月的工作总结报告》、赛福鼎书记《关于新疆普选工作基本总结报告》，决定了本省今后各项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审查与讨论了各项提案；选出了本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期间还热烈地庆祝了日内瓦会议就印度支那停战与恢复和平达成协议的胜利。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疆省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是取得了重大成就的。

这次会议的成就，首先是集中地体现了全新疆各族人民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坚决意志，反映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为在新疆地区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的决议，一致通过《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我们深信，在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光辉照耀下，遵循着宪法草案所指出的方向，全疆各族人民一定能够与全国人民一道，稳步地过渡到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这次会议充分地实现了全疆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当家做主的权利。全体代表在讨论省人民政府九个月来的工作报告当

中，都能本着对人民负责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切实认真地审查政府工作，不但肯定了省人民政府工作上的巨大成就，而且也指出了工作上的缺点，提出了改进意见。尤其可贵的是，全体代表充分反映了全疆各族人民的意见和要求，集中了各族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创造能力，向大会提出了各项建设性的提案共达750余件。这不但说明了各族人民政治积极性与建设积极性的提高和对人民政府的热爱，而且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我们深信，依靠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制度，定能在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过程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还有，这次会议高度表现了全疆各族人民团结友爱的精神，整个会议自始至终，从小组会到全体会议，从主席团到各代表单位，团结的气氛压倒了一切。特别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加强民族团结的基础上，一致选出了能够代表全疆人民意志的21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会议期间，收到了全疆各地机关、团体、工厂、农庄等给会议的祝词、贺电和贺幛。这生动地说明了此次会议无论在会内还是在会外，均深刻地体现了全疆各族人民政治上的一致与空前未有的大团结。我们深信，在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这种伟大的团结，必将成为新疆地区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

还有，由于印度支那停战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全体代表与全疆各族人民争取与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的胜利信心；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与国际威望的显著提高，更鼓舞了全体代表与全疆各族人民建设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胜利信心。我们深信，爱好和平的全疆各族人民今后更将继续与全国人民一道，为保卫祖国安全与亚洲及世界和平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还有，这次会议由于取得了上述的成就，不仅为团结全疆各

族人民胜利实现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打下了良好基础，而且为明年全省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次会议之所以获得这样圆满的成功，首先是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因之，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与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正确地执行和坚决地完成党和国家所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其次，是和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样优越的国家制度分不开的。因之，我们必须不断巩固它，加强它，使这一全疆各族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充分地不断地发挥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再次，是与汉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与关内来的汉族干部的热诚帮助分不开的。因之，今后我们必须继续欢迎和重视汉族人民与汉族干部的帮助。再其次，是与全疆各族代表的团结一致、认真负责的精神分不开的。希望我们各位代表今后继续发扬这种团结负责的精神，做好各族人民交给我们的工作，完成我们光荣的使命。最后，此次会议筹备工作做得完善周到，也是和各机关的有力配合，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的大力帮助以及会议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昼夜工作分不开的。让我代表大会主席团向在此次会议筹备工作中给予各种帮助的各单位，特别是新疆军区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向大会全体工作人员致以亲切的慰问。

各位代表，我们的会议是成功的，但我们的实际工作刚刚开始，今后的问题就是要巩固与扩大会议的成果，贯彻会议的精神，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各项决议。在贯彻决议的问题上，一方面，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是有重要责任的。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因之，此次会议的各项决议，省人民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另一方面，我们全体代表也同样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我们知道，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是议事的机关，而且是真正有权力的工作机关，为了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不仅是要制订决议，而且更重要的是动员全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

为彻底实现决议而奋斗。不少的代表在发言中已表示了贯彻决议的决心，我们全体代表也一致通过了保证将各项决议认真贯彻到各个地区和各项实际工作中去的决议。我们深信，依靠全体代表、全疆人民与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是定能完成本省的各项工作任务的。

当各位代表回去的时候，正是农牧业生产最紧张的时候。我们要结合此次会议的传达与宪法草案的讨论，根据国家过渡时期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的要求，大力动员各族人民搞好生产，为争取完成与超额完成各项生产任务而奋斗！

各位代表，我们带着人民的委托而来，今天我们又带着人民的委托回去。这种委托是光荣的，也是庄严的。为了实现各族人民的委托，我们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依照各族人民的意志办事，依照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法令办事。

各位代表，现在会议就要闭幕了。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本省的胜利实现，由于此次会议的成功，由于全疆各族人民团结的进一步加强与政治积极性的进一步高涨，我们深信，随着会议的胜利闭幕，继之而来的必将是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的巨大胜利；发展工矿生产、交通运输和对内对外贸易事业的胜利；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巨大胜利；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民族问题方面总任务的光辉照耀下各项工作的巨大胜利。让我们进一步加强团结，满怀信心地在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汉族人民的帮助下与全国各兄弟民族的支援下，从胜利走向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各族人民伟大的领袖与导师毛泽东主席万岁！

（原载《新疆日报》1954年8月1日）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届 人民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和全体同志们：

新疆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代表会议今天隆重地开幕了。这次会议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领导工作人员，成立自治州人民委员会。这是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哈萨克族和各族人民空前的一件大喜事；同时也是全疆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因此，首先让我代表省人民政府向这次会议并通过会议向三区的哈萨克族和各族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大家知道，新疆各族人民若干年来在反动阶级的统治下，受尽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反动统治者不仅在各民族之间，而且也在一个民族内部制造分裂和仇恨。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4年，三区的各族人民，在全疆各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援下，发动了三区革命，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三区人民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了，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结束了民族压迫的历史，开始了各民族平等团结的新时代。三区的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疆分局和新疆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驻疆人民解放军和全疆各族人民的帮助及自己的辛勤努力下，各项工作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先后胜利地进行了民主改革运动，巩固与加强了人民民主政权，不但恢复了而且大大发展了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各民族干部，各民族间的友爱团结日益巩固和发展，爱国主义大大提高。这就为实行以哈萨克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区域自治打下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基

础。经过长时期的筹备工作，现在成立包括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从此三区各族人民多年来的愿望，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实现了。这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民族政策不断实施的具体表现。今后三区的哈萨克族和各族人民将按照我国宪法所指引的道路，充分发挥当家做主的权利，发展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以逐步改变历史上反动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贫困和落后状况。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成立，我们新疆各族人民又一次地体会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和伟大，及党和国家对各少数民族亲切的关怀和照顾。

我对这次的代表会议有以下几点希望：

一、在自治州成立以后，要更加加强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特别是各民族干部的团结，因为各民族干部的团结是各民族人民团结的关键。大家知道，维吾尔族在新疆范围内是个多数民族，维吾尔族的干部应该学习我们汉族老大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帮助全国各少数民族的精神，全心全意地在本自治州内为哈萨克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服务，这是维吾尔族干部应有的一个光荣的任务；哈萨克民族在这个自治州内如果仅仅依靠自己的条件和力量，是不能够迅速改变原来经济和文化各方面落后状况的，因而应该热忱地欢迎其他兄弟民族的帮助，这种帮助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同时，哈萨克民族在本自治州内又是一个多民族，因而应该象汉族在全国范围内、维吾尔族在全省范围内一样，团结和照顾自治州内的其他民族，特别对人口少的民族更应该照顾和尊重他们的权利，这同样是哈萨克民族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要不断地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加强民族平等团结的教育，加强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坚决克服有碍民族团结的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以达到各民族间进一步的友爱和团结。

二、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是要发展各少数民族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使之逐步达到先进民族的水平。三区由于历代反动统治的结果，与全国发达地区相比还处于落后的状态。但是，三区在农业、畜牧业和工商业方面的潜在力量是很大的，它有着发展成为强大工业地区的前途。特别是不久的将来，从兰州经乌鲁木齐到苏联阿拉木图的铁路修通后，一定会促进三区经济的发展。在铁路修通以前，我们必须积极发展农牧业生产、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事业，及与之相适应的文教卫生事业，大力培养干部，为新疆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到来准备条件。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同时又规定了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些规定是完全符合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利益的。但是，帝国主义者却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地妄图分割我国各民族，借以达到他们重新奴役我国各族人民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百倍地提高警惕，严防帝国主义分子以各种方式、披着各种外衣，进行破坏我们祖国的统一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种阴谋活动。我们必须为继续加强和巩固伟大祖国的统一而不懈努力，对破坏社会治安与公共秩序的各种刑事犯罪，亦必须与之做坚决的斗争。

我们伟大祖国各民族的友爱团结已日益巩固。现在，我们必须象维护自己的生命和眼珠一样地来保卫这个胜利，因为各民族间的友爱团结是我们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础，也是各民族自治地方能够获得成就的必要条件。

同志们！让我们各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发挥各民族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在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光辉照耀下，艰苦奋斗，贡献出一切智慧和力量；发展农牧业和其它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将我们的祖国迅速建设成一个伟大的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

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在每一件工作中将这一指示作为指针，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从胜利走向胜利！

各民族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

（原载《新疆日报》1954年11月25日）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 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听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1954年国家决算和1955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彭德怀副总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邓子恢副总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我认为这些报告完全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因此，我对以上五个报告表示完全拥护，并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努力。

新疆的13个民族，解放前在一小撮反动统治阶级的血腥统治下，长期受着剥削和压迫，各民族之间充满了猜忌、仇视，历史上造成了许多次的民族仇杀，因而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以致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处于这种压迫之下的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对反动统治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获得了解放。

解放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大力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各族人民得到了在政治上平等的权利，民族关系已根本改变，各民族人民已经亲密地团结起来了。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镇压反革命、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工作，提高了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发展了各项生产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农产品比1949年增加了65.4%，牲畜增加了45%，水利增加了130%，各种工业产品增加了36倍。六年来，在本省培养出民族干部34000名，小学学生增加了76.2%，中学学生

增加了3倍，高等学校学生增加3倍。全省现有医院、诊所及其防治机构137处，病床设备比1950年增加了1倍。解放前饥寒交迫的劳动人民，今天已能穿到细布衣料，并能吃到油、肉、糖，生活有了显著改善。

这些成就都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生产建设中忘我劳动精神的示范、鼓励和对各族人民兄弟般的帮助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由于以上成就，给新疆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创造了有利条件。截至目前止，全省已建立自治州5个、自治县6个，今年秋季将成立全省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已建立起民族自治机关的地方，实现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进一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这主要表现在：

一、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他们都以汉族、维吾尔族照顾帮助其他民族为榜样，主动地团结和帮助区内各兄弟民族。同样地，自治地方内的各民族也更加亲密了。如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过去锡伯族捕蝗时，哈萨克族都不愿参加，并说：“农田都是锡伯族的，我们是牧民，与我们无关。”但自治县成立后，六区有300多哈萨克族男女牧民自动帮助捕蝗，并对锡伯族说：“捕蝗不只是你们的事，我们也有责任。”七区哈萨克族牧民还主动抽出500多人，帮助锡伯族农民收割打场。

二、增强了各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各自治州、自治县成立后，各族人民生产互助的积极性普遍提高。如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1954年牲畜比1953年增加了21.4%，全州幼畜成活率达98%，为历史上最高的年份。

三、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的联系。自治地方成立后，大量的少数民族中的积极分子及同人民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参加了自治机关的工作，有许多人担任了领导工作。在11个自治州和自治县

的266名政府委员中，本地民族占84.6%，34个州长、县长中，少数民族占76.6%。各自治机关执行职务时，均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锡伯族人感动地说：“反动统治时期，我们连本民族的话也不敢说，如今共产党提倡我们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帮助我们发展，民族区域自治真是一个好政策。”

四、增强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后，积极响应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伟大事业的号召。他们深刻认识到共产党和毛主席是少数民族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对党和毛主席无限信任和衷心爱戴。他们说：“共产党、毛主席象对待自己儿女一样对待各民族，我们少数民族才有当家做主的权利，今后也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才能走向繁荣和幸福。”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和正确性。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筹备工作中是有许多缺点的，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意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深入，致使有少数人对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认识不足。

根据上述情况，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必须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继续巩固与发展各民族间兄弟般的友谊，在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汉族兄弟的帮助下，大力开展自治区的经济和文化事业。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为了保证各族人民都能真正行使自治权利，我们将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区内各项单行条例。但这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经验不足，请求中央和有关部门多加帮助和指导。

最后我深信，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的英明领导下，将信心百倍地同全国人民一道，为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各项建设事业、为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努力奋斗。

（原载《新疆日报》1955年7月28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李济深副主席、郭沫若副主席、陈叔通副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所做的各项报告。

周恩来主席在他的政治报告中，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诚挚地表明了中国人民继续争取国际局势和缓和巩固世界和平的立场，同时也严正地表达了中国人民随时准备给予敢于进行战争冒险的侵略集团以沉重打击的决心。长期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经过二百多年的流血牺牲，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从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获得了解放，自己掌握了命运。新中国在亚洲的出现，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中国人民在一切国际事务中已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做一个新中国的公民有着无限的光荣和骄傲。我国周总理同印度总理和缅甸总理倡议并为苏联、南斯拉夫等许多国家所支持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已成了处理国际事务的准则，并进而在“万隆精神”中体现出来。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需要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来建设自己幸福生活的心愿。

解放后的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也迫切需要和平环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代表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表示坚决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报告，积极支持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同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

我们讨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

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感到非常兴奋。它为全国人民特别是5亿农民规划出迈往社会主义应努力的目标，加速了伟大祖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

新疆是祖国边远的多民族地区，20多年前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即派了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去进行工作。从那时起，党已在各族人民中撒下革命的种子。解放后6年多来，在党的领导下，在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历年增产丰收等先进事例的影响与大力帮助下，各族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的伟大前途。

新疆的农业和畜牧业有着雄厚的潜力。现有耕地2465万亩，并有荒地约12000万亩，共有大小河渠84条，平均流量1920秒立方。根据初步调查，河水与地下水共825亿立方，可灌溉大约1.1亿多亩耕地。在兰新铁路通车后，在大力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新形势下，需要从关内各地大量移民到新疆去进行各项生产建设，新疆各族人民是满腔热情地欢迎汉族老大哥的帮助和支持的。

新疆有地、有水、有广阔的草原和丰富的地下蕴藏，根据这些客观上的有利条件，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生产指标是有把握的。

知识分子在新疆是极为可贵的人才。解放6年多来，随着各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知识分子已逐年增加，他们在各项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后除坚决贯彻周恩来主席报告中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三项指示并大力培养青年专家，特别是培养少数民族的青年专家而外，要求中央在这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必要的照顾，使新疆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奋力赶前一步，与全国人民取得大体一致的步调。

在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取得了当家做主权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已与全国人民一道大踏步地迈进了社会主义。他们更将信心百倍地争取提早和超额完成中央规定的

新疆地区的各项生产指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将更加亲密团结，与全国人民一道，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为反对内外敌人而奋斗，为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为继续和缓国际局势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奋斗。

（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2月6日，有删节。）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

中国革命的经验一再证明，党的民族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宗教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新疆解放后几年来，由于坚决执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制订的民族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广泛地团结了宗教界、牧区上层人士和其他各族各界的民主人士，因而新疆解放不久就顺利地平息了帝国主义分子在新疆煽动起来的内乱，使新疆在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使从去年开始展开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地进行。汉族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部队，以兄弟般的态度，诚心诚意地帮助新疆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工作，培养出大量的少数民族干部。新疆各族人民对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汉族干部以及驻新疆部队的真诚帮助，表示十分感激。

我们这次在对中东和近东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访问中，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爱戴。阿拉伯各国人民对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中国人民，寄予很大的同情和期望。经过这次访问，使我更加体会到党的民族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宗教政策在国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帝国主义曾在各伊斯兰教国家肆意诬蔑我国对宗教采取“消灭政策”，企图挑拨阿拉伯各国人民与我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但自从周恩来同志在万隆会议上同阿拉伯各政府首脑接触后，我国和阿

拉伯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得到重新恢复。埃及、叙利亚、黎巴嫩、苏丹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许多人士，先后到我国进行访问，将他们亲眼看到的中国信教自由和民族平等的事实，转告给他们国家的人民。我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贸易代表团和伊斯兰教朝觐团在阿拉伯各国访问中，再次说明我国信教自由和民族平等的政策。因而，有力地揭穿了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埃及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履行国家主权的正义行动，表示坚决支持，使阿拉伯各国人民和我国的友好关系更加增强了。约旦宗教界最高首领之一谢以合——阿卜杜拉·喀里柯里对我们说：“蒋介石组织的朝觐团本来企图在这里造谣中伤你们，但他们一开口就受到我们的严厉驳斥，我们回答他们说：‘我们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他们对我们采取友好态度，坚决支持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全世界信仰伊斯兰教的有3亿多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大多数处在亚非地区。很多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民，现在还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为了长期压榨这些国家的民族，曾经利用各种办法，在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信徒中进行挑拨离间。但是帝国主义的这种阴谋手段，今后在这些国家再也不好玩弄了。我国伊斯兰教朝觐团访问期间，各国政府官员、宗教界人士及其他社会人士对我们讲：“阿拉伯系统的各国人民现在已经觉醒了，特别是苏伊士运河问题发生后，更加促进了各国人民的觉悟。”由于腐朽的帝国主义拼命压迫这些国家的结果，不愿再受帝国主义侵略奴役的各国人民，不分民族、宗教信仰、政治派别、社会地位，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已经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这种斗争，正在日益高涨起来。我亲眼看见许多年长的宗教领袖在礼拜寺、在群众大会上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号召大家抵抗侵略。这证明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在这些国家已经开始瓦

解，帝国主义很难再利用这些国家的宗教为他们牟利了。这都表明伟大的列宁所说：“亿万亚洲人民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积极的因素，而且在决定全人类的命运中，起他们的作用的时候将会到来。”这一预言，现在正在实现。

我们在阿拉伯国家访问期间，已经邀请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国家的宗教界人士，于今年11月到明年5月间分别来我国访问；还邀请了沙特阿拉伯内政大臣兼代首相、黎巴嫩前任总理、约旦前任首相，在今冬明春来我国访问。他们长期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得知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成就，都想来中国亲眼看一看。

最后，我提两点建议：

第一，在国内应该进一步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民族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信教自由政策，发挥各族各界人士的积极性，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我们要求汉族干部积极帮助新疆及其他各省少数民族进行工作，这种帮助不仅现在需要，将来也需要。我们要谨防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谨防地方民族主义。要知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汉族兄弟般的帮助下，我们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各种建设事业才能迅速发展，才能彻底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不平等现象。

第二，继续加强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我们访问外国也请外国朋友们访问我国。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派文化艺术代表团、贸易代表团互相往来，在经济上尽可能互相援助，使他们逐步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独立自主起来，并增进我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我们和阿拉伯各国，今后应该建立更多的联系，支持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阿拉伯各国人民需要了解我国情况，应当把我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历史、国家建设情况和其他方面的有关资料，译成阿拉伯文字，推荐给阿拉伯人民。应该把新中国的电影，译成阿拉伯语言和阿拉伯人民见面。我国的新闻消息也应该

译成阿拉伯文字对外广播。我们现在很缺乏阿拉伯文字的翻译人材，我提议迅速选派各族青年、大学生去埃及、叙利亚等国学习。在那里学习翻译的条件优越，在我国大学需要四年时间的，在那里两年就行了，并且可以学会方言和民族风俗上许多用语。

我们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将在国内工作和国际工作中，继续发挥其重大作用。我们必须在这和平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伟大时代，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努力做好我们的工作，使之成为保卫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胜利的有力因素。

（原载《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为纪念国庆而作

今天我们全国各族各界五万万人民都在庆祝国庆日。一年前，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把我国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建立了一个独立、民主、和平、自由、统一、繁荣的新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几千年来，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反动派与先进人士、反革命与革命者激烈斗争的结果，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十年的艰苦斗争而取得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因此，今天全国各地、各族人民都无比地兴奋，我们新疆13个少数民族500多万人也同样以无限愉快的心情，隆重地欢度这个伟大光荣的节日——国庆节。过去在反动阶级长期统治下，各族人民受尽残酷的压迫与剥削，过着暗无天日的痛苦生活。并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在各族人民中挑拨离间，造谣煽惑，造成各兄弟民族间互相仇视、互相残杀，致使各族广大人民过不了一天安居乐业的生活。

随着全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新疆去年9月获得了解放，压在人民头上的反动政权以及他们所实施的反动政策亦被铲除根绝了，这才使各兄弟民族走上了团结友爱、合作互助的幸福之路。新疆各兄弟民族自去年和平解放后进入新的生活，迄今也已整整一年了。所以在庆祝国庆节的今天，我们全疆的13个民族分外欢欣。在过去一年中，我们为创造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曾做了许多的工作，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友爱合作，融洽了各兄弟民族间的感情。加以本省和关内的交通的畅

通，人民必需品得到源源不断地供给，这就为各民族人民发展生产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所有的企业部门大都是反动派朋党亲友们的养老院。现在这些工厂经过整顿，工人积极生产，提高了成品的产量与质量，开支减少，成本也降低了。此外过去很多失业的工人同胞也有了工作岗位。自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以后，他们以高度的劳动热情从事生产，在本省人民中间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使生产得到了发展。今年部队的大生产运动，播种了85万亩的田地，开发了可以灌溉52万亩田地的水利工程。这种伟大的生产建设的良好开端，显示出新疆各族人民正向幸福光明的生活大步前进。

憎恨我们各族人民过民主自由幸福生活的美英帝国主义者的走狗间谍，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们，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进行破坏，采用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破坏我们的和平生活和社会的安定秩序。虽然他们阴谋破坏行为在人民的伟大力量面前已被粉碎，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骄傲麻痹。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去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典礼上指示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我们要号召各族人民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周围，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为完成摆在面前的伟大经济建设任务而奋斗。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提高文化，发展工业，努力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新的新疆，让我们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夺取新的胜利而奋勇前进吧！

（原载《新疆日报》1950年10月1日）

进一步加强各民族在平等 基础上的友爱团结合作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与亲自参加下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宪法草案，已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并正式公布了。这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它标志着我国人民革命与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胜利，标志着我们伟大祖国的空前统一与各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同时它也表明了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紧密地团结一致，共同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因此，在公布宪法草案的欢乐日子里，我们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感到无限的光荣和骄傲，无比的欢欣和鼓舞。

1949年，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新疆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束了民族压迫时代，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宪法草案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宪法草案第二章第五节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也作了专门的规定。这些规定，无疑地将进一步加强我国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友爱团结合作，巩固伟大祖国的统一。同时，它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民族政策的伟大和正确。这对东方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将是一个

巨大的鼓舞。

宪法草案序言中还明确规定：“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这将进一步保证我国各少数民族在祖国共同事业的发展中，逐步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的民族逐步发展成为先进的民族，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清楚地表明了生活在我们祖国大家庭中的各少数民族是非常幸福的，各少数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和美好的。让我们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信心百倍地为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为我们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事业而奋勇前进！

（原载《新疆日报》1954年6月20日）

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新疆各族人民解放前在一小撮反动统治阶级的血腥统治下，长期遭受着剥削和压迫。在反动统治者的挑拨离间下，各族人民之间充满了猜忌、仇视，造成了历史上许多次民族纠纷，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以致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新疆各族人民随同全国人民一起获得了解放。从此结束了新疆各族人民长期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悲惨生活，消除了各民族之间的猜忌、歧视等互不团结的现象，开始建立起平等友爱、互助团结的新关系。

六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新疆地区大力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进行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普选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群众运动，安定了社会秩序。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发展了农牧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事业，兴修了水利，建立了许多现代工业。目前正在开展以农业增产为中心的互助合作运动。截至1954年底，各种主要农作物产量，比1949年增加了65.44%；各种牲畜增加了42%；灌溉面积扩大了1.3倍；电力增加37倍；煤炭产量增加31倍；面粉增加6倍。由于各种生产事业逐年发展，从而稳定了金融物价，日益改善和大大提高了各民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六年来，经过各种运动的锻炼和专门训练，培养了本地民族干部24300多名（未包括乡级干部、小学教员），其中有骨干干部2600多名。在各级政府机关部门中，均有民族干部任正职或副职，这些干部不论在生产建设和民族团结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自1953年10月开始，从下而上逐步地推行了各级民族区域自治，

建立了各级自治机关，进一步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觉悟。所有这一切，都为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民族区域自治，是党和毛主席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中央早已指出，过渡时期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是：“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设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建设祖国的共同事业中，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步地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建立，彻底体现了中央这一决定的精神实质。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和新疆其他各族人民以至于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又一重大胜利，是我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又一重大进展。毫无疑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对加强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对提高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对鼓舞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进一步发展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以及进一步改善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进作用。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殷切关怀的结果，是汉族人民和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对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真诚无私、兄弟般地帮助的结果，也是在新疆地区不断加强民族团结的结果。

为了感谢党中央、毛主席的殷切关怀和汉族人民真诚无私的帮助，全疆各族人民和广大干部，都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迎接自治区的成立。

新疆各族农民几年来增产了许多粮食、棉花，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今年，要在

夏粮丰收的基础上，争取秋粮丰收，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继续支援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时，进一步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做好冬季播种的准备工作，为1956年粮食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各族牧民几年来在改良品种，发展畜牧生产，支援对外贸易，供给工业原料和保证人民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今年，应在本年春羔丰产的基础上，努力提高牲畜和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做好牲畜过冬的准备工作和打狼保畜工作，使全部牲畜安全的渡过严冬，为1956年牲畜增产创造良好条件。

各厂矿企业生产单位、交通运输部门和基本建设部门的职工同志们，几年来曾为全疆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许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使本省的面貌和人民生活水平起了显著的变化，是有很大成绩的。今后，必须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继续发掘生产潜力，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运输效率，保证运输安全，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支援全国和自治区的建设事业。

各国营商业和合作部门的工作人员，几年来，在巩固工农联盟、稳定金融物价、保证城乡供应、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也做出了许多成绩。今后，必须在既得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提高计划性，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加速资金周转，坚决消灭积压和浪费国家物资的现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几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在社会改革运动和生产建设事业中，绝大多数都发挥了工作积极性，努力完成了任务，取得不少成绩。今后，必须积极钻研业务，提高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不断改进工作，在既得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为自治区各族人民服务。

各族男女青年，几年来由于各级党和青年团组织积极培养和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激发了爱国生产热情。在各个工作部门

和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中涌现出大批的青年积极分子和模范人物，创造了很多新纪录，他们是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今后，必须遵照毛主席“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努力学习，继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水平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加强身体锻炼，进一步紧密地团结在党和青年团组织的周围，更有效地发挥青年的突击作用，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作出更大的贡献。

要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新疆来说，反革命分子是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危险的敌人。几年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事实，给予我们极深刻的教训。因此，全疆各族干部和各族群众都应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到目前正在全国范围进行的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以保证我们的民族团结不受破坏，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做好上述各点，是全疆各族干部和人民当前的一个光荣任务，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让我们进一步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周围，为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共同努力奋斗。

（原载《新疆日报》1955年9月17日）

新疆各民族的团结在不断加强

团结是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新疆地区，加强民族团结又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关键。没有这一条，要做好任何工作都是不可设想的。

解放前，新疆各族人民在反动统治阶级的血腥统治下，长期遭受着剥削和压迫，各民族之间充满了猜忌、仇视和互不信任，因而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使新疆各族人民随同全国人民一起获得解放，在政治上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从而永远地结束了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命运。各民族间消除了隔阂、分裂的现象，建立了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关系。

解放后，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进行了镇压反革命、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普选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安定了社会秩序，提高了各族人民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觉悟和积极性。在中央对新疆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下，我们发展了农、牧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事业，兴修了水利。解放前新疆几乎没有现代化的工业，解放后建立起了许多现代化的工业。截至1954年底，各种主要农作物产量增加了65.44%，各种牲畜增加了42%，灌溉面积扩大了1.3倍，电力增加了37倍，煤炭产量增加了31倍，面粉产量增加了7倍。从而稳定了金融物价，改善和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六年来，经过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的实际锻炼和专门训练，培养了各族干部36000多人，其中仅领导干部和骨干就有2600多人。

许多本地民族干部担任了专员、县长和厅长、处长等领导工作的正职或副职。他们在工作中均能从团结出发，互相帮助、遇事商量，从而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中央早已指出，过渡时期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总任务是：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来建设伟大祖国的大家庭；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保障各民族在一切权利方面的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祖国的共同事业的发展中，与祖国的建设密切配合起来，逐步地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其中包含稳步的和必要的社会改革在内），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统一领导下，省人民政府自1953年10月开始，在新疆地区自下而上逐步地推行了各级民族区域自治。由于各级民族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的建立，进一步巩固了民族平等，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

在建立各级民族自治地方的过程中，占人口多数的汉族和维吾尔族干部和人民，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均能采取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的态度，取得了各兄弟民族人民的尊敬和热爱，被他们亲切地称为“老大哥”。同样地，实行区域自治的各民族人民，也能仿照汉族在全国、维吾尔族在全疆团结帮助和照顾各兄弟民族的榜样，去团结帮助和照顾本自治地方内的其他民族。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在选举出席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哈萨克族人民为了照顾其他民族，特别是照顾人口较少的兄弟民族，曾主动地让出8名代表名额，从而获得了各兄弟民族的信任和支持，进一步加强了团结。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等地区内一些渊源很深、历史很久的牧草场纠纷、土地纠纷、农牧纠纷等，也都在各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本着对其他民族帮助、照顾、让步的精

神指导下，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不断加强民族团结和各级自治地方的建立，大大促进了各族人民在生产中的互相合作。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前，锡伯族农民捕蝗时，哈萨克族牧民不愿参加，有的还说：“农田都是锡伯族的，我们是牧民，这与我们无关。”自治县成立后，该县六区有300多名哈萨克族男女牧民自动帮助捕蝗，并对锡伯族农民们说：

“捕蝗不仅是你们的事，我们也有责任。”又如，在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过去有些蒙古族牧民不愿让哈萨克族牧民在自己多余的草场内打草。自治县成立后，该县第一区12户蒙古族牧民，曾自动地让19户缺少草场的维吾尔、哈萨克族牧民无代价的在自己草场内打草27000多捆。并说：“哈萨克族老乡的困难，也就是我们自治区大家庭的困难，我们应该帮助解决。”

自治地方的建立和对各族人民加强团结教育的结果，也加强了民族内部的团结，进一步提高了警惕性。许多地区曾结合民族区域自治的宣传工作，调解了不少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本民族内部的隔阂和纠纷，使民族内部的团结日益巩固和加强。如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的哈斯木下可部落和塔尔巴克部落间，在历史上曾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现象，两部落的群众见面互不说话、互不结亲、彼此咒骂。经过民族区域自治的宣传教育后，双方在互相尊重和自我检讨的基础上取得了和解。他们自己检讨说：

“我们内部不团结还能搞好区域自治当家做主吗？”双方坚决保证要亲密团结起来，共同搞好自治州的工作。昌吉回族自治州被打倒的地主企图破坏民族内部团结，和莎车县孜热甫下提塔吉克族自治区外来坏分子进行分裂教派的阴谋活动，都因群众提高了警惕性而遭至失败。

此外，各民族间共同欢度节日、互相拜贺，各企业厂矿生产部门老师傅热情耐心地向其他民族的徒弟传技术、教本领等生动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六年来，由于坚决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加强了民族团结，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特别是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逐步推行了各级民族区域自治，这就为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长时期的筹备工作，已经中央批准本年10月1日正式建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毫无疑问，自治区的建立，对于进一步加强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团结，提高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觉悟，鼓舞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进一步发展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以及进一步改善和提高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和积极的推进作用。这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以至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又一历史性的胜利，是我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又一重大进展，也是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省人民政府正确执行民族政策，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以及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和汉族干部真诚、无私、兄弟般帮助的结果。

基于上述，继续巩固和加强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就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自治机关建立后，必须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共自治区委员会统一领导下，以及汉族干部和人民的热情帮助下，在自治区内继续坚决地贯彻中央的政策、指示和决议，继续向自治区内各族人民大力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发挥多数民族团结、帮助和照顾少数民族的精神，以求得各民族共同发展和进步。维吾尔族在新疆的地位，正如汉族在全国的地位一样，是主体民族。维吾尔族干部和人民必须如同汉族人民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热情地团结、帮助和照顾各兄弟民族一样，去积极热情地团结、帮助和照顾其他民族。同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后，我们更应热烈地欢迎汉族人民和干部对各兄弟民族真诚无私的帮助。这是因为汉族人民和干部有长期的革命锻炼和经验，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不仅争取了本民族的解放，同时也帮助中国境内的其他兄弟民族得到解放，并进而全力帮助各兄弟民族建立起自己的幸福生活。只有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共自治区委员会统一领导下，以及汉族干部和人民的热情帮助下，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新疆各族人民才能彻底实现当家做主的权利，才能大力发展战略区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才能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跻身于先进民族的行列，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最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之际，我们衷心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对新疆人民的殷切关怀，并向热情帮助新疆各族人民的汉族人民和干部，以及帮助新疆各族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友邦苏联致以亲切地谢意。

（原载《人民日报》1955年9月24日）

亚非五国访问记

(一) 代表团的崇高任务

为了贯彻万隆会议关于加强亚非国家文化合作和促进亚非各文化交流的决议，1956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了一个文化艺术代表团到中东和非洲各国去进行友好的访问和演出。我们访问了埃及共和国、苏丹共和国、埃塞俄比亚王国、叙利亚共和国、黎巴嫩共和国五个国家，历时四个多月。在访问期间，我们受到了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和欢迎，上述五个国家的元首及其他领导人都先后接见了代表团的领导人员，并且向我们表示了他们的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意愿。

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在这次出国访问期间，共演出了54场，观众达76000多人。我们的艺术表演深深地打动了这五个国家人民的心，他们称赞我们优美的民族艺术，特别是对我国的京剧有很高的评价。埃及总统纳赛尔在看了艺术团的演出以后对我说：

“我很钦佩中国的艺术保持着优美的民族风格和具有鲜明的东方色彩。”

我们在这些国家演出的同时，还学习了这些国家人民的优秀的民族艺术。我们学会了他们的歌舞，并且在许多次的演出中表演了这些新学会的歌舞节目。我国艺术家和这些国家的艺术家之间的交流经验和相互学习，不仅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且具体地达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有助于丰富各国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在代表团访问期间，我们同各国的文化艺术界、教育界、宗教界及政治界的著名人士进行了广泛的友好接触。这种接触更进

一步加深了我国和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在代表团访问期间，我们还奉我国政府之命，同一些国家的政府代表举行了有关文化合作的会谈。经过充分的友好的讨论，签订了中国和埃及、中国和叙利亚的文化合作协定。在苏丹和埃塞俄比亚，我们同这两国的政府互换了信件，表示了发展文化合作的共同愿望。在贝鲁特，我们同黎巴嫩政府所指派的代表，就有关中黎两国文化合作的问题详尽地交换了意见。

在代表团访问期间，我们看到了这五个国家美丽锦绣的山河，古老丰富的文化和勤劳、勇敢、纯朴、好客的人民。我们也参观了这些国家的名胜古迹、工厂和学校。

（二）三点总的印象

在访问了上述五个国家以后，我深深地感到有下面几个总的印象：

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万隆会议的决议和万隆精神已经深入亚非各国人民的心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我们在亚非五国所遇到的无论是政府领袖、一般官员，还是普通人民，他们在万隆会议闭幕一年多以后的今天，仍然热烈地谈论着万隆会议和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我发现，万隆会议的决议和万隆精神，已经成为亚非各政府和人民间的共同语言，成为亚非人民团结合作的坚实基础。

我的第二个印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近几年以来，亚非人民正在经历着一个伟大的民族觉醒的历史时期。我们所访问的五个亚非国家，程度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在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所有这些国家都在经过了长期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后，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在为摆脱西方殖民主义所遗留下来的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态而努力。他们要求把本民

族的命运完完全全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的第三个印象是：“和中国人民友好！”已经成为亚非各国人民的一致呼声。亚非各国人民重视中国人民在争取自己国家完全独立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历史性的胜利，热烈地关心着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国家中所取得的每一项巨大的成就。在我们访问的国家里，到处都能够听到那里的人们说：“我们是东方人，我们是兄弟。”也到处可以听到那里的人们说：“我们和你们都曾经遭受过殖民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我们和你们有过共同的苦难经历，我们和你们还将要有共同的欢乐生活。”虽然帝国主义者力图在这些国家的人民中间散布诽谤和污蔑中国人民的恶毒言论，但是在这些国家，帝国主义谎言的市场是越来越缩小了。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甚至已经在距离我国万里之外的国度里产生了日益巨大的影响。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是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

下面我想扼要地介绍一下我们访问五个国家的见闻。

（三）在金字塔的国度里

2月25日至4月16日，我们访问了埃及共和国。大家都知道，埃及是一个有着将近6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曾在世界七奇之一的齐阿普斯王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的脚下走过。金字塔的确是人类建筑史上一件巧夺天工的杰作。我们从金字塔看到了埃及古代帝王的残暴统治，同时又看了埃及人民的勤劳、智慧和伟大力量。

埃及不仅是一个文化古老的国家，而且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这是因为埃及有一条足以自豪的尼罗河。全长6600公里的尼罗河有1200公里在埃及境内。尼罗河两岸，风光明媚，四季常青。但是在埃及，几乎没有雨水，有些地方根本不下雨，在埃及

的南方，甚至七八十岁的老人还没有见过雨。因此，农田灌溉全靠这条畅流不息的尼罗河。埃及90%以上的国土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只有尼罗河两岸伸展绿色的田野。田野外面就能望见广袤无垠的荒沙。所以过去人们称埃及是尼罗河所赐予的礼物。但是依我看来，埃及并非是尼罗河赐予的“礼物”，因为埃及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由埃及人民向沙漠夺取过来的。直到今天，埃及人民还在进行着征服沙漠的伟大斗争。当人们看到了埃及的沙漠和良田，也就不禁会对勤劳勇敢的埃及人民肃然起敬。

我们参观了埃及的著名的“解放省”。这是在沙漠上建设起来的一个新的省份。埃及的工人用开路机和挖泥机在这荒凉的沙漠上移去一堆一堆的黄沙，又从远处引过来一条水渠，并且开凿出许多自流井。就这样，使沙漠上出现了一片新土。从1953年9月到今年年底，将开垦出14000埃亩（每埃亩等于6.3市亩）的土地。预计在15年内，“解放省”将要开出120万埃亩的新土地。埃及的32位教授、科学家和10000多名工人正在从事着“解放省”的建设事业。我认为埃及建设“解放省”的经验，有许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由于自然条件的关系，埃及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沙漠耕作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国沙漠地区的建设工作是很有用处的。我们还参观了阿斯旺水坝。我们看到在阿斯旺旧水坝旁边，一座小型的水力发电站正在建设中。另外在旧水坝以南6公里的地方，埃及政府正计划兴建阿斯旺高水坝。埃及人称它“沙德阿里”。这个高水坝的建成将能储水1650亿立方公尺，灌溉200万埃亩土地。同时一个新的年发电100亿千瓦时的巨大水力发电站，将在“沙德阿里”的附近建设起来。

无论在“解放省”或是在阿斯旺水坝，我们所接触的埃及朋友都是对自己国家的建设事业充满着自信和决心的人们。正如解放省省长哈萨尼先生对我说的：“西方国家的某些人轻视我们，说我们是未开化的落后国家，说我们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国家。

可是，我们并不是天生落后的。一旦我们自由了，我们的人民将创造奇迹，我们会变成先进的国家。”

我确信并且预祝埃及人民在建设自己祖国的事业中将要取得像金字塔一样的丰功伟绩。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在非洲大陆上有了像埃及人民那样的朋友。中国人民衷心地关怀着埃及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进行的斗争，关怀着埃及人民在建设自己新生活的事业中取得的成就。这里我想引用埃及国家指导部部长拉德温先生在我们代表团的告别宴会上讲的一段话：“埃及人民钦佩中国人民的斗争。在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埃及人民全心全意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和平是把埃及人民和中国人民联系起来的基础，让我们一道为建设美好的未来，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是的，让我们同埃及人民一道，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建设美好的未来，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吧！

（四）在喀土穆的日子

4月16日至4月27日，我们访问了苏丹共和国的首都喀土穆。喀土穆位于尼罗河上游，人口有8万人，加上尼罗河对岸的苏丹旧都恩图曼和喀土穆北面的一个镇子，共有将近40万人。这三个地方实际上已经组合成为一个城市。

到了喀土穆就感到气候的炎热了。当时的温度已经达到了华氏100度以上，但据苏丹的朋友们说，我们还算幸运的，赶上今年的天气比较“凉快”。

由于苏丹刚刚独立不久，而过去的殖民主义者甚至没有在喀土穆留下一个剧场，因此，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只能临时在一个露天的俱乐部搭台演出。其实，这倒是一个很理想的剧场。四周没有围墙，而是枝叶茂盛的树林。夜晚，清凉的风透过树林，吹进剧场，使观众们能非常舒适地观看艺术表演。4月18日，正

巧是万隆会议一周年，代表团在喀土穆举行了演出开幕式，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苏丹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西·伊罗和当时的代理总理易卜拉欣·埃尔·穆弗蒂都出席了我们的演出开幕式。可以这样说，我们在苏丹的演出开幕式，实际上是一个庆祝万隆会议一周年的纪念大会。在开幕式上，苏丹共和国代理总理穆弗蒂致词说：“万隆会议是国际关系和各国人民间关系的转折点。如果万隆会议的原则能够在各国实现，那么世界和平就能够获得保障。”毫无疑问，我们完全同意穆弗蒂先生的这个观点。

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的演出，在喀土穆成了人们谈论的中心。每天晚上露天剧场里不仅坐满了、而且站满了观众，甚至连挤进剧场的空间也没有了。在剧场外面的大街上还拥挤着人群，他们隔着树林欣赏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的表演。场外的群众和场内的观众一起欢呼、一起鼓掌。每天晚上演出结束时，许多苏丹人等在剧场门口欢送我国的艺术家们。他们有时还用中国话高呼：“和平万岁！”苏丹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诚挚友好感情，不能不使人感动。

在苏丹，我们游览了喀土穆的市容。在喀土穆至今还树立着两座令人厌恶的铜像：一座是19世纪开拓非洲殖民地的一个英国将军契金纳的铜像；另一座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从亚洲跑到非洲去进行殖民阴谋的英国人戈登的铜像。这两座铜像当然很容易使苏丹人回忆到他们所遭受的殖民主义血腥统治。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看到殖民主义者戈登的铜像时，也就很容易联想到中国人民的苦难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个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苏丹去奴役苏丹人民的戈登，也就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帮助清朝统治者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同一个历史罪人。

和中国人民一样，苏丹人民是英勇的人民。我们在旧都恩图曼，沿着尼罗河看到有一长列的土堡垒。这是1898年当英国将军契金纳率领军队侵入喀土穆时，苏丹人民进行英勇反击的地方。

当时苏丹人表现了非凡的英雄气概。以后，英国殖民者虽然占领了苏丹，但是苏丹人民从来都没有屈服过。他们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终于迫使英国殖民者退让而建成了独立的苏丹共和国。现在苏丹人民对帝国主义在非洲的侵略阴谋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们高举着维护和平和民族独立的大旗。

4月28日，我们怀着对这个国家的亲切记忆告别了喀土穆。

（五）在“新花”之都

4月28日到5月14日，我们访问了埃塞俄比亚王国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亚的斯亚贝巴”，阿姆哈拉语是“新花”的意思。原来73年前在埃塞俄比亚奠都于亚的斯亚贝巴以前，这里曾生长着满山遍野、色彩缤纷的野花。埃塞俄比亚皇帝麦涅力克二世巡游至此，为它的美丽所吸引，因而决定奠都于此，并命名它为“新花”。

在埃塞俄比亚，我国艺术团的访问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在亚的斯亚贝巴居民的文化生活中掀起了一个巨大的高潮。每天，人群都拥挤在海尔·塞拉西一世剧院的大门前，甚至把正门的两块大玻璃都挤碎了。埃塞俄比亚的报纸评论说：“中国的艺术表演轰动了亚的斯亚贝巴”。

在埃塞俄比亚，过去很少有中国人的足迹。在亚的斯亚贝巴也只有4个华侨。因此，埃塞俄比亚人民对于中国的了解是不多的。但是这次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的访问，在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通过我们的艺术表演，更多地了解了中国。根据我们的接触和交往的经验，我们深感埃塞俄比亚人民对中国人民同样怀着友好的感情。

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接见了我们代表团。塞拉西皇帝对我说，他非常感谢我国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通过王

国代表对埃塞俄比亚人民所表示的良好意愿，并希望今后中国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个人和代表团的互相访问能够增多起来。

5月7日，我们参加了埃塞俄比亚从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15周年纪念日的庆祝大典。大家都还记得，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侵略军入侵埃塞俄比亚的国土，埃塞俄比亚人民奋起抗击侵略者。虽然意大利侵略军拥有近代化武器，而埃塞俄比亚人民只有简陋的武器，可是抗战进行了半年以上，直到1936年5月，侵略军最后用施放毒气的野蛮手段才占领了亚的斯亚贝巴。1941年，德意志法西斯军队在非洲溃退，海尔·赛拉西皇帝重新回到了亚的斯亚贝巴。在“解放日”的庆祝典礼上，我们看到了埃塞俄比亚王家骑兵和步兵走过解放广场，还有几架埃塞俄比亚的飞机掠过天空。对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抗意战争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我们中国人民是一向钦佩的，并且正如海尔·赛拉西皇帝所说，当埃塞俄比亚处在黑暗日子里的时候，中国人民曾给予埃塞俄比亚人民以同情和支持。我相信，中国和埃塞俄比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将得到充分的发展。

（六）在叙利亚

5月14日至21日，代表团在开罗休息了一个星期。5月21日至6月12日，我们访问了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是应叙利亚共和国库阿特利总统的邀请前往访问的。库阿特利总统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时就观看了代表团的演出，他称赞中国的艺术，并且提出了邀请。

我们到了叙利亚共和国首都大马士革后，立即拜会了库阿特利总统。总统在接见时预祝代表团演出成功，并且说：“我相信，当你们离开这个国家时，会把叙利亚人民的心给带走的。”我们在演出中受到了叙利亚大学生的欢迎，也受到叙利亚国防部

队的军官和士兵、以及大马士革市民的欢迎。当我们代表团到叙利亚北部的重镇阿勒颇去访问时，阿勒颇市的工人、农民、学生和艺术家等 200 余人走出市郊10公里以外，盛情迎接我们代表团，两个美丽的叙利亚女孩子向我们献花。有两个叙利亚人站在大汽车上高高地举着叙利亚的国旗，把我们迎入市区休息的地方。沿途，我们到处受到阿勒颇市民的热情欢迎，他们向我们欢呼：“阿拉伯人民和中国人民友好万岁！”“叙中友谊万岁！”“和平万岁！”在叙利亚，我们一共逗留了23天。6月12日，我们代表团带着叙利亚人民热爱和平和充满对中国人民友情的心离开了这个好客的国家。

（七）在亚洲的花园

6月12日至6月28日，我们在访问日程上最后的一个国家——黎巴嫩共和国的首都贝鲁特度过了令人难忘的日子。贝鲁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它紧靠着地中海，风景如画，有“亚洲的花园”之称。一年中，成万的旅行者从世界各国来这个美丽的城市游历。海滨有许多游泳场，许多男女从清早一直到傍晚都在海上游泳和从事滑水运动。

代表团在访问贝鲁特期间，受到了各界人民热情的欢迎。我想在这里特别提一下黎巴嫩和平委员会举行的招待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的欢迎茶会。出席这次茶会的有黎巴嫩和平委员会主席、黎巴嫩工程师协会主席安托瓦·塔伯特，参加万隆会议的黎巴嫩代表团团长、前总理萨米·索勒哈，还有前任总理胡赛音·乌艾尼，黎巴嫩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法里德·库兹马，以及黎巴嫩各界著名人士 300 余人。茶会在非常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黎巴嫩的著名作家乔治·哈纳先生在会上致词说：“过去，帝国主义力图分化我们的团结。但是，现在你们走到了万隆，我们也走到

了万隆。我们和你们找到了团结的道路，我们和你们互相握手，我们和你们都深深地认识到亚非国家间的团结和合作是不可分割的。你们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我想听了这位黎巴嫩作家热情洋溢的上述讲话，就不需要我再多叙述黎巴嫩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了。

我想特别强调世界上国与国之间加强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的重大意义。我们在访问亚非国家时深深体会到，各国人民都是热爱文化和艺术的，人民需要文化艺术，而不需要战争。各国人民要求在国际文化经济交流的基础上求得文化与经济生活的共同提高。因此，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与经济交流，就会促进全人类争取持久和平的事业得到胜利。

我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这次所以能够胜利地完成访问演出任务，是代表团全体人员努力的结果，是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和黎巴嫩五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热情地给予我们许多便利和帮助的结果。我代表代表团全体人员再次向这些好客的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最衷心的谢意。

（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10月30日）

中近东各国人民对我国 人民的友谊

——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 会议上谈访问阿拉伯国家 的观感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陈叔通副主席《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这次会议以前，我们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听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这次政协会的预备会议上，又听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问题的说明》。所有这些，均给我们很大启示。

去年2月间，我带领我国政府派出的文化艺术代表团对埃及共和国、苏丹共和国、埃塞俄比亚王国、叙利亚共和国以及黎巴嫩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7月间我又带领我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的朝觐团到沙特阿拉伯王国、约旦王国以及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家再一次进行了友好访问，直到9月中旬返国。我想将我个人对这些国家了解的一些情况，向各位作一简要汇报。

我们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真诚欢迎

我们访问过的这些国家，大多处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接壤地带，90%左右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是非常

勤劳、勇敢、纯朴和富有智慧的，这些国家都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和反对侵略的光荣传统。这些国家的人民也都和我国人民一样，曾经遭受过甚至现在还遭受着帝国主义的奴役压迫，他们和我们有过共同的苦难，都有维护自己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他们知道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是支持他们民族独立的重要力量。我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和朝觐团在这些国家里，受到了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这些国家的元首和其他高级官员都先后接见了我们，同时向我们表示了他们的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愿望。

埃及纳赛尔总统在亲切接见我们的时候，表示了愿与我国增进友谊的愿望。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对我们说：“中国与叙利亚之间开始了友谊关系，它会得到日益发展。”约旦国王侯赛因说：“祝贺你们的光临，我希望这种往来今后不断发展。”并且又说：“你们在这里，就像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感受吧！”黎巴嫩的著名作家乔治·哈纳先生在欢迎我们的茶会上说：“在万隆我们和你们找到了团结的道路，我们和你们都深深地意识到亚非国家间的团结和合作是不可分裂的。你们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当我们离开叙利亚的时候，叙利亚著名的爱国者、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主席并荣获斯大林和平奖金的谢依合·木合买提·阿西买热，为了表示对中国深厚的友谊，一直把我们送到国界上，陪同我们走了110公里，沿途还指引我们观看了叙利亚人民过去反抗法国侵略军的战场遗址。

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我国人民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之情，“和中国人民友好”已经成为各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听到那里的人们说：“我们都是东方人，我们是弟兄。”当我们访问埃及阿斯旺城市的时候，当地人民群众排着仪仗队欢迎我们。有人说在埃及只有对总统才会给予这样隆重的礼节，可见埃及人民对我国人民是多么地友好。当我们代表团到达叙利亚

北部阿勒颇城市访问时，当地工人、农民、学生和艺术家等数百人走出市郊10公里以外欢迎我们，他们向我们欢呼：“阿拉伯人民和中国人民友好万岁！”“叙中友谊万岁！”各地人民仿佛见到了盼望已久的亲友重返家园似地接待了我们。

这种盛况，不仅出现在各个繁华的城市，而且也出现在遥远偏僻的乡村。当我国朝觐团到达距离开罗80公里的一个名叫“泰勒”村庄的时候，当地人民向我们高呼：“人民中国万岁！”“埃中友谊万岁！”“毛泽东万岁！”“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万岁！”欢呼之声响彻云霄。这个村庄装饰得像欢度节日一般。当我们到达耶路撒冷距离以色列边境很近的地方，我们被欢呼的人群围绕着，欢呼的声音不仅响彻约旦的土地，也响彻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这种欢呼声是边界阻挡不住的。

我们在这些国家的各个地方，听到那里的人民以伊斯兰教的圣人穆罕默德留下的格言：“学问即是在中国，你们也要学习。”对中国人民表示出极大的友情。

我国同中近东各国的友好合作 有了进一步的增长

在中近东各國訪問期間，我們同各國文化藝術界、教育界、宗教界以及政治界的著名人士進行了廣泛地接觸，進一步增進了我國人民和這些國家人民之間的友好合作。我們曾經代表我國政府同一些國家的政府代表舉行了有關文化合作的會談，簽訂了中國和埃及、中國和敘利亞的文化合作協定，同蘇丹和埃塞俄比亞兩國政府互換了信件，表示了發展文化合作的共同願望。在貝魯特，我們同黎巴嫩政府所指派的代表，就有关中黎兩國文化合作的問題交換了初步意見。

經過這次訪問，使我國人民與這些國家的人民彼此之間更加

了解了。我国朝觐团在阿拉伯各国访问过程中，再次说明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平等的政策，揭穿了帝国主义诬蔑我国对宗教采取“消灭政策”的欺骗宣传，赢得了各国人民的友谊。

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更加强烈

访问期间，我们看到中近东人民非常仇恨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伊士运河问题发生后，这种仇恨情绪更加强烈了。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总目标下，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分民族、宗教信仰、政治派别、社会地位，已经广泛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已经成为中近东各国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我们亲眼看到，许多年长的宗教领袖在礼拜寺、教堂，在群众大会上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抵抗侵略者。很明显，在这些国家，凡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人都受到人们尊敬，凡是庇护帝国主义侵略的人都遭到人们唾弃。

继英、法和以色列发动的侵略埃及的战争失败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公开叫嚣要代替英、法在中近东的殖民地位。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就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而制定的阴谋计划。美帝国主义者的目的是显然为了掠夺这些国家的石油资源和其它财富。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资源占资本主义国家石油资源的三分之二，1955年这里出产的石油达16200万吨，占资本主义国家石油出产量的四分之一。“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本质就是为了掠取这些国家的财富，并在这里建立军事基地，建立发动侵略战争的据点。他们叫喊要维护中近东的伊斯兰教圣地，不过是为了蒙蔽欺骗世人的耳目而已。

我们在这些国家听到人们这样谈论：“我们要求和人民中国增进友谊，要求中国援助。”不久以前，我接到阿拉伯各国许多朋友的来信，他们都表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决心维护自己国家

的主权和民族独立。如叙利亚著名的画家、和平战士沙易德·塔合森在信中写道：“亚非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一定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和它们的帮凶的恶毒计划……”。

我们体会到，中近东各国人民在万隆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为了维护自己民族的独立，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正在日益增长，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中近东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殖民主义制度一定会在全世界范围内遭到崩溃灭亡。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有删节。）

学习孙中山先生热爱 祖国的精神

20世纪初，在尊敬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组织者和领导者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将近300年的清朝帝制，使中国的封建王朝专制制度宣告结束，给中国被压迫的各族人民带来了希望。

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中，曾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他曾以巨大的希望和政治魄力同苏联建立了友谊关系。他在写给苏联政府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族问题的原则和内容，也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影响而变化的。孙中山先生的新的革命的民族纲领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作了如下规定：“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同一宣言中又说：“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由各民族行使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从这里显然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的锋利的矛头，主要是对准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所有的殖民主义者，它是要求中国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

刘少奇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曾经这样说：

“在这个时候，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从多年奋斗的经验中，认识了要达到救国的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终于勇敢地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联盟，展开了新的革命斗争。”

孙中山先生是坚决反对侵犯别的民族利益和侵略战争的。他热爱和平，不论任何弱小民族，他都要求他们成为过着自由平等生活的人。他也反对帝国主义者把他们的侵略政策，变相地换为欺骗世人的工具——世界主义。孙中山先生指出：“至于欧洲人现在所讲的世界主义，其实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

伟大的革命先驱、爱国主义者和民主派——孙中山先生，热爱祖国，他希望中国成为自由、解放和幸福的国家。

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一生斗争的愿望，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得以实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三十几年来走过了艰难困苦而光荣的道路，终于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各族人民的长期压迫宣告结束，并建立了各民族人民友好合作的大家庭——民主、幸福、自由、解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曾这样说过：“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

我们在纪念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時候，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他的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对人民无限忠

诚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祖国各族人民的心中。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学习他的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天山万里故乡行

我离开故乡新疆到北京工作，已经快三十年了。从前还经常有机会回去视察工作，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人虽然在新疆，却身陷囹圄，与外界完全隔绝了。打倒了“四人帮”以后，我又重新回到了北京。因为年迈体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踏上家乡的土地。但是我的心总还牵挂着我生活和战斗过的新疆，关心着故乡的发展和变化。每当我从文件、报纸、广播、电视中看到或听到新疆的消息，总是特别留神，故乡的一草一木都牵动着我的心。我从家人的信函和来京同志的交谈中得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近两年多来，新疆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很大的起色，有了新的发展。我在高兴之余，不禁萌动了回故乡去看看的念头。

去年的金秋时节，我长期以来的愿望实现了。趁新疆隆重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等烈士遇害四十周年的机会，我和我的老伴拉希达一同回到了故乡。除了参加纪念活动以外，我还到石河子、吐鲁番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不但听到了新疆领导同志的情况介绍，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的工作汇报，见到了新朋故旧，接触到了各民族的工人、农牧民和知识分子，而且亲眼看到了新疆的变化，具体感受到了它跳动着的脉搏。我高兴地看到，新疆确实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新的楼房、新的道路、新的工厂、新的农舍，新建设到处都有，连绿色的树都有许多是新近栽种的。汽车在公路上奔驰，我目不转睛，看了这边顾不上那边。在长途旅行中，大家经常劝我闭目养神。他们哪里知道，看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的新貌，使我精神倍增，哪里还用得着养

神！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长时间的坐车，居然不觉得累！

人老了也许都有这种特点，喜欢忆旧。我一边参观访问，一边回忆着它们的过去。过去的新疆我太熟悉了，它闭塞、贫穷、落后。只是在解放后，消灭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解放了生产力，新疆才开始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抛弃了“左”的一套条条框框的束缚，新疆的建设重新出现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新的起色，取得了新的巨大进步。同世界上先进水平比较，同国内兄弟省、市、自治区比较，新疆的成就也许是微小的；但是，考虑到新疆的过去，有许多建设都是从“零”起步的，那么，它的成就便是很大的了。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干旱地区之一。面积160多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是我国最大的省区之一，境内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三大山脉，以及准噶尔与塔里木两大盆地。分布在山区与盆地之间的，有千百年来生息在新疆这一地方的先民们辛勤劳动开辟出来的块块绿洲。

在新疆，古往今来生息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如今，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乌孜别克、锡伯、塔吉克、满、塔塔尔、达斡尔等十多个民族，便是祖国这一西陲边疆的主人。在长期的共同劳动、共同斗争、共同生活中，各族人民形成了亲密团结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虽然出现过一些曲折，但是，国家的统一和各族劳动人民间的团结合作，却始终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主流。

解放后，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的原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贯彻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新疆，先后建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等6个自治县，以及若干个民族乡，实现了少数民族当

家做主的权利。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新疆各级少数民族干部迅速成长。从自治区成立的1955年到去年，少数民族干部由46756人发展到181860人，增加将近3倍，其中各类专业干部由2472人发展到108555人，增加将近43倍。在各级党政部门中担负领导工作的少数民族干部，新近调整领导班子以后的情况如下：在自治区各部委厅局中占43.4%，其中在政府部门的36个厅局长中占63.87%；在各地州市党委领导班子中占40.52%，政府领导班子中占59.67%；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县、乡中，党政部门的主要负责干部几乎都由当地民族干部担任。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施，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密切了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新疆的各项经济事业中，农牧业经济占有重要的地位。考古发掘的地下实物资料表明，史前时期的新疆就已经有了羊毛织物和麦粒等，这表明新疆的农牧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可是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和交通的闭塞，生产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直到解放前，粮食的亩产量只有几十斤。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打碎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农业生产获得下迅速的发展，在国家的支援下，机械化程度也逐年提高。近年来又纠正了长期束缚自身手脚的“左”的思想影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贯彻允许一部分农牧民先富起来的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和发挥了各族广大农牧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1983年的农牧业生产成绩是极为令人兴奋的。粮食总产量已超过90亿斤，为历年来产量最高的一年，按人口平均每人可达670余斤，做到了粮食自给；棉花总产量达到314万担；牲畜年底存栏总头数达到3023万头。如果同自治区成立的1955年相比，农牧

业总产值增长2.86倍，平均每年增长4.95%；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相比，农牧业总产值增长52.9%，平均每年增长8.86%。这说明政策对头，干劲倍增，明显地促进了生产的迅速发展。

在谈到新疆农牧业发展情况时，不能不提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各项经济建设事业，尤其是农业生产上的巨大贡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我国农垦系统中建立较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单位。它的农业团场及工副业生产基地遍及天山南北。石河子垦区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农业垦区。原先，那里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周围是一大片荒地。抗战时期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建立卓越功勋的著名的三五九旅，转业到新疆屯垦戍边，从事农业生产，经过三十多年的辛勤劳动，现在的石河子已经见不到昔日的荒凉了。那里已是田连阡陌，林带成网，渠道纵横，道路宽阔，楼房鳞次栉比，糖厂、酒厂、棉纺厂、毛纺织厂等工厂一座连一座，还有农学院、医学院、医院、电视台等，已经成为一座名不虚传的戈壁新城。看到这些，我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不禁吟成一首小诗：

我看到今日花园般的石河子，
心中涌出了充满激情的诗。
如果没有党的英明领导，
哪会有戈壁变绿洲的人间奇迹？

石河子垦区与整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凝结着我们久经考验的解放军战士、各族支边青年以及当地农牧民的艰辛劳动结晶，其中包括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同志以及现在尚健在的习仲勋、王震、王恩茂等领导同志的关怀和心血。看到这些建设事业的巨大发展，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开拓者们的历史功绩的！

近两年来，各族农牧民的生产劲头更足了，而且眼界也开阔了，目标也远大了。他们人在边疆，却注视着国内兄弟省区甚至

世界市场上的需求，打算将一些适销对路的农副产品远销到国内外市场上。商品生产获得很大的发展，片面、单纯的“以粮为纲”被摒弃了，人们都向着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地尽其力、人尽其才的方向努力。勤劳致富的人很多，已出现了不少“万元户”，年收入在三五千元的农户就更多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有很大提高，到处在翻修或增建新房，改善居住条件，以及添置收录机、电视机等高档商品，许多年青人骑上了轻骑摩托车。在吐鲁番，我见到了老朋友艾则孜阿洪的亲属。他本人已年老谢世，他的儿女们都异口同声赞扬党的政策好。他们家已经买了大卡车和摩托车，他们还说要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去旅游。

少数民族人民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解放初期，和田的库尔班吐鲁木翻身得解放，要骑着毛驴到北京见毛主席，党和政府知道了他心情后，用飞机接他到北京。至今我还记起当年毛主席同他亲切握手的动人情景。如今，农民在经济上也翻身了，过上好日子了，愿意自费到北京去看看。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

自治区的工业交通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回想起解放以前，新疆几乎没有象样的现代工业，日用工业品大都依赖从苏联进口。煤油、汽油、水泥、火柴、纺织品以及其他工业品，在维语中都直接使用俄语借词，这说明了这些借词是同产品同时进口的。这种情况同汉语中称舶来品为“洋油”、“洋灰”、“洋火”等几乎没有区别。

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今天的新疆已经建立起包括钢铁、机械、煤炭、电力、石油、化工、水泥、有色金属、纺织、造纸、制糖、制革等现代化的工业企业。1983年的工业总产值，同1955年相比增长近13倍，平均每年增长9.85%；同1978年相比增长60.8%，平均每年增长9.95%。目前，许多工业产品区内已自给有余，可以支援兄弟省区，有的已经远销国外，并且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一定声誉。这是每一个新疆的同志都引以自豪的。

交通建设的成绩也是引人注目的。新疆的道路虽然比不上蜀道之难，但是，由于它的荒凉、僻远、漫长和交通工具的落后，同样使人视为畏途。从前，骆驼队贩货从内地到乌鲁木齐，要走三五个月的时间，天气热了白天不能走，只能踏月夜行，一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新疆人民盼铁路，从清朝末年盼起，盼了半个世纪，连陇海铁路都没有修完，哪里还谈得上新疆！解放后，国家迅速完成了陇海路西段的铺轨任务，并且完成了兰新铁路的建设。我国第一条横越国土的交通大动脉终于建成了。六十年代中，火车满载着各种物资，越过戈壁，穿过天山，到达乌鲁木齐。目前，南疆铁路吐鲁番至库尔勒段已交付使用。铁路的建成，把孤悬塞外的新疆同祖国各地更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初步改变了新疆封闭的状态，为新疆各项建设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同铁路相衔接的是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现在新疆各县、各乡都有公路相通。公路是新疆的主要交通线，通车里程达 20000 余公里。从乌鲁木齐到南北疆中心城市，以及北京、上海、兰州、西安等地，都有了直达航空班机，密切了边疆同国内其它省区的联系。从北京、上海等地到乌鲁木齐，目前只消 3 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朝发夕至”这句话，用在这里还真嫌太慢呢！

新疆文教事业的发展同样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1983年，全自治区高等院校已发展到13所，教师4274人，在校学生16191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57%。全区广播电视台、业余大学、职工大学、函授大学的在校学生人数已达14714人，接近于正规大学在校学生人数。在这里，我以同我关系比较密切的新疆大学为例，来说明新疆高等教育事业的深刻变化。新疆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之一。它的前身是1935年建立的新疆学院。在半个世纪里，她走过了十分坎坷的道路。刚建校时，它只有两个系、一个专修科。抗

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派去的一批优秀干部和进步人士的努力下，到1941年，新疆学院已经初具规模，有了五个系、三个专修科和一所附属中学。后来，由于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新疆学院奄奄一息。1946年，我就任新疆学院院长，经过3年惨淡经营，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时，全校也只有学生379人。解放后，党和政府对办好这所高等学校十分重视，新疆学院获得了新生，发展成为综合大学。今天，它有文、理、法三个科、十一个系、二十二个专业和十一个研究室，在校学生4547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60.68%，各族教师1040人，已经承担为国家培养硕士研究生的任务。这次我回校参观时，它的巨大变化使我不胜感慨，无比激动。

中小学教育的发展，也是使人高兴的。1983年，中等专业学校已有101所，在校学生24881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58.6%；中小学校10605所，在校学生2828733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44.73%。近年来民族中小学发展很快。从1980年到1983年，民族中学由604所发展到808所，民族小学由4524所发展到5009所。牧区寄宿制学校在1983年已经建立291所。

包括各类专业的新疆科学事业单位，已经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地逐步建立起来。各族科技干部在党的培养下，正在迅速成长，在自治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着日益巨大的作用。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和攻关项目中，也有新疆各族科研人员参加协作，许多科研成果已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解放初期，全新疆只有48所规模很小、设备简陋的卫生机构，现在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已经发展到3229所，病床63113张，卫生技术人员86624人。维吾尔民族医药事业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许多地方建立了民族医医院，为各族病员服务。广播电视台发展迅速，除乌鲁木齐及南北疆各中心城市业已建成的电视台外，1983年建成和正在修建的各地电视录像转播台65座、差转台140座。新疆电视台专门开辟一个频道播

送维吾尔语节目。其它如文艺、新闻、出版、体育等事业，也都有迅速的发展。

二十五年来，新疆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就，都闪耀着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4月，党中央在一次会议上重申了在十年内乱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讨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民族工作。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号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了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指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经过几年的努力，拨乱反正，民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如大力表彰民族团结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大力宣传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的“两个离不开”的思想，使新疆近年来的民族关系成为解放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在新疆逗留的日子里，我到处感受到各族群众团结融洽的欢乐气氛。

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民族工作的重心也转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一般处于比较先进的水平，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解放后虽然发展迅速，但是相比之下仍然是落后的。社会主义要求各个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必须努力创造条件去逐步消灭这种民族间的事实在上的不平等。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历史性任务。

为了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党和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国家已确定由江苏、上海二省市同新疆实行“对口支援”。这是汉族地区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一种固定的经济合作形式，受到少数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欢迎。去年我

回到乌鲁木齐之前，那里的经济技术协作邀请会才结束。会上，除了进一步落实新疆与6个省市原来达成的126个协作项目外，又同19个省、市、自治区商定了279个经济联合与技术协作项目，还同7个省、市、自治区达成8项物资交流协议。按照这些协议，一年来已有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到新疆指导工作，传播先进技术，新疆也有许多各族专业干部到内地学习技术和管理经验。

可以预期，内地与边疆的“对口支援”，必将使双方收到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的作用，必将推动我国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也必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但愿上苍假我天年，使我得以再作故乡之行，亲自尝一尝由这“对口支援”大树上结出的民族团结的硕果。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在关闭我的小房间里写过科学幻想小说，幻想我的家乡已经变成人间天堂一般。这一方面是为了充实那漫长的狱中生活，一方面也是为了寄托对故乡的爱恋。幻想终究是幻想。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经过新疆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幻想变成现实的日子已不太遥远了！我这次新疆之行的所见所闻，百倍地坚定了我的这一信心。

（原载《红旗》1984年第17期）

和王震同志最初相识的日子

1949年9月下旬，陶峙岳将军和我分别率领新疆军政界宣布和平起义，脱离反动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反动派策动公开敌人的暴乱和暗藏敌人的蠢动，新疆局势会不会出现动荡，当时还是难以预料。我日夜盼望着人民解放军早日到来。王震同志是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的司令员，一向有“中国的恰巴耶夫（夏伯阳）”之称，我对他敬仰已久。当年12月7日，他的及时到来，使我十分高兴，心里踏实多了。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我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还免于候补期直接吸收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对新疆少数民族干部的信任和殷切期望。记得王震和徐立清同志在介绍我入党时说：“你们过去从事的秘密工作，就是共产党员从事的革命工作。你们已经经受过了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可以免于后补期。”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长期以来的夙愿，这样，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人民政府成立后，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烂摊子，真是百废待举。王震同志作为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的第一书记，对人民政府的工作给予了极大支持。他遵循党中央的指示，指挥人民解放军迅速挺进天山南北各地城乡。解放大军所到之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纷纷建立起来。各地人民政府又在解放军的配合和支持下，迅速地平定了一些地方的反革命暴乱和股匪，肃清了匪特，取缔了反动帮会。中央从内地各兄弟省调拨了大批物资支援新疆。新疆又恢复了中断已久的新疆同苏联的地方贸易，同时又在新疆境内开展了城乡物资交流。通过这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措

施，新疆社会得以安定，长期以来失去控制的物价也终于得到了平抑，各族人民开始过上了翻身解放的安宁生活。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在新疆这一新解放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威望也大为提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为了吸收游资，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考虑到新疆经济落后，上级分配给新疆的任务只有20万份，可是在短短8个月内，新疆城乡共认购了52万份。这一件事充分说明了新疆各族人民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无比信赖。这多出的一大笔钱，中央同意新疆用于整修各地的水利设施。社会闲置资金的回笼，为建设集聚了必要的资金，有利于新疆各地货币的统一，又有利于物价的进一步稳定和社会的安宁。凡此种种，都为下一步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由于历代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恶意宣传，新疆各族人民之间存在着种种隔阂，消除这种隔阂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王震同志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好的表率。他以豪放爽朗的性格、诚恳热情的态度来对待他所接触到的每一个少数民族人士，给新疆人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1949年底，王震同志和他的爱人第一次到我家来作客，同时也是为了通知我爱人拉希达去北京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他们对我这个解放前就当省主席的家庭陈设的简朴感到十分意外。而使我们全家感动的，不仅是王震同志亲自上门通知，还在于他把一切行程都安排得非常妥贴周到。对待普通居民群众，王震同志也十分亲近。记得1950年我陪他一同去伊犁，他在新建成不久的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烈士墓前，向当地参加过三区革命的干部战士和各族群众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同他们热烈拥抱。一位高级领导人同少数民族普通群众拥抱，这在解放前是绝对见不到的。这使在场的所有人都十分感动，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王震同志以他的真诚换来了新疆少数民族人民对广大汉族干部的信任。

各族人民的相互尊重和信任，在新疆来说是比什么都宝贵的。

在我同王震同志的接触过程中，使我最受感动的是他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好事、快办好事的心情。解放前，我接触过各行各业的汉族人，很多人认为新疆不可久留。一些官吏来新疆是专门搜刮老百姓的，目的达到，当然要走；少数人有远见卓识，想在新疆干一番事业，但因政治腐败以及人力资金的限制，不能有所作为，只是空怀一腔抱负而已。王震同志却不同，他一到新疆就爱上了新疆。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新疆真是好地方，新疆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了全国人民的支援，新疆一定会很快建成美丽家园。谈到这一类话题时，我免不了要向他介绍苏联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建设成就，他也总是向我描绘他设想中的新疆建设蓝图，我们在一起憧憬着新疆美好的前景。可是当时的新疆又是怎样的落后啊！百废待兴，美好的前景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现实呢？

王震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命令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抽出一部分力量从事屯垦，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他还亲自视察了南北疆的荒原，为垦区选定地点，并号召人人节衣缩食，为举办地方各项建设事业筹集资金。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人民解放军在戈壁荒滩上垦辟了一二百万亩良田；在乌鲁木齐兴建了猛进、八一、红雁池等三大水库；兴办了八一钢铁厂、七一纺织厂、六道湾煤矿、十月汽车修配厂、苇湖梁发电厂等十多个工矿企业；兴建了八一农学校、新疆医学院、矿冶技术学校（今新疆工学院前身），扩建了新疆学院（今新疆大学前身）。我记得当时医学院建筑工地缺乏人力，王震同志听到汇报后，立即派一个团的解放军协助基建。王震同志经常深入下层，发现问题立即解决，这种说干就干、雷厉风行的作风，是我过去同国民党政府官员相处时从未见过的。当时，全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王震同志领导下的新疆，居然从无到有兴建了历史上第一批现代化

的工矿企业和第一批正规的高等学校，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新疆美好的建设前景的实现，已经是曙光在望了！

后来，王震同志和我先后都到北京工作，见面接触的机会比在新疆共事时少了一些。但是友谊又使我们经常得以聚会。1984年，王震同志和其他许多老同志到我家里来，祝贺我90岁的生日。他激动地对大家说，10年后都要来参加包老的百岁寿辰。听到他的话，我心情非常激动。第二年，为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王震同志和我作为中央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又一起回到了多年来一直神游梦想的新疆。我们旧地重游，回忆起了当初创业的艰难。当看到我的故乡四化建设又有了新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又有了新的提高时，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我这时不禁想到，这都是由于当年王震同志在新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啊！

“西伯利亚”名称的由来

一、西伯利亚与西比尔

西伯利亚是一广大地域，西起乌拉尔山，东迄楚科奇半岛。从自然地理上说，这一广大地域又分为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两大区域。西西伯利亚自西从乌拉尔山伸展至鄂毕河和叶尼塞河的分水岭；南从哈萨克加盟共和国伸展至北冰洋海岸。东西伯利亚自西从鄂毕河和叶尼塞河的分水岭伸展至楚科奇半岛；南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的东北边境伸展到北冰洋。^①

汉语“西伯利亚”这一名称，不是汉语所原有，而是从外文译过来的。那么它是从哪一种语文译过来的呢？德文作 *Sibirien*，法文作 *Sibérie*，英文作 *Siberia*，很显然它是从英文的 *Siberia* 译过来的，所以它是一个晚近出现的名称。而晚近的名称不容易找出历史上的线索，必须找出它的较古的名称方可。

“西伯利亚”俄文作 Сибирь，用拉丁字母写出来作 *Sibir*。而这正是德文、法文、英文的写法的由来。明了这一点后，那末就对了解“西伯利亚”这一名称的历史和意义有了办法。

原来俄文西比尔 (*Sibir*)，是从一个叫“西比尔”的人们共同体的名称演变而来的，最早它见于俄文中是在1483年。沙皇把自己兼称为西伯利亚的皇帝则始于1563年。西比尔人灭亡后，他们所留下的几个城和地区即被称作西比尔，最后又扩大为现代

① 贡洗文译，H.H.巴朗斯基著：《苏联经济地理》中册，第244、270页。

西伯利亚广大地域的名称。

西比尔最早见于西方史籍，是在14世纪初波斯史学家拉施得的史集中。拉施得说，在额尔齐斯河与吉尔吉斯之间有额比尔—西比尔 (Abir-Sibir)，也作伊比尔—西比尔 (Ibir-Sibir)。其后历史学家阿布耳嘎齐也这样说^①。法国学者开特迈尔 (M. Quatremère) 以为 Abir 就是 Abaras^②，也作 Avares^③，

Sibir 也作 Sabir。在东方原为两个不同的部落名称，在西方被结合起来，而称为 Abir-Sibir。《元朝秘史》卷 12，记 1207 年成吉思汗命他的长子术赤征林木中百姓吉尔吉斯，到了“失必儿种”地面。又《元史》卷 132，说玉哇失与海都将军们战于亦必儿失必儿之地，屡次把他们打败。这个“失必儿”就是 Sibir，“亦必儿失必儿”就是 Abir—Sibir。14世纪前半期，米萨利克—阿拉卜沙儿 (Mesalek Alabsar) 写 Sibir 或 Abir^④；伊宾阿拉伯沙 (Ibin Arab Shah) 记载钦察是在 Abir 或 Sibir 的北边。1375 年法国国王查理第五时代所编的加他兰 (Catala) 地图，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有 Sebur 城，这个 Sebur 很显然是在托尔斯克 (Tobolsk) 的附近^⑤。

① 《鞑靼系谱》 (*Histoire généalogique des Tatars*)，第 102 页把 Abir Sibir 误写为 Aprusir。

② 开特迈尔：《拉斯特波斯蒙古史》 (*M. Quatremère, Histoire des Mongols de la Perse écrite en persan by Raschid-eldin*)，第 413 页。

③ 这个 Avares 欧洲学者认为即汉人历史中之蠕蠕，《魏书》、《北史》中有传。

④ 薄乃德：《中世纪研究》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第 2 卷，第 37 页。

⑤ 玉尔—柯第：《东域纪程录丛》 (*Yule—cordier,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第 2 卷，第 307 页。

1394年至1427年，巴维利亚人西里德别格 (J. Schilderger) ① 曾在非洲、亚洲游历过好多国家，于1402年伴随铁木尔开抵伏尔加河畔。他说那个地方有一个广大国家叫比西堡 (Bissibur) 或伊比西堡 (Ibissibur)，它的人民不但不信基督教，而且也不愿意有人传教。这个比西堡或伊比西堡是 Abir—Sibir 的变体。1517年至1526年有个叫郝不耳斯坦因 (Herberstain) ② 的人曾旅行过俄罗斯地区，他说在加马河岸有一地方名叫西比尔 (Sibir)。俄罗斯历史学家瑞米索夫 (Римисов) ③ 记载，1581年西比尔地方库楚木汗 (Кучум Хан) 战败后，丢弃了他的首都西比尔。这个西比尔是距托尔斯克城16公里，额尔齐斯河右边高岸上的一个破城子。马克那逊说在伏尔加河傍“可能有不少的西比尔城”，那里有一个“森比尔城”(现名乌里牙诺夫城)，可能也是由西比尔转化来的。换一句话说，这些城名是由西比尔人民遗留下来的。

总之，最早西比尔是一个部落的名称，后来这个部落灭亡后，有些城，有些地点，即被称作西比尔。作为一个地区说，西比尔最早是很小的，它仅包括乌拉尔山以东，托拉河 (塔布尔河左支流)、套瓦河 (伊尔基斯左支流) 流域，除此之外则不属焉。从16世纪中叶起，由于俄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逐渐向东推进，首先把西比尔这个名称适用于乌拉尔山至叶尼塞河流域地带，这一地带今天叫作西西比尔 (即西西伯利亚)。17世纪时，俄国向东发展到东海岸，又把叶尼塞河流域到东海岸这一广大地带叫作东西比尔 (即东西伯利亚)。

① 《东方旅行记》 (Reise in den Orienf)，第3715页。

② 《旅俄笔录》 (Rerum Moscoviticarum Commentari, iNotes upon Russia translated by R.H. Major)，第60—86页。

③ 瑞米索夫： (H.A. Римисов) 《西伯利亚历史》，第105页。

二、西比尔与鲜卑

既然西伯利亚就是西比尔，既然西比尔是出自一种人们共同体的称呼，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哪一种人们共同体的称呼和它相当呢？我们以为是古代的鲜卑。这种说法倒不是我所独创，而是前人即有此说法。何秋涛《朔方备乘》曰：“鲜卑音近锡伯，今黑龙江境有锡伯一种，……即鲜卑遗民。”又曰：“东汉魏晋之鲜卑其庭幕在喀尔喀，而封畛则在北海，今俄罗斯东偏之锡伯利部咸为所兼并。”^①李文田《元朝秘史》注曰：“失必即鲜卑之对音也……亦作席伯，亦作席北，既非索伦，亦非蒙古，即鲜卑遗民也。《一统志》作西毕尔斯科，《瀛环志略》作西伯利。”^②这就是说，今天西伯利亚的名称出于鲜卑，而鲜卑又是一种人们共同体的称呼。丁谦更进而指出，古代鲜卑分居在西伯利亚，中国史书上的鲜卑不过是这个族南迁的“散姓”。“鲜卑为塞北三大种族之一，族派繁衍，部落极多，东胡仅其一支而已。大鲜卑山在俄属伊尔古斯克省北，通古斯河南，今外蒙古以北之地，西人皆称为悉比利亚，悉比即鲜卑转音，以其地皆鲜卑人种所分布故也。西儒谈人种学者以悉比利亚及东三省人为通古斯种，通古斯河即大鲜卑山所在。一以河为标帜，一以山为标帜，中西所考，若合符节。然则鲜卑之名源出大鲜卑山，而非由后来之更改，彰彰明矣。惟拓拔氏为彼种贵族，世为君长，其南迁也亦较后，此传鲜卑不过彼种中散姓，分徙甚早，因其但有氏族，不立部名，故中国混以东胡目之。自为匈奴破后，生息百年，复成部落，至前汉末，方与中国有交涉。此鲜卑入史之始。”^③

① 《朔方备乘》，卷17。

② 《元朝秘史》，卷12。

③ 《后汉书·鲜卑传地理考证》，见浙江图书馆丛书版。

鲜卑作为一个部落的名称而与内地交通，始于纪元后49年（建武二十五年），但这个部落的存在必然远在纪元前若干世纪，它与乌桓在东胡这个概括的名称之下，也曾于纪元前4世纪初和赵国发生过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后来匈奴强大，它才与内地隔绝；等到纪元后1世纪匈奴衰落，它才又和内地交通。匈奴西迁后，它的头人檀石槐统率漠北，其版图之大，和匈奴相仿佛。从4世纪到6世纪，北方人民大迁徙时代，鲜卑人曾先后迁入内地，成立王朝，为慕容氏、宇文氏、乞伏氏、秃发氏、拓拔氏等等；另外，蠕蠕、吐谷浑也是属于此族。

鲜卑人迁入内地后，都逐渐融合在汉族大集团之内。其在边缘遗留的族落，则另起名称，为契丹、库莫奚、地豆干、霫之类；更远的族落由于译音的不同，又别有名称，为失韦、室韦之类。其实，失韦、室韦即鲜卑的音变^①。失韦或室韦蔓延于黑龙江流域之南北以及贝加尔湖以东地区。13世纪的蒙古，即《旧唐书》的蒙兀室韦^②，《新唐书》的蒙瓦部，它的原始居地盖在今日之额尔古纳河流域一带^③。

鲜卑不是一个单纯的族系，不能说它是纯蒙古系，不能说它是纯通古斯系，也不能说它是纯突厥系；它是属于混合族系的一个集团。正如匈奴有人说它是属于蒙古系，又有人说它是属于突厥系，而不属于任何一个单纯的族系一样。试看《后汉书》本传说：“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十余万落，皆自号鲜

① 1934年《亚洲学报》，吐火罗文与库车文注三，法国伯希和还原为 Särbi, Särvi, Sirbi, Sirvi，但上古音韦带后舌音 G。中古音虽然软化也没有变成唇音 b, v。

② 《旧唐书》，卷199下。

③ 《新唐书》，卷219。

卑，鲜卑由此渐盛。”由此可见鲜卑成份之一般了。

前头说过，Abar 是 Avares，而 Avares 可能是《魏书》、《北史》中的蠕蠕。此说西人圣马丁 (Saint-Martin) 主张于前，马迦尔特 (Maguart) 赞同于后，沙畹 (Chavannes) 也表示同意^①。Avares 既然是蠕蠕，那么 Abar-Sibir 或 Avar—Sibir 当作蠕蠕鲜卑了。考《北史》本传公元 5 世纪时它为北方大国，“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其常所会庭，敦煌张掖之北。”552 年为新兴的突厥土门可汗所击灭。这样大的一个国灭亡，不等于它的人民完全灭亡，当时蠕蠕人民在突厥压迫下必然有一度毫无秩序的大迁移，有的迁入中国内地，有的迁入勿吉，有的北徙，有的西迁。但是，当时及后来西突厥方强盛，蠕蠕人不可能迁于西突厥的领域内，他们必然再往北，或再往西迁，其往北迁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就是后来 13 世纪波斯史学家拉施得所说的 Abar—Sibir 或 Avar—Sibir (蠕蠕鲜卑)，《秘史》、《元史》则简称为失必儿 (Sibir)，或亦必儿失必儿 (Ibir—Sibir)。

三、西比尔与鲜卑的意思

有人说西比尔的意思是蒙古语“丛密”，又有人说是由俄语 Sievier 转化为 Sivir 或 Sybir，或 Sibir 而来，指亚洲北部而言^②；更有人拿可瓦里夫斯基《蒙俄法辞典》所载 Sumır 说是指世界中心，如果再仔细查一下该辞典，那末还有 šibir, šäbir (跌倒), šobır, šubır (低语交谈), šibür (小橡

① 冯承钧译，沙畹著：《西突厥史料》，第 163 页。

② 扎布里加：《原始西伯利亚》CM·A·Czaplicka: Aboriginal Siberia)，第 1 页。

树)这些意思^①。但是拿现代语言来比附古代的字义，是十分危险的，同音字太多了，很难指出它的真实意思。我觉得，既然西比尔是由古代的鲜卑而来，那么就应当从“鲜卑”的意思来进行考究。

鲜卑这一词，最早见于《战国策》、《楚辞》、《淮南子》、《史记》、《魏志》诸书，后日的注释家各有所说。有的说是指革带，有的说是带上的钩，有的说是一种瑞兽，究竟是什么，好象没有确定。

鲜卑，古书中或作师比，或作胥兜，更有私批、斯比、犀毗等等。王国维繁征博引谓：“黄金师比者具带之钩，亦本胡名。《楚辞·大招》作鲜卑，王逸注：鲜卑，绲带头也。《史记》、《匈奴传》作胥兜，《汉书》作犀毗，高诱《淮南》注作私批头，皆鲜卑一语之转，延笃所谓胡革带钩是也。……古有大带有革带……然古革带当用钩……然其制无考。其用黄金师比为带钩，当自赵武灵王始矣。”^②总起来说，王国维同意延笃带钩的说法。日本白鸟库吉更进而从语言上来解释，以为古音鲜、胥、犀、师、私等字当读为 sa 或 sai；而卑、兜、毗、比、批等字当读为 pi。因而他以为鲜卑、胥兜、犀毗、师比、私批等古音当读为 sapi 或 saipi。他指出《史记》、《匈奴传》、《胥兜》下张晏所注：“鲜卑部落瑞兽名也”^③，为解决“鲜卑”意思的关键，并指出鲜卑作瑞解，部落作兽解。因而他从满州语祥瑞、吉兆、灵异、异人为 sabi，而说是鲜卑的对音。又以为满

① 可瓦里夫斯基：《蒙俄法辞典》(J.E.kowaleewsky: Dictionnaire Mongol-Russe-Fraucais)，第二册，第1480、1520、1538、1541页各字下。

② 《胡服考》，见《王忠愍公遗书》。

③ 《史学杂志》，第21编，第7号内，

洲语作兽解的 gurugu，蒙古语作兽解的 guruksu，为“郭落”的音译。那就是说，鲜卑部落的意思是瑞兽。

我们转回来考察一下白鸟的说法，发现他对鲜卑、犀毗、胥纰、师比、私批等字的古音的理解有问题，同时也发现了他对张晏注释的领会不妥当，因而对鲜卑这一名称所作的解释完全错误。

顾炎武对鲜卑的古音互转虽有论证，如云：“鲜、相然切，古音犀，《汉书·匈奴传》黄金犀毗一。师古曰：犀毗，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①但如何语有轻重，他没有说出来；今如把它的古音写出来，那就分明了。鲜上古音作 Sjan，中古音作 Siän；卑上古音作 p̥ieg，中古音作 pjiě。但犀上古音作 Siar，中古音作 Siei；毗上古音作 biar，中古音作 b'ji。师上古音作 Siar，中古音作 Si，比上古音作 piar，中古音作 pji。私上古音作 Siar，中古音作 si；纰上古音作 biar，中古音作 b'ji。鲜的-n-音可以转为犀、师、私的-r-音，如 Arsack，史书中作安息的例子；又如伯希和指出鲜卑→室韦 (šärbi) → šärvi) 的例子。至于各字 g、r 音的收尾，到中古都已失掉，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六世纪鲜卑的一支迁入额尔齐斯河流域而作 Sibir 为正确^②。这个 Sibir 原为 Sirbir。凡两个元音之间有 r 音而末尾又有 r 音，则中间的 r 常省掉，如突厥语 kigrür 之作 kigür (领人)，barir 之作 bar (给)^③。

① 《唐韵正》，卷一。

② 高本汉：《汉字形声谱》(B. Karlgren: Grammata serica)，各字下。

③ 葛玛丽：《古突厥文法》(A. von Gabain: Alttürkische Grammatik)，第 5、6 页。

至于张晏所注：“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当解作“鲜卑”是郭落带上的瑞兽的名称。如果这样理解，那末“鲜卑”应是一个兽名，而为鲜卑人所尊贵或敬拜。《钦定蒙文汇书》有 šobär 一字，汉义为貂，五爪虎也^①。查《康熙字典》有不少的解释，大致是一种虎，大如狗，文如狸。又引东晋人的《字林》云“似狸而大，一云似虎而五爪”。既然一种虎而有五爪，那就是特异的兽。《前汉书·武帝本纪》“媵五日”下注引苏林曰：媵祭名也，貂，虎属，常以立秋日祭兽王者，亦以此日出猎，还，以祭宗庙，故有貂媵之祭也。”可见这种兽不但为北方草原人民所敬拜，汉人也以为兽王而祭之。难怪乎张晏认为它是一种瑞兽之名！或者说 šobär 与 Sibir 有些音声上的差异，不错，这正如顾炎武所说“语有轻重耳”，试看14世纪加他兰地图把 Sibir 作 Sebür，便是一个例子。

至于“郭落”，伯希和在1928年至1929年曾在《通报》论王国维的《胡服考》，即已指出是 gurag 的对音，突厥语的革带^②，伯希和又在1930年指出《南齐书》的“胡洛真”（带仗人）为 uragčen^③。11世纪的突厥语辞典有 gur 注为腰带 (leibgurt)^④。又北京图书馆所藏明代《高昌馆译书》有 guur(库儿) 也作带讲^⑤。今天维吾尔语的 gun 则作缝线讲，显然语言上已有变更了。

总而言之，西伯利亚是由英语 Siberia 音译而来，而英语

① 《钦定蒙文汇书》，卷九。

② 《通报》(T'oung pao)，1928—1929年本。

③ 《亚洲学报》，1930年本，第261页。

④ 卜克曼：《中古突厥辞汇》(C. Brockelmann: Mitteltürkischer Wortschatz)，第164页。

⑤ 《高昌馆译书》，“器用”门，第62页下。

Siberia 又出于俄语 Sibir，它是一种人们共同体的称呼。这种人们共同体在古代汉文史书中称作鲜卑，它的意思是一种兽，相当于蒙古语 šobar（貂 = 五爪虎）。因为鲜卑人崇拜它，把它用作本部落的名称，同时把它的形象用在金属带钩上，以自别于其他部落的人民。

（本文系作者与冯家昇同志合撰，原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

关于新疆历史的若干问题

新疆，在以往的史籍中被称作“西域”。远在两千多年以前，它就已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从那时起，它的命运便和全中国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新疆和中原地区的历史关系，在我国历代文献中都有着大量的记载，而且为新疆多年来出土的大量历史文物所证明。新疆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祖国西北边疆，为保卫和建设我们伟大祖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9年10月，在若羌县米兰古城遗址中出土了维吾尔人坎曼尔所写的三首诗。现抄录《忆学字》一首：“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倦疲，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迄今皆通习为之。”可见，新疆的文化在唐代和内地没有两样。“坎曼尔诗”写于元和十年即公元815年。坎曼尔那种民族融洽的感情也是十分令人感动的。

其实，19世纪以来，新疆各地出土的文物，早已证实和丰富了这一历史关系的内容。依据这些文献和文物资料，我们知道在清代以前，新疆地区称作“西域”，西域即祖国西部疆土之谓。1755年（清乾隆二十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并在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建立直接的军事、行政管理之后，才把这一地区改称“新疆”。1884年（清光绪十年），清政府又在这一地区设立行省。因此，新疆也就是新建立的直辖行政区域或新设立的行省的意思。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则是19世纪时随着世界列强在中亚地区实行殖民主义侵略活动而出现的名称。当时，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中央亚细亚以及新疆地区，统称之为“土耳其斯坦”，

并以泽拉夫善河为分界，以西的地区称为“西土耳其斯坦”，以东的地区称为“东土耳其斯坦”。这种名称完全是以语言和地理概念为出发点的，包含着明显的侵略意图。有人把当年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侵略目的而使用的地理名称说成是“维吾尔人的祖国名称”，这显然是对维吾尔族人民的侮辱。

新疆和中原地区悠久的历史关系，可以追溯到历史的远古时期。大量考古资料表明，新疆出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的彩陶，和后来形成为汉民族主要来源之一的夏人的仰韶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在公元前五——三世纪时的著名汉文文献《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中，就已经有了关于新疆地区、昆仑山、赤水等的记载。公元前2世纪西汉政府派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新疆与中原地区的历史关系开始进入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时期。

从汉武帝时（公元前140—87年）起，“西域土地内属”，新疆地区正式列入中国的版图。西汉和东汉政府都在新疆地区设置了都护府及其所属戊己校尉，用以统辖当地36国（后分为50余国，即把一个城市作为一个“国”。如民丰也算是一“国”，可是，它只有356人）的军事、行政，在这个地区正式行使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内地各族人民自动前往或被征调前往新疆，在轮台、渠犁、车师、伊吾等许多地区屯田，把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带到新疆，和新疆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了新疆这一辽阔的疆土。汉代名将傅介子、常惠、郑吉、班超等人，在新疆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击败了匈奴，使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匈奴奴隶制的野蛮奴役。同时，还开辟并维护了誉满中外史册的“丝绸之路”，增进了我国对西方的了解和经济、文化交流，也促进了新疆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丝绸之路”上的吐鲁番和民丰县出土的大量精美丝织物，是我国各族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团结的实物例证。

唐朝政府对于西域的统治，沿袭了两汉以来的都护制度，在

安西（今库车县境）、北庭（今吉木萨尔县境）设立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统辖天山以南地区，其下设置了焉耆、龟兹、于阗等都督府；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以北地区，并在这一地区按照内地行政建制划为若干府、州、县。唐朝政府对西域的统治，比之两汉时期更为加强了，新疆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更为紧密了。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中西商旅不绝于途。处于中西交通要道的新疆各地的经济、文化，也日益繁荣、发展起来。唐代以后，虽经五代、辽、金、两宋时期的变乱，新疆和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一直没有中断过。

蒙古和元朝时期，新疆和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209年（蒙古太祖四年）蒙古击灭乃蛮部落后，高昌维吾尔率先归服蒙古，成吉思汗命维吾尔亦都护为第五子，“宠异冠诸国”。元朝政府在维吾尔地区置行尚书省，在天山南北路设元帅府、御史台、按察司、宣尉司、提举司、交钞库等机构，直接管理新疆地区的军事、行政、司法、财政等事务。许多维吾尔上层人物入仕元朝，其中不少人位至宰相、元帅、疆吏和大臣，为元朝政府的军事、行政、财政、文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元朝统治集团中仅次于蒙古贵族的重要成分。

蒙古和元朝以来，新疆各地为蒙古贵族直接统治。元亡以后，新疆地区为蒙古后裔的封建势力集团所分割。明朝政府对这些封建割据的“残元之裔”实行“抚绥”政策，承认他们对各自地区的统治权力，但他们必须接受明朝政府的册封、任命，服从军事调遣，他们之间的争执也须由明朝政府裁处。同时，明朝政府还在哈密建立哈密卫，封元裔统治者为忠顺王，颁给金印，直接派去长史、纪善、辅导等官吏，使其“为西域襟喉”，“领西域职责”，从此，哈密地区便成为明政府管辖的一个行政区。

18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贵族和大小和卓的叛乱以后，在全疆各地建立起直接的军事、行政统治，设将军府于伊

犁，在乌鲁木齐、喀什噶尔、塔城等地设都统或参赞大臣，其它各地设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1884年，清政府在彻底摧毁浩罕入侵者阿古柏建立的政权并收复被沙皇俄国侵占的伊犁以后，进一步在新疆设置行省，实行更为直接的军事、行政管理。这些措施，大大增强了新疆各族人民抵御外国侵略势力、保卫祖国领土和主权的能力，同时也进一步密切了新疆和内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

两千多年来，新疆与祖国的历史关系，既不是一般的朝贡与封赐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暂时的藩属关系，而是表现为长期不间断的国家行政权力在这一地区的直接行使。上面的一些史实，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新疆各族人民和汉族以及内地其他各族人民，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远在汉代，汉族人民就把开挖“井渠”及利用井渠灌溉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传到了新疆。此后，养蚕、缫丝、冶炼等生产技术也陆续传入新疆，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新疆地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棉花、葡萄、核桃、石榴、西瓜、黄瓜、胡麻、苜蓿等等，也从新疆陆续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内地各族人民农业生产的内客。汉族先进的文化对新疆各族人民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新疆的文学、美术、音乐等也同样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正是这种广泛开展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族经济、文化事业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使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深厚牢固的兄弟关系。

长时期以来，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各族人民一道遭受到外来侵略势力的危害。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魔爪开始伸入新疆，使新疆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新疆各族人民也随之陷于遭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奴役的悲惨命运。共同的历史命运，共同的革命要求，共同的斗争道路，促使新疆各族人民和汉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正是这种由于共同命运和共同要求所连结

起来的血肉关系，保证了新疆各族人民免遭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长期奴役的命运。新疆各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道，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屡次挫败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企图分裂新疆的阴谋，捍卫了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

19世纪中叶，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是十分复杂而严峻的。这个时期，以满族贵族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已经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鸦片战争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争相侵入我国，给我国各族人民增添了新的更为深重的苦难。严重的民族危机，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迫使我国各族人民起来反抗。从1851年广西爆发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开始，1854——1856年贵州的苗族，云南的回族，安徽、河南等地的捻军，1861年陕西、甘肃的回族，相继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清武装起义，从而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国内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新疆地区也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在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鼓舞下，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清政府和本地封建主残酷统治的武装起义。

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的起义，是19世纪中期我国各族人民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新疆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一开始就暴露出了许多严重的弱点。劳动人民在斗争中没有提出明确的斗争纲领，没有形成强有力党的领导，当地的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一开始就混入了起义队伍，并篡夺了领导权。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提出“反对清朝统治”和“保卫宗教”的口号来欺骗和愚弄群众，把人民起义的斗争锋芒从尖锐的阶级矛盾引向民族矛盾，并在人民起义胜利以后建立起了由封建地主和宗教上层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这样，人民起义的性质便被彻底改变了，劳动人民反而处于远比清朝政府更为残酷和野蛮的压迫和奴役之下。

各地封建主集团为巩固和扩大本身的封建统治权利，进行了

激烈的内部斗争，从而使新疆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和混乱的局面。这种情况，为外国侵略势力的入侵提供了机会。1865年春，浩罕汗国的统治集团派遣阿古柏侵入新疆南部重镇喀什噶尔。阿古柏得到了正在中亚地区积极推行所谓“印度边界防御体系”殖民计划的英国殖民者的支持，它借助英国殖民主义者提供的大量军事援助，迅速排除了新疆当地封建主集团的统治势力，侵占了新疆南部的整个地区和新疆北部的一部分地区，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意为七城汗国）。阿古柏通过各种条约，把新疆变成了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奥斯曼土耳其的附庸。

在中亚地区和英国进行着剧烈殖民竞争的沙皇俄国，对英国在新疆地区侵略活动的顺利进展深感不安。1871年夏，当阿古柏侵占乌鲁木齐并准备进一步向北扩张的时候，沙皇俄国便迫不及待地出兵伊犁，以所谓“代收代守”的名义直接侵占了伊犁的广大地区，并和阿古柏反动政权勾结起来，签定了俄阿（古柏）通商条约五条。这样，整个新疆地区便成了英、俄帝国主义的囊中之物了。新疆各族人民在原来远比清政府更为沉重的本地封建主的残酷压榨下，又被加上了外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野蛮奴役的沉重锁链。

1875年清政府决定出兵新疆消灭外国侵略势力，是在全国人民强大压力下采取的一项积极措施。在这之前，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曾经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即所谓“海防”与“塞防”之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放弃新疆，专一注重沿海地区的防务，这实质上是一种投降论；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一派，力主海防、塞防并重，他在上清廷的奏摺中，明确指出保卫新疆的重要性，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

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左宗棠的意见和李鸿章的投降论形成鲜明的对照。清政府鉴于全国人民日益强烈的呼声，最后终于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决定出兵新疆，并命令左宗棠统筹新疆军务。

左宗棠奉命进军新疆，受到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援助。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曾在阿古柏政府中供职的毛拉·木萨·赛拉米，在他所写的历史亲历记《阿米尼亞史》和《海米迪史》中，都有这样的记述：南疆各地的维吾尔等族人民在阿古柏的残酷奴役和掠夺下，犹如处在水火与倒悬之中，对于左宗棠统率的军队则如大旱之望云霓。他说：“大帝（按：指清朝皇帝）的军队由吐鲁番出发，进向喀什噶尔途中没有遭受老百姓无端开枪阻击，相反地，各个城镇的群众和绅耆都出来欢迎他们，表示敬意，并且尽力支援他们”（见《海米迪史》手稿页334）。清代学者杨毓秀在所著《平回志》一书中也说：当清军进抵阿克苏时，“城内缠回十数万则皆守城以待清军者”。阿古柏失败后在库尔勒自杀，他的次子海古拉载运他的尸体逃往库车时，被当地愤怒的群众打死。所有这些事实，都充分反映了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各族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憎恶和对驱逐外国侵略势力的清军的热烈欢迎与援助。正因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这种积极支持和援助，左宗棠统率的军队才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彻底消灭了阿古柏的侵略势力，光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广大地区。进而又于1881年，经过艰苦的斗争以后，从俄国侵略者手里收复了伊犁。

左宗棠奉命进军新疆，目的在于驱逐外国侵略势力，因此斗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这和他镇压内地各族人民的革命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左宗棠在新疆也一改以往的屠杀政策，对新疆人民采取一种温和、宽厚的政策。关于这

一点，毛拉·木萨·赛拉米说：清军纪律严明，严禁骚扰群众和滥杀无辜，“领兵的官员进入城镇以后，就晓谕居民说：‘如有坏人，请即交出，俾便惩处，以儆效尤’。地方上的首脑们如果回答说：‘坏人全部畏罪潜逃了，留下的都是安分守法的人’，领兵官就再不追究了。只是经地方上呈报某人是坏人，才予诛杀。这样他们没有随意杀过人，无论他是本地人或是外乡人，或者原来的官吏，都没有遭到杀害。领兵官在各城镇张贴布告，晓谕居民安分守法，勿怀疑贰，皇帝陛下赦免他们以往的罪过。各城老少读了布告之后都安心了”（见《海米迪史》手稿页334）。与此相反，外国侵略者入侵新疆时则施行了极其野蛮的屠杀和残酷的掠夺。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中外历史记载中几乎比比皆是。例如，在《海米迪史》手稿中，就详细地记述了阿古柏入侵新疆的各种暴行：阿古柏入侵英吉沙尔时，就有1000多名维、回、汉族人民死于战火；入侵叶尔羌时，“阿古柏的军队象乌云似地从四面八方压下来，刀枪闪着逼人的寒光，被屠杀的人们的尸体好像农民收割的庄稼一样，零乱地躺满田野，鲜血染红了大地”；入侵和田时，“阿古柏的军队几乎把这里的人和牲畜全部杀光了”，被屠杀的群众达5万多。沙皇俄国侵占伊犁后的所作所为，并不比阿古柏更好些。甚至到1881年，俄国殖民当局从清政府手里勒索到霍尔果斯以西的大片肥沃土地和900万两所谓“代收代守”军政费及俄国商民“抚恤费”的巨额代价，追不得已交还伊犁的时候，还采取了历史上少有的野蛮手段，把当地10万多维吾尔族人民裹胁到俄国去作劳工，使这些无辜的劳动人民饱受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之苦。

对左宗棠的功过应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左宗棠是在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运动的战争中发迹的一个历史人物，作为封建统治制度的卫士，他曾经和大刽子手曾国藩一起镇压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后又亲自率军镇压了捻军和陕甘回民的反清起义。他的

一生，都是在为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而冲锋陷阵，正由于这个原因，他获得了清政府极为优渥（仅次于曾国藩）的恩遇，受到地主阶级历史学家们的歌颂。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而埋没他在新疆建立的业绩。由于他的坚决、果敢和军事指挥才能，克服了投降派的种种阻挠和各方面的困难，胜利地清除了外国侵略者在新疆的势力，维护了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使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遭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残酷奴役的命运。就这一点来说，不能不说这是他对祖国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这一贡献，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清除帝国主义在新疆的侵略势力，增强新疆各族人民防御帝国主义入侵的能力，有利于新疆各族人民的社会进步。我们肯定左宗棠在新疆作为，并不是说他一生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反动本性到晚年有了实质的改变。而是指出不论他的动机如何，他在新疆作为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有利于我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的，是有利于新疆各族人民的历史进步的。

（原载《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有删节。）

论阿古柏政权

一、引言

新疆早在公元以前就已成为中国内地和西方以及西南各国之间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通道。在公元前2世纪，匈奴曾侵犯新疆。当时新疆南部有36国，北部尚有乌孙。为了预防匈奴的侵犯，这几十国大都自愿要求汉朝的保护。匈奴也曾不断骚扰中国内地，给边疆各族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在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了消除来自匈奴的威胁和侵犯，曾派遣张骞为代表前往新疆，同经常遭到匈奴侵袭的部落谋取联系，结为联盟，共同抵抗匈奴。但是，张骞所要寻找的大月氏部落此时已经迁往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一带去了，他听到了关于伊犁的特克斯河沿岸的乌孙（人们称作是哈萨克部落的祖先）的消息。公元前115年，张骞第二次来到新疆，同乌孙王修好，乌孙王表示愿意归属汉朝。公元前107年，汉武帝把江都王的女儿细君公主嫁与乌孙王为妻，公主生了一个女儿，但产后患病故去。武帝二次又把解忧公主嫁与乌孙王。这种姻亲关系的建立，不仅加强了汉朝同乌孙共同抗击匈奴的联盟，促进了汉族同兄弟民族的团结，并且使得整个新疆同内地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起来。汉朝在新疆设置了都护府，修建了军营。内地的先进文化带到了边疆地区，并且开始了向西方的广泛传播。新疆成了内地与西方各国及印度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陆上孔道。公元73年，班超到了新疆，担任都护职务，在现在的库车（即现在轮台附近的破城地方）住了30年之久。嗣后到了唐朝时代，又有更多的汉族人迁往新疆居住，他们对传播农业和手工业等先进

生产技术起了巨大的作用，新疆的植棉、缫丝、纺织、冶金等事业得到了发展，耕地面积也增加了，商业贸易和城市也发展了起来。到第10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并随之带来了阿拉伯文化，使维吾尔等民族受到很大的影响。

到了16世纪，一些自称为是穆罕默德圣人后裔的和卓们开始在新疆起很大的作用。在新疆建立和卓基础的人是由布哈尔来的买合苏木艾宰木（1542年故去），他的长子依禅卡兰创设了叫“白山派”（戴白帽）的教团，次子伊萨克外里创设了叫“黑山派”（戴黑帽）的教团，两派都是伊斯兰教中的苏菲派（神秘主义—禁欲主义的流派）。两派的派系斗争发展到公开争夺政权，企图建立为自己一派所掌握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从而造成了许多的流血斗争。白山派为了取得援助，后来便投靠了外国，特别是英国殖民主义，而黑山派则基本上依靠了清朝政府。他们利用群众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制造了长期互相屠杀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18年库车的买买提里汗和卓（曾加入英国国籍）掀起的暴动被扑灭后，才基本结束了这种由和卓们直接制造的屠杀局面。

新疆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期间，在某一个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从唐朝以至清朝乾隆时期，虽也曾发生过同中央关系暂时中断的现象，但是从根本上则并没有从中国分离出去。这种暂时关系中断或一时分裂的现象，同内地历史上一再出现过的情形一样，在某些朝代中尽管有时出现过政权的割据，但它都是在中国领域内的分立，是一时不统一的表象而已。至于某些人认为“新疆从来就是独立的，只是在被清朝占领以后，它的独立性才被消除了”，这种说法和认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说法。对于以上新疆同祖国在历史上的关系，我感到有加以简短说明的必要。

二、阿古柏执政前新疆的一般情况

在16世纪以后，和卓们逐渐都变成了大地主，并对自己仅仅作了宗教上的首领感到不满足，于是就为争夺政治权力而开始活动起来。当元太祖次子察哈台的后裔阿不都拉汗的儿子司马益任叶尔羌（莎车）汗王期间（1671—1682年），白山派的阿帕克和卓即为了夺取政权进行活动，他在失败逃走以后，终于又在准噶尔王噶尔丹的帮助下推翻了司马益，夺取了政权，并把司马益发配到伊犁去，自己则受准噶尔的约制，每年向噶尔丹王纳贡银10万两天罡。阿帕克于1693年死后，他的儿子耶黑亚和卓与阿合买提和卓等相继承袭了王位。白山派和卓们之间为争夺权力不断地进行着厮杀，而黑山派对白山派以及黑山派内部也同样进行着明争暗斗。到了18世纪初，政权落到了黑山派手里，准噶尔王以每年纳贡银10万两天罡为条件，委任了黑山派的达尼亞力和卓为南疆汗王。此时，和卓们和地方官吏们以及封建伯克^①等，对农民实行极为残酷的掠夺，任意奸淫和掳掠群众妻女，老百姓遭受的痛苦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少的人开始四处逃亡。公元1730年间达尼亞力和卓死去，他的长子和卓亚合甫（又名和卓加罕）继承了莎车王位，与此同时，和卓玉素甫担任喀什的首领，和卓哈木西担任阿克苏的首领，和卓吴白都拉担任和阗的首领。不久，和卓玉素甫带了贵重礼物前往拜见准噶尔王巴图鲁浑台吉，把在伊犁作为人质的和卓的儿子们带了回来，此事发生在公元1754年间。准噶尔王巴图鲁浑台吉死后，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二人在准噶尔开始了激烈的争夺政权的战斗。阿睦尔撒纳于1754年取得了乾隆皇帝的军事援助，击败了达瓦齐，达瓦齐取道冰达坂逃跑，

① “伯克”原是贵族的通称，后来凡有官职的人，也均加称“伯克”。

但到达乌什时被乌什的首领霍吉斯伯克抓住并送交清军。

在把新疆从准噶尔统治下解救出来统一于清朝的事业上，包括对支援清朝派出的军队等方面，乌什首领霍吉斯伯克和阿克苏首领阿不杜瓦哈甫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博罗尼都和卓和霍集占和卓（二人也被称作大小和卓）等虽然是在清朝政府军队援助下掌握了南疆政权的，但以后他们却又企图实现自己独立称王的阴谋，于是又给人民群众造成了许多痛苦。此时，库车的米尔扎艾迪伯克（即鄂对）、加里克齐伯克等六人，前往北京向清朝政府呈述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要求政府能派大军前去平息和卓们的叛乱，解救在和卓们压迫下濒临绝境的老百姓。这一举动是代表了人民意愿的。

清朝皇帝派遣兆惠和富德率领军队赴新。在平定了准噶尔以后，兆惠经过乌什到了喀什，富德经过和阗到了莎车，和卓们纷纷逃窜，巴达克山的伯克们捉住了博罗尼都和卓及霍集占和卓（即汗和卓），砍下了他们的头。清朝在新疆进行战争是为了建立集中的封建政权和巩固边疆，它在新疆消灭了继续几百年的封建神权割据，建立了中央管辖下的统一的封建政权。这在当时来说，是历史发展中的一大成就。

清朝政府于1759年开始在新疆建立专制的封建政权之后，它不顾新疆经济基础薄弱，大肆增加行政官吏，行政官吏和宗教官员竟有46种之多，制定了34种官职制度（34种官职名称见附表），把地方的机关事务，都交给地方的阿奇木伯克和伯克们。清朝派去的官吏则对地方官吏实行监督。除了死刑而外，一切事情都掌握在当地伯克们的手里。清朝政府不发给当地阿奇木伯克和伯克们薪俸，专门定了一个制度，按照阿奇木伯克和伯克们的等级，分配给他们土地和一部分农奴，阿奇木伯克和伯克们在任职期间，就从这些土地上收获粮食和使用这些农奴。阿奇木伯克的最高一级是三品官，分配给他150巴特曼土地（每一巴特曼约合26.5市

亩，共合3975亩）、100户农奴；给最低的伯克分配两户农奴。除此而外，所有农民还要向他们交纳种种苛捐杂税。因此，养活伯克——地主、军队的层层负担都落在农奴和农民身上。伯克们则把他们从农奴和农民身上剥削来的财富分出一部分给清朝政府在新疆的官吏，农奴和农民们处于层层剥削之下。

农民群众在层层剥削和民族压迫之下，忍无可忍，纷纷起来反抗。在毛拉木沙·赛拉米的手稿《海米迪历史》一书中，和依马木毛拉买汗买提克日木（毛拉司迪克之子）的记载（手稿）中都有叙述。群众被逼得妻离子散，各种差徭使他们在家乡已不能维持生计，相继抛家离舍外出逃荒，田园荒芜，群众遭受的灾难达到了极点。因此，他们对清朝政府和伯克们的愤怒一天比一天高涨。1765年在乌什县发生了反对清朝政权和它的工具——地方伯克、地主们的农民暴动。这一次暴动虽然被清朝政府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未扑灭人民心中的怒火。

过去在新疆实行统治的和卓们的后代，趁此机会进行恢复他们从前的政权的活动。被压迫的农民群众幻想他们能使人们的处境好一些，于是拥护了这些人。当时，和卓们借口压迫是清朝政府和异教徒造成的，因此提出两个口号：（一）摆脱清朝政府；（二）向异教徒开展“吉哈德”战^①。各阶层人民便在这种口号下联合起来反对清朝。在和卓们取得政权以后，为了争权夺利，他们之间却又争斗起来。他们的手下就象“狼吃羊似的掠夺了百姓”^②。于是期望拯救自己的农民群众，反而遭受到更大的苦难和更深重的压迫。

① “吉哈德”战，即伊斯兰教对其他宗教进行的战争。

② 见毛拉木沙·赛拉米著《海米迪历史》手稿第66页。毛拉木沙·赛拉米最先写的书名叫《阿米尼亚历史》，曾于1905年在卡赞地方出版。现在我收藏的手稿名叫《海米迪历史》，写于1908年。

和卓们暴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820年爆发的张格尔和卓暴动。波罗尼都和卓的逃往浩罕留存下来的儿子萨木沙克和卓之子张格尔和卓，受英国殖民主义的煽惑、鼓动，于1820年秋，带了几百人进攻喀什。他在遭到失败后仍又逃回浩罕。后来张格尔又在当地白山派和卓们柯尔克孜人和浩罕汗的帮助下，于1826年占领了喀什、英吉沙、莎车与和阗等地。张格尔虽然宣称要消灭异教徒成立伊斯兰教政府，但他却去乞求身为异教徒的英国人的支援。据历史资料证明，在张格尔和卓身旁有一位名叫图烈罕的英国军事教官。

关于英国殖民主义的煽动以及张格尔身边有为数不少的外国参谋之事，可在沙皇九级文官布比诺夫从喀什方面寄给鄂木斯克总督的报告中明显地看出。报告中写道：“和卓们把中国人从4个城（按指喀什、英吉沙、莎车、和阗——包注）驱逐出去以后，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前在报告中所谈英国人在参与此事一点，已肯定是实在的。总之，这里同样的舆论说该民族在喀什有20个人，其中5人经常在和卓的身边，处理他的全部事务，而且他们都按照和卓所委派的官职穿着规定的服装……。英国人是由印度经过西藏的山道起初在莎车城出现的，但是被中国人赶走了……。后来因为他们向巴达克首领提出要求并通过他鼓动张格尔进行真实的行动，才和张格尔一同来到喀什”^①。公元1828年（道光八年），张格尔和卓在喀尔铁盖山被擒，并解往北京，处以死刑。因为浩罕汗曾经援助了张格尔，所以清朝政府就把住在喀什的1567家安集延籍的商人从新疆驱逐出境。于是，这次英国殖民主义企图以宗教作幌子，通过和卓们把中国的领土——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做为它的殖民地的阴谋计划失败了。但是殖民主

^① 见尼·阔尼新《斜米州日记》，1902年，哈萨克苏维埃科学院通报，1961年第1（总15）期，阿拉木图版。

主义者并不就此罢休。我们从下列事实即沙皇俄国和英国殖民主义继续不断的侵略活动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过了不久，和卓们的残余在外国侵略者的煽动下又窜到新疆，企图实现在新疆建立封建神权制度的阴谋。1855年在浩罕汗的帮助和外国侵略者的鼓动下，发生了以倭里汗图烈为首的七个和卓事件。当时库车的办事大臣乌尔清阿同当地的伯克们相互勾结，除向百姓征收国家法定的公粮税款外，他们又私自地向群众征收各种各样的税款，群众纷纷起来反对。于是乌尔清阿便与当地的伯克们商议以“群众反对交纳田赋”为名，把三十几名维吾尔无辜农民未经审讯就加以杀害。这一事件激起了全疆人民的义愤。倭里汗图烈当即利用这一事件，于1857年纠集起一些人占领了喀什、英吉沙等地。倭里汗图烈是个非常残暴的专制者，他在喀什无端任意杀人，杀人之多竟至到了这样程度：他用砍下的人头堆起了高有两丈四尺的人头塔^①4座^①。群众对这种压迫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有些人便逃跑内地去求援，在清政府军队到来时，群众兴高彩烈，热情欢迎了政府军队。倭里汗图烈又一次失败，随之逃往浩罕。

第一次鸦片战争就已暴露出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从那时起资本主义列强开始逐步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同殖民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于是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这一运动在全国掀起了巨大的浪潮。在这个浪潮的推动下，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甘肃、陕西和新疆等地少数民族也先后爆发了起义。当时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清朝政府，

① 见毛拉木沙·赛拉米著《海米迪历史》手稿第73页。根据另一传说，在三处树立了人头塔：其一，在喀什市城外现今的乃再尔巴克；其二，在库木代尔巴扎外面；其三，在赴疏勒县的路上苏千里克麻扎（此传说根据依米尔·玉色音哈孜阿洪讲述）。

不能供给新疆军队的薪饷和粮秣款项。因此，新疆的办事大臣们便勾结当地封建伯克们又给地方群众加上了新的税收。此时，新疆各地出现了贿买官位、极度贪污、高利贷盛行，甚至出现了卖儿女给富人做奴隶的情形。关于这一点，魏源在他的著作中有一段话，虽然说的是此前不久张格尔叛乱时新疆的社会背景，但是仍可以用来说明这时的新疆社会情况，他写道：驻扎大臣“与所属司员章京服食日用无一不取于阿奇木伯克。伯克借供官为名，敛派回户，日增月甚。……赋外之赋，需索称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办事大臣。各城大臣……恃无稽察，威福自出，而口外驻防笔帖式更习情形，工搜刮，甚至广渔回女，更番入直，奴使兽畜，而回民始怨矣。”^①在人民处于这种忍无可忍的困苦情况下，莎车、库车、乌什等地的维吾尔和回族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起义。但是地方上的各种反动势力利用了人民的起义并窃夺了胜利果实。1864年在新疆基本上出现了五个政权：

(一) 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丁和卓即黄和卓神权政权。
(二) 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明(或称妥得璘，回族)封建神权政权。

(三) 以和阗为中心的依比布拉汗封建神权政权。

(四) 以喀什为中心的柯尔克孜族司迪克伯克封建地主政权。

(五) 以伊犁为中心的塔兰齐苏丹封建君主政权。

与此同时，沙皇俄国为了把中亚弄到自己手里，开始积极活动。俄国从1847年开始，陆续占领了哈萨克平原浩罕汗国属境和布哈尔汗国的全部地区，于1867年设立了土耳其斯坦总督。

由于俄国强占了中亚，所以英国殖民主义者与沙皇俄国之间的关系趋于尖锐化。因为，当时英国也在进行占领中亚的侵略计划。俄国势力之进入中亚，使得英国担心俄国会向印度伸手。因

^① 见魏源《圣武记》卷4，中华书局1984年版，上册第182页。

此，英国报纸曾经发表过许多文章，以辩白英国对中亚的侵略野心，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俄国进占中亚，并对俄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特别是在谋夫（Mepb）平原合并于俄国之后，英、俄之间的关系更加尖锐化了。

列宁在《论单独讲和》一文中说：“1885年俄国险些为了中亚细亚的分赃问题（阿富汗，俄军向中亚细亚的深处推进威胁到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同英国发生战争。”列宁又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沙皇俄国及它的各种党派的侵略性质说：“其实在俄国，无论沙皇政府也好，一切反动分子也好，整个‘进步的’资产阶级（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①也好，所要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欧洲掠夺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在亚洲打败英国（夺取整个波斯、蒙古和西藏等等）。”^②英、俄之间的勾心斗角在中国西北省份的新疆越演越烈。这一点我将在下面另做论述。

当时，司迪克伯克从喀什派代表乞求浩罕汗阿力木库里汗，把住在浩罕的原中国人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和卓遣回做为新疆的汗。阿力木库里汗就遣派布素鲁克和卓回新疆任汗王，并派塔吉克族阿古柏^③担任他的军队首领。阿古柏是浩罕人，于1825年生

① 十月党是1905年10月17日成立的反动的党；立宪民主党是赞成帝制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

② 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126、128页，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

③ 阿古柏的真正名字叫穆罕默德·亚库甫，父名叫阿由甫，生于塔什干南面皮斯坎提乡。其父是塔吉克人（见皮夫索夫《喀什及昆仑游记》俄文本第310页），其母是火尖地方人（见库尔班哈里·哈里迪著《东方五族历史》第109页）。阿自幼父母双亡，在其叔父手里抚养长大。他最初在伯克手下当差，以后逐渐提升为百户长，以后又在阿合买齐提（即今之克孜力勿尔达）充任行政长官。1864年（他年45岁时）由浩罕汗阿力木库里派他和布素鲁克和卓一同前来喀什。

于浩罕的一个小官僚家庭，青少年时代即参与了统治压迫人民的勾当，后来历任浩罕汗的军政要职多年，并曾参加过推翻浩罕汗王位的活动。阿古柏于1865年元月随同布素鲁克和卓来到喀什，从那时起新疆历史又发生了新的重大事件。

三、阿古柏的哲德莎尔政权

阿古柏随同布素鲁克和卓来到喀什之后，名义上把布素鲁克和卓奉举为汗王，但是所有实权都掌握在阿古柏手里。阿古柏将和他一道来的亲信派去担任军政要职，并使用贿买当地伯克或派人暗杀的手段，一天一天地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亲近英国殖民主义的阿古柏还与英国取得联系。阿古柏占领了英吉莎、莎车、和阗等地后，又开始向北进军。这时候布素鲁克和卓周围的人虽进行了反对阿古柏的秘密活动，但事情暴露，许多人因而被杀害。随后，阿古柏强迫布素鲁克和卓去圣地朝觐，这样就把他驱逐到麦加去了^①。阿古柏遂于1867年宣布自己为“哲德莎尔”^②独立

① 根据依米尔·玉色音哈孜所掌握的历史资料，有另一种说法：阿古柏曾在英吉沙县昂克提勒克地方修建了三间以方块盐代替砖瓦的房屋，用各种挂毯、家俱布置起来，请布素鲁克和卓住在里面，暗中浸之以水。数十天后墙倒屋塌，布素鲁克和卓同3个差人都被压毙，然后将他们的尸体暗埋在阿孜干的一处戈壁滩里。阿古柏为掩人耳目，找了一位貌似布素鲁克和卓的人化了装，并且向人们说，老爷赴麦加朝觐去了。这一传说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布素鲁克和卓这样的人，无论是去朝觐，抑或到别的地方居住，或者是在某处死去，都一定会有较详记载的，但是并没有发现留下有关的记载。而阿古柏的为人，做出上述之事也是不足为奇的。

② 哲德莎尔意为“七城”，包括天山南麓喀什噶尔、和阗、阿克苏、库车、莎车、叶尔羌、吐鲁番等七城。

政权的国王。

当时，英国殖民主义者一方面为了给他们在中亚实行侵略政策打下基础，另方面为防止沙皇俄国向印度伸手，企图在印度和中亚细亚之间建立一道屏障，就是建立一个“缓冲国”。因此，如上所述，英国殖民主义者不仅通过布哈尔、希瓦、浩罕等小国积极地反对沙皇俄国占领中亚细亚的计划，而且自己也向阿富汗、伊朗和中国的新疆伸手，为使这些地区进入自己势力范围而加强了活动。在新疆，阿古柏是最符合英国这种企图的一个人，英帝国主义为了利用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便派代表来找阿古柏，当时由于英国的煽惑，土耳其也参与了此事。因为，19世纪末土耳其成为泛伊斯兰主义的中心，而在它的背后是英帝国主义。它们在中亚进行了各种破坏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它们又利用了依禅教派^①。在1865年沙皇俄国占领塔什干的前夕，有一个名叫喀孜汗土烈的有声望的人由塔什干逃往土耳其，土耳其苏丹（国王）阿布杜艾则孜便派他来见阿古柏，煽诱和动员阿古柏归属土耳其。喀孜汗土烈到了喀什之后，和阿古柏会了面，并请他派代表去见土耳其苏丹。自然，这次活动并没有白费，阿古柏派遣了以喀孜汗土烈为首的代表团去回访土耳其苏丹，表示愿意附属于土耳其，并给土耳其苏丹带去了蒙古、哈萨克的好马各9匹，各处抢来的童男、童女各9名，此外并有许多绸缎等礼物^②。自然，这些都颇受土耳其苏丹的赞许，因而土耳其苏丹隆重地接待了阿古柏派去的代表团，并赏给阿古柏“米拉胡尔巴什”（即艾米尔，国王的意思）的职衔。之后，土耳其苏丹给阿古柏派遣了上校司马衣艾柯克、艾里卡孜木和木拉提伯克等20多名高级军事人员和政治顾问，并带去了许多武器和礼品。在这次来的顾问中，有7人留在阿古柏

① 依禅教派即苏菲派，是伊斯兰教中神秘主义——禁欲主义的流派。

② 见毛拉木沙·赛拉米著《海米迪历史》手稿第224页。

身边常任参谋职务。

嗣后，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又派来了以福尔赛依特·萨伊甫上校为首的代表团，并送给阿古柏陆军专用的大炮和一万枝步枪。福尔赛依特把这些礼品以女王的名义交给阿古柏之后，还转达了女王的问候之意：“……你如果不和别国友好，而能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我们可以接济你所需要的武器。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派一个领事和一两万名武装军队驻扎在喀什保护你。倘若某一方面的敌人进攻你，我们就派更多的军队保护你，军队的费用由咱们两方面共同负担。这样继续60年。在60年以后，就请你把哲德莎尔完全转交给我们保护……，到那时候，连你的子孙后代也由我们来照顾，为此应该坚守我们自己相互间的诺言和条件……。”^①阿古柏虽然想和英国接近，但因这时沙皇俄国也派来了代表，所以阿古柏未能做出决定。俄国也想在新疆扩张势力，与英国竞争，遂于1871年出兵占领伊犁。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俄国沙皇政权就变成了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它的对外政策就是为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策。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沙皇俄国为寻找商品市场和原料来源而企图侵占新的领土，于是逐步把势力侵入中亚细亚，并插手我国新疆地区。斯大林曾经说：“……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呢？”^②

阿古柏在仔细考虑了如何加强与英国的关系之后，便派遣了以阿布杜萨马德·伊什罕伯克为首的代表们携带许多礼品前往伦敦，英国女王热烈地接待了他们。这次英帝国主义送给阿古柏两万枝步枪和修理厂的设备。英国和土耳其专家还一直为阿古柏办理铸造大炮、准备弹药的工作。嗣后，阿古柏第二次又派遣了以

① 贝毛拉木沙·赛拉米著《海米迪历史》手稿第231页。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7页，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

艾合热尔汗土烈为首的代表团前往伦敦，会见英国女王，这次又带回了步枪4万枝、茶叶200箱（每箱100斤）。①

四、阿古柏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残暴统治 维吾尔族同汉族人民的深厚友谊

阿古柏侵据新疆后，对群众加重了各种差徭和赋税，各族人民受到的压迫剥削和遭受的苦难更为增加了。首先，阿古柏的庞大军事和行政机构的全部费用都要由劳动农民负担。清朝统治时期那些由于引水灌溉而富饶起来的土地和夏冬两季草场被没收卖掉。“阿克苏所属的阿克牙尔、柯坪、和什塔米、温巴什一带地方的土地卖了556000两天罡，并将拜城赛拉木的土地卖了40万两天罡，收去了地价。其余南六城的情况也是这样，或许可以认为比这个数目还要多一些。”②毛拉木沙·赛拉米对于这一点，还作了如下的记载：“……每年有一个大官吏和若干同僚一同前来，借口说什么‘国家的土地还有没卖出者，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调查事实的’。这样又收去了几千两天罡，以后用阿古柏的名义发给这些土地所有人地契，加盖了他自己的名章和阿訇的名章。但是后来又说‘卖出的这些土地没有收盖章的钱’，于是按地价每个天罡收一文钱，卖了100天罡土地的人就得交纳4个天罡的盖章费，如此向哲德莎尔农民征收了几十万两天罡。当时在喀什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有一个人讽刺地说：‘真是到了安定的好时代了，成了百灵鸟在羊的脊背上筑窝的时代了。’当时喀什的宗教学者毛拉穆汗买德亚尔·海力派特在场，他说：‘陛下把七层土地都卖掉了，连百灵鸟放食粮的地方都没有了，现在不叫它在羊的身上搭窝到

①② 见毛拉木沙·赛拉米著《海米迪历史》手稿第260—261页。

哪里去搭呢？”^① “如果遇到外来商人，就打开他们的货物查看登记，全部没收。货物原主就只得把捆货的绳子、包货的毡子等收拾了回去。紧跟着就有收扎尕提（宗教税）的人向他们讨要扎尕提捐并派兵跟随。……商人们被迫向高利贷者借款^②，交付扎尕提捐。……变为难民，过贫穷的生活……。”^③

其次，阿古柏以扎尕提、乌受尔^④等税代替过去的税收向人民群众征收。但是在征收了扎尕提、乌受尔捐税之后，“他的官府还派遣他那些刽子手一样的专横的官吏们出去调查，他们认为交纳不够数，便一当十、十当百地记下来，把两三万天罡，强加在交纳扎尕提者的身上，使他们变卖土地、牲畜，甚至卖了家中的锅碗来交纳税款。”^⑤因此，忍受不了压迫的农民都纷纷逃往遥远的深山、戈壁，有的逃往内地去了。例如：伽师县柯力提亚依拉克地方的皮匠买提库尔班、英吉沙的苏甫尔隔、喀什市阿不都热依木伯克等为赴北京呈报情况，逃往内地。阿不都热依木伯克和苏甫尔隔两人在北京住了两年半之后，随同清朝政府派到新疆去的军队回到喀什。

这里有两份民间字据，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阿古柏时代群众生活贫困和倾家荡产的情况，现引述如下：

第一份字据：“立字据出卖田地人夏哈比丁皮匠之子毛拉哈斯木拜皮匠，今在‘京都’喀什的宗教法庭承认并情愿遵照阿塔里克

① 见毛拉木沙·赛拉米著《海米迪历史》手稿第216页。

② 当时喀什的印度籍高利贷者多起来，他们向群众发放高利贷，吸取群众的血汗。

③ 见毛拉木沙·赛拉米著《海米迪历史》手稿第280—281页。

④ 扎尕提是征收财产四十分之一的宗教税；乌受尔是征收农作物十分之一的宗教税。

⑤ 见毛拉木沙·赛拉米著《海米迪历史》手稿第280—281页。

喀孜（即英雄国王）的命令为筹购伊斯兰军队的马匹，经过哈斯木·色日格孜伯克的允许，将色满乡所属提尔干别西（现称阔克艾日克——包注）祖先遗产田地20卡拉克（10塔那甫）^①，作价天罡60元永远售予库完拜为业，并将此钱交给哈斯木·色日格孜。今后我的后代绝无纠葛，特立此据，并请掌教大阿訇盖章为证。回历1289年2月5日羊年。”

第二份字据：“立字据人织布匠托兰地，系木拉畏丁拜之子，我在‘京都’喀什宗教法庭承认，因注定的命运，我妻买斯土拉阿合恰病故后，由于葬埋诵经，手中无有分文，经过呈报所属农官帕拉依孜拜克，情愿将托库扎克乡所属帕尔恰亚尔村祖遗产业18卡拉克即9塔那甫田地作价天罡55元，售予安拉白地·加若甫开西为业，以作料理葬事之用，恐口无凭，特在掌教大阿訇面前立此字据为证。回历1286年7月14日龙年。”^②

“色日格孜”，就是当时阿古柏委任的管理农民的官名。从上引字据中，可以看出两种情况：（一）阿古柏为了加强自己的军队，收买军马，向农民派款，迫使农民低价卖掉了自己最后的田地。（二）群众的宗教信仰很深，掌教阿訇、毛拉、苏菲（修道士）等在人死去之后，对死者家属的生计不但毫不理睬，反而利用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在宗教的名义下，迫使其卖掉自己最后的一点土地，落于冻饿的地步。这两份字据是揭露当时新疆在阿古柏残酷统治下社会悲惨面貌的真实证据。

毛拉木沙·赛拉米在他的《海米迪历史》一书中，详细叙述了阿古柏和他的一帮人如统治和阗的尼亚孜伯克、统治阿克苏的

① 约合现今的20亩地。

② 这两份字据的原文，引自解放前在喀什的宗教法庭依米尔·玉色音哈孜的手抄本。另，回历1286年7月为公历1869年10月，回历1289年2月为公历1872年4月。

阿不都热合满·达迪哈、统治拜城和赛拉木的穆汗买提依明·托克萨伯克等，如何掠夺群众，祸害地方，迫使百姓流离失所；还叙述了阿古柏是个好色之徒，占有维吾尔族、回族、汉族、蒙族妇女达600多名。毛拉木沙·赛拉米揭露说：“他如果外出到别的地方去，便套上一二十辆轿车，装上妃妾，不令别人看见随身带着。这些年轻的妃妾周围都有男子服务，要是阿古柏有时怀疑妃妾和年轻差人发生关系，便令人在寝室内挖坑把妃妾活埋掉。”^①

阿古柏来到喀什之后，以“发扬伊斯兰教”为名，对汉族人采取或杀死或强迫他们加入伊斯兰教的政策，但是在群众中却有着另一番情景。例如有一位被强迫入教的26岁的汉族青年寇锡堂（译音），因受到哈孜团长迫害，逃到那秋克渠下游一家居民院里，院中只有名叫萨热汗的一个妇女，当寇某向她说明缘由之后，她便把他藏在自己屋内，待她父亲热合木·阔力齐回到家中，她便向父亲述说了情况，并求父亲拯救这位汉族青年，免被哈孜团长杀害。父亲和女儿商议后，把他一直藏在自己家中达6年之久。到了阿古柏政权被消灭以后，这个汉族青年便在喀什充任了驻军连长。他于回历1328年（公元1910年）病故。清朝地方政府鉴于拯救这个汉族人的热合木已年迈，就把他女儿萨热汗委任为那秋克乡第八屯的农官，以表彰她的功劳。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维吾尔族人民同汉族人民在紧要时刻仍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并且也说明了他们的友谊是有着历史和社会根源的。

五、英帝国主义和土耳其苏丹的侵略活动

英帝国主义在与阿古柏建立联系之前后，还曾以经商、游历和传教等作幌子，派遣了许多间谍到新疆来进行阴谋活动，例如：

^① 见毛拉木沙·赛拉米《海米迪历史》手稿第283页。

英国人阿斯坦·萨依甫曾由印度来到和阗，在民间修建了著名的伊马目加帕尔·萨德克的麻扎尔（陵墓）^①。1865年有经过和阗前来的约翰逊和艾斯台尔·萨依甫二人同阿古柏进行了接触。1868年还有鲁毕尔提·邵乌、条勒提等前来和阿古柏进行了秘密会谈。鲁毕尔提·邵乌在他的著作《高地鞑靼》一书论莎车、喀什部分里，叙述了他和阿古柏的谈话：“阿古柏对我说：‘……英国的女皇就像是太阳，她照暖了阳光所及的一切地方，但是我却在感到寒冷。我在盼望那太阳的光芒即或是很少一些，有一部分能照射我身上。我是很小的，而且是昨天成了人的一个人。过去的这些年内真主赐给了我这块广大的地方。您的莅临，对我是很大的尊重。我希望得到贵国的帮助，我愿遵照您的意图做任何工作，您也应该为了我这样做’。”^②此外，在1870年伦敦还派遣了福尔赛依特（即费昔斯）前来，他来的时候，从克什米尔一直到莎车的途中都有英国军队加以保护。

阿古柏曾经不断地和土耳其苏丹取得联系，同样也不断地和英国殖民主义者发生关系，经常互相派遣代表，土耳其人穆汗买德·阿提夫在1883年出版的《喀什历史》一书中对这些叙述得很多。英国殖民主义者于1873——1874年间曾经又一次派遣以上校福尔赛依特为首的代表团和阿古柏订立政治、经济条约。福尔赛依特在喀什逗留了4个月。英国政府承认阿古柏为“哲德莎尔”的独立国王，并且承担了迫使清朝政府批准他在“哲德莎尔”独

① 伊马目加帕尔·萨德克是伊斯兰教圣人穆汗默德的女儿法提玛（丈夫叫艾里）家系的12个伊马目中的第6个，他于回历148年（公元765年）65岁时病故，埋葬于麦地那城。但又有伊马目加帕尔·萨德克的坟墓在和阗的传说。那个英国人修建假陵墓，显然是别具政治目的。

② 见鲁毕尔提·邵乌著《高地鞑靼》第310页，1872年印。

立的义务。所以，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不是偶然的。

土耳其苏丹阿不杜艾则孜于1874年第二次给阿古柏发下的一道命令中答应阿古柏，在他之后，王位由他的儿子世袭。其内容如下：

“崇德骏望、宗教正裔成为喀什国及其全部人民幸福旗帜和唯一元首的阿古柏可汗阁下：

愿真主永以慈祥圆月在东方普照你。阁下以无限至诚对我伟大国王哈利法纳忠效信，为哈利法祈祷，以哈利法名义铸币，愿将一切归依哈利法的来书，及要求令嗣应取得喀什王国继承权的文件，已由牙克甫伯克递呈，我伟大哈利法披阅之后予以无限珍视与嘉许。

伊斯兰世界，无论物质与精神上，乞求声应，相需相引之真挚友谊，由于来书殷殷恳恳之至诚，更可概见。吾人正企望在中亚一带具有坚强及全部优良品质之伊斯兰教信徒归向我伟大国王哈利法陛下，能身率力行，适足钦佩，此亦我国王之所赞许不止者也。

阁下能为哈利法祈祷，以哈利法名义铸币，并能高悬与我们同一颜色、同一形式之国旗，在不妨碍此种统一条件下，可以保留阿古柏国王王位。现由哈利法特颁古兰经一卷、奥斯曼帝国国旗一面及其他赠品多种，希今后为人类社会的平安而努力。……关于喀什噶尔应归令嗣继承问题，哈利法已另有命令批准……。

我国王对阁下照顾之殷，优渥之隆，无以加尚，务希转告所属民众，淬励奋发，以实现我国王属望之意，特由皇宫颁此崇诏。回历1292年7月15日。”①

苏丹阿不杜艾则孜在发这一道命令的同时，还运给阿古柏许

① 见穆汗买德·阿提夫著《喀什历史》第388—389页。另，回历1292年7月15日，公历为1875年8月17日。

多武器和礼物，派来军事教官和专家。这一次即派遣达格斯坦伯克中的扎满伯克^① 和土耳其“志愿军”携带武器前来。他们经过印度来到新疆。沙皇俄国虽然也派遣代表并提议互相来往，但是完全陷于土耳其和英国势力范围之内的阿古柏，则使用了各种奸巧诡计不和它发生关系。

新疆的西北部紧靠沙皇俄国，它的南面则有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所以沙皇俄国和英帝国为争夺我国新疆地区，矛盾十分尖锐。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阿古柏时期，经常派遣它的许多间谍来到新疆。沙皇俄国也不甘落后，同样经常派遣各种游览者、科学考察团、探险家、商人和代表前来新疆。例如：普尔热瓦斯基于1867—1869年和1870、1873、1876等年先后旅行和科学考察南北疆和西藏。格鲁姆一格尔日麦洛于1884、1896年间来新疆研究中亚细亚。皮夫索夫于1879年到新疆准噶尔盆地进行过考察，康穆才甫斯基考察大小帕米尔和新疆南部。还有到新疆游览的学者索斯诺福齐，作为沙皇俄国的非正式代表来到酒泉和左宗棠会面，并要求在中国关外通商。左宗棠“答应：可以相商，惟必须在收复新疆以后。索斯诺福齐自动表示：大军出关，彼可在山诺尔（即宰桑诺尔）供给粮食500万斤。又说：如要军火，俄国也可供给。……当然俄人很愿帮助中国消灭阿古柏的势力。”^②

索斯诺福齐和维·尼克亭等到达喀什、和阗后，曾写了“关于到和阗的报告书”。1872年俄国土耳其斯坦总督高福曼派遣大尉考勒巴尔斯和阿古柏订立了通商条约。除此而外，还有许多所谓的游览者、商人等经常钻进钻出。根据上述通商条约，沙皇俄

① 达格斯坦就是高加索的部分。扎满伯克因反抗沙皇俄国，失败后逃到土耳其，土耳其苏丹又派他来到我新疆帮助阿古柏。他精通俄语。

② 见《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12页，1946年上海版。

国公然承认阿古柏为“哲德莎尔”元首。但是阿古柏对俄国商人的贸易制造了种种阻碍，加之阿古柏依据1874年初和英国侵略者所订的条约给予了英国商人以优惠的权利，引起沙皇俄国更大的不满。这“表面上是俄人和阿古柏之争，实际上成为俄人和英人之争。结果，俄人要消灭阿古柏，英国要维持阿古柏。”^① 阿古柏由于听从了狡猾的英国侵略者的摆弄，同时害怕沙皇俄国的势力（前面提到的俄国于1871年占领伊犁地区之事），所以就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安排妥得璘党立足那里，用作沙皇俄国和“哲德莎尔”之间的缓冲。英国殖民主义者则企图把“哲德莎尔”作为沙皇俄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因此，英国为阿古柏问题曾以外交方式两次向清朝政府提出请求，第一次在光绪二年（1876年）六七月间，其时左宗棠快要进兵南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总理各国务衙门替阿古柏求降说，情愿降为属国，但请免除朝贡。文书中竟称阿古柏为喀什噶尔王；且说如果双方兵连祸结，只怕俄国侵入，不光是害著印度，于中国也没有利益。”第二次在光绪三年（1877年）六七月间，其时左宗棠已收复吐鲁番，英国政府又向中国公使郭嵩焘要求中国允许安集延人缴还北部数城，留著喀什噶尔数城，使可立国。郭嵩焘把这个案子报告清政府并加了一个按语说：看英人意思，只怕俄人侵并其地，希望给印度加一层保障。清政府交给左宗棠核议。左宗棠表示：“喀什噶尔即古之疏勒，汉代已隶中国，固我旧土也。南八城富庶，素以喀什噶尔、和阗、叶尔羌为最，此中外所共知者。英人以保护安集延（即阿古柏）为词，图占我边方名城，直以喀什噶尔为帕夏（阿古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彼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向我商议，欲于回疆（即新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②

① 见《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10页，1946年上海版。

② 见《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10—112页，1946年上海版。

英国侵略者还曾利用宗教来哄骗和拉拢新疆人民，如以依禅、海孜来提^①……等作幌子，派遣被收买的伊斯兰教败类为他们进行宣传和搞间谍活动。例如英国豢养的克什米尔籍的克比尔·萨依甫海孜来提也曾来到过莎车，阿拉伯籍的艾尔地拉尼则到过喀什，还有来自阿富汗的色曼达尔夏·巴斯亚比，以及来自土耳其的乃斯如拉伯克（正式由土耳其来的人还不在内）等，他们都是在宗教幌子的掩盖下，帮助阿古柏和为把我新疆地区变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进行着种种卑鄙活动。

同治三年（1864年）以后，清朝政府加强了西北的军事力量，平定阿古柏叛乱，恢复和安定了新疆的社会秩序。在对待新疆的问题上，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派，提出了“海防”政策，认为可以放弃新疆；而左宗棠一派却主张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保护西北各省边防，不能放弃新疆。结果左宗棠一派占了优势，出兵打败了阿古柏，光复了新疆^②。在消灭英帝国主义傀儡阿古柏政权的问题上，沙皇俄国帮助接济了清朝军队所需要的粮食等。当然，沙皇俄国帮助清军粮食，完全是为自己打算，消灭阿古柏意味着削弱和清除英国势力，并消耗清军实力，从而便于自己的侵略。

把英帝国主义和沙皇俄国竞相侵略争夺的我国领土新疆，重新置于清朝政府统一管辖之下，使新疆人民免于落在外国侵略者

① 伊斯兰教中苏菲派。

② 左宗棠军队从1877年年初开始粉碎阿古柏的军队，他在光复了吐鲁番、乌鲁木齐之后，又开始向南疆进军。当时阿古柏在库尔勒，有一个被一向充任和阗阿奇木伯克（约等于现在的州长）的尼牙孜伯克，收买了阿古柏的仆人，乘阿正为自己的失败而愤慨的机会，在茶里下了毒药害死了他，时间是回历1294年4月14日，即公元1877年6月。后来左宗棠军队于公元1877年12月间收复了喀什。

的手中，这是一件意义巨大的历史事件。但是，新疆一直到伟大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仍然是英帝国主义和沙皇俄国继续争夺和阴谋占为己有的对象，并仍在那里进行着剧烈的争斗。英国殖民主义者继续不断地派遣它的代理人到新疆散布谣言，企图在新疆、起码在南疆成立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在此幌子下搞一个殖民地，使之成为俄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这种阴谋一天也没停止过。沙皇俄国认为伊犁地区有重要意义，“它不但以俄国的侨民使之形成殖民地化，并且企图利用它来作为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中亚内地去的基地”^①。19世纪的后半期，新疆有许多回族、维吾尔族暴动者逃往俄国成为俄国的公民，“这些事件都在当时使俄国和旧中国的关系尖锐化了，并导致第一阶段谈判的破裂”^②。

英国和俄国都曾力图侵占我新疆地区，而英帝国主义者还开始侵略我西藏地区的活动，并且企图向中国的西南省份伸手。帝国主义者把在我国西北、西南地区进行的阴谋活动，同从我国沿海一带打入我国配合起来，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英帝国主义扶植阿古柏政权，只是它的总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③毛主席的分析和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六、结 论

阿古柏政权的出现和存在，是同新疆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

①② 见《外交辞典》（俄文）第2卷第17页，1950年莫斯科版。

③ 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2页，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

利益不相容的，它是反动的，反人民的。阿古柏是外国侵略者，又是土耳其苏丹和英帝国主义压迫奴役新疆各族人民的傀儡和工具。阿古柏政权疯狂掠夺新疆人民财富，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效劳，妄图把新疆地区从我国版图中分裂出去。英帝国主义和沙皇俄国阴谋瓜分和吞并我新疆地区的企图，终于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当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吞并新疆的斗争，反映了各族广大人民群众维护国家主权的要求，它也是人民斗争推动的结果。

阿古柏事件同其他历次的农民暴动在性质上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在新疆的历史上，农民为了争取自身的解放，曾有过多次的革命暴动，例如反对准噶尔封建主的斗争，反对清朝封建专制政府统治的斗争，以及反对民族内部封建阶级阿奇木伯克和伯克们的压迫剥削的斗争等，但是最终都失败了。毛泽东同志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有着正确的分析和估价，他说：

“中国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①新疆地区历史上几次的农民起义，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和内地农民的起义相密切联系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问题中的一个部分，因此，新疆地区每次的农民革命战争的结果，政权也仍是落在封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6、619页，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

建的和卓和伯克地主的手里。而阿古柏政权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是趁新疆农民暴动之隙，侵入新疆的外国侵略者勾结地方反动势力建立的侵略政权，又是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新疆的工具，它使新疆人民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地。

新疆地区历史上农民革命的事实和经验，证明了新疆各族人民要摆脱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以及地方反动政权和地主、高利贷者等的压迫剥削，摆脱外国侵略者奴役，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离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离开同汉族人民的团结一致与帮助，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点今天历史已经作了结论。

值得强调的是，如果19世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一派的所谓“应该放弃新疆”的论调取得优势，使阿古柏侵略政权得以存在下去的话，则不但新疆各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将不堪设想，且也必将导致帝国主义势力从祖国西北部向内地伸展。在这个问题上，左宗棠和他所统率的军队尽管在本质上是反动的，是清朝封建社会制度的支柱，但由于他消灭了土耳其苏丹和英帝国主义者的走狗阿古柏政权，使新疆重新回到祖国怀抱，从而使新疆各族人民摆脱了外国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从这方面看他所立下的功劳是应该肯定的。至于某些人把这种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唯一正确行动说成是什么“进行侵略”，则完全是反动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违反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相反，正由于消灭了象阿古柏这样的侵略政权，维护了伟大祖国的统一，挽救了新疆各族人民，使新疆免于落入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手里变为殖民地，这完全符合全国人民利益，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的。

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活动的事业中，先进的汉族人民是它的基本力量和主力军，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反对共同敌人外国侵略者斗争中的主导力量。我想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也无法否认的。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

永远不能灭亡中国。”^①由于汉族人民是我国反帝斗争的基本力量，以及汉族同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和对祖国的共同缔造，所以帝国主义势力不但不能消灭中国，也不能把它的任何一部分领土和人民从伟大祖国的怀抱中分离出去。新疆永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命运是和伟大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

新疆各族人民的历史命运，可说远自汉朝时候起就和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中国全体人民的命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近几十年来，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英明正确领导下，终于在1949年随着全国人民革命的迅速发展和胜利，使新疆地区获得了和平解放。从此新疆各族人民被压迫和被奴役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在伟大祖国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里享受着充分的平等权利，并在建设祖国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贡献着自己的一切力量。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作者附言：

《论阿古柏政权》一文，曾刊登在1958年《历史研究》第3期上，今又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在此过程中，承一些有关同志提供不少宝贵意见，谨向他们表示谢意，并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指正。

1963.8.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刊载时，题为《再论阿古柏政权》。）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1952年版。

附：清朝平定准噶尔（1759年）后在新疆所设官职名称顺序表

一	阿奇木伯克	三至五品官	
二	伊什罕伯克	四至六品官	阿奇木伯克的副职
三	道尔格伯克		阿奇木伯克手下的官员
四	噶杂那齐伯克	四至五品官	掌管财政
五	商伯克	四至六品官	掌管征收粮赋事宜
六	密图瓦里伯克	五至七品官	掌管买卖田地、水、房产的事宜
七	明伯克	五至七品官	管理一千户百姓
八	玉子伯克	七品官	管理一百户百姓
九	鄂尔沁伯克		管理十户百姓
十	阿尔巴布伯克	六至七品官	掌管差徭的人
十一	克列克雅喇克伯克	五至六品官	征收商业税收的人
十二	巴吉格尔伯克	六至七品官	征收牲畜税的人
十三	色特尔伯克	六品官	监督市场和贸易、物价的人
十四	巴扎尔伯克	七品官	管理市场上的零碎事宜
十五	哈子伯克	六至七品官	掌握刑罚事宜
十六	斯帕哈子伯克	五品官	调查本地官员诉讼的哈子阿訇
十七	喇雅哈子伯克	五品官	调查普通百姓诉讼的哈子阿訇
十八	帕提沙布伯克	五至七品官	逮捕罪犯和管理监狱的人
十九	米拉布伯克	五至七品官	掌管用水制度的人
二十	巴克玛塔尔伯克	六品官	管理果园及菜园的人

(续表)

二一	纳克布伯克	五至七品官	管理建筑和工人的人
二二	伊尔哈齐伯克		管理修筑城墙、街巷、道路的人
二三	喀拉都管伯克		管理军事哨所的武器
二四	哲博伯克		喀拉都管伯克的副职
二五	什琥尔伯克	六至七品官	掌管邮政驿站的人
二六	都管伯克	五至七品官	掌管驿馆及粮秣草料的人
二七	喀噜尔伯克		管理岗哨
二八	哈什伯克	五品官	管理开采玉石
二九	阿勒通伯克		管理金矿
三十	默斯伯克		管理铜矿
三一	墨提色布伯克	五至七品官	调查教规法令的执行情况
三二	杂布第默克塔布伯克	六品官	管理宗教学校
三三	密鲁尔伯克		
三四	多博伯克		负责收集二千户农民所欠差徭款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在新疆的兴灭

泛伊斯兰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泛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宗教主义，它是19世纪后期由资产阶级宗教界提出来的。它的目的是在土耳其苏丹兼宗教领袖哈里法领导下，把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大国。从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帝国主义和德帝国主义都企图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来扩大他们的殖民地。当时英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印度的一个宗教领袖阿格汗，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把土耳其、阿富汗、伊朗、埃及和法国在北非洲的殖民地，都纳入自己的殖民地范围内。德帝国主义则企图通过土耳其，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抵抗英帝国主义的扩张，并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泛土耳其主义产生的简单过程

泛土耳其主义是20世纪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创造的。它的目的是把所有使用突厥语族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土耳其国家。泛土耳其主义者宣称：祖国不是土耳其，对土耳其人来说，土耳其斯坦也不是祖国，祖国就是广大的统一的吐兰(Tulan)，即中亚细亚到土耳其的广大地区的总称。当时中亚细亚沙皇统治区使用突厥语的民族也都宣传这个思想。1917年至1918年，德帝国主义也企图利用泛土耳其主义经过黑海南部的土耳其再向东南

部发展，侵占印度，与英国争夺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势力削弱，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英帝国主义乘机利用泛土耳其主义去侵占中亚细亚地区，它通过投靠英国的前土耳其国防部长安瓦尔帕夏组织并武装了20000多人的军队，在中亚细亚进行反苏战争，直到1926年苏联才把他们消灭。但泛土耳其主义思想仍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存在下来。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新疆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的各种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土耳其、德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都企图利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扩大其殖民地范围。当时，土耳其向新疆派来了大量的教师和宗教界人士，他们大肆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据我所知，莎车的工业公司里有一个名叫阿库布伯克的所谓专家，于1916年开办了一个学校，专门宣传泛土耳其主义。在喀什的包定巴依（富商），从土耳其聘请了一个名叫艾买提·卡马尔的教师，在阿图什盖了一所学校，专门宣传泛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艾买提·卡马尔被捕起来，在乌鲁木齐关押了两年，于1919年经上海把他送回本国。可是他在喀什秘密组织起来的泛土耳其主义组织却仍然存在。

1910年至1911年间，新疆一些资产阶级人士也派了不少学生到土耳其学习。据我所知，从伊犁去的有麦斯武德·莎布里（1947年任新疆省主席）、阿布都热哈满·夏地、莎比提·塔勒哈提；从喀什去的有阿布都哈德尔·沙马尼等。他们在土耳其都参加了泛土耳其主义的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们回到新疆，宣传泛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为德国争夺殖民地卖

力。他们说，德国皇帝威廉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是保护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的，是帮助土耳其解放所有穆斯林的。当时新疆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有不少人受他们的影响很深。在这个时候，德国驻阿富汗的代表冯·赫尼德克也到喀什来做了一番宣传。麦斯武德在土耳其是学医的，回新疆以后在伊犁开设了一所医院，利用替人看病的机会宣传泛土耳其主义。他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几个土耳其人，这几个人在伊犁开办了学校，提了一个口号：“我们的祖先是突厥，我们的祖国是土耳其！”向孩子们灌输泛土耳其主义思想。

当时，新疆的学校有两种，一种是老式的，叫乌苏勒·卡德木，这是宗教学校，专门教学生伊斯兰教经典，如怎样做礼拜等等；一种是新式的，叫乌苏勒·加德，它除了宗教课以外还教数学、地理、历史、化学等。泛伊斯兰主义者们主要是利用旧式学校，而泛土耳其主义者的主要阵地则在新式学校。宗教界阿訇们常到新式学校来检查。过去新疆所有学校都教唱土耳其歌曲。

英帝国主义为了不让苏联的影响进入印度，企图在新疆组织一个缓冲国，也利用起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它通过土耳其派了一个叫沙米大毛拉（阿拉伯人）的人，到新疆各地区秘密组织伊斯兰教协会。参加这个协会的有3000多人，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后来沙米大毛拉被新疆都督杨增新押了起来，驱逐出境，但沙米大毛拉所散布的言论还危害着新疆。沙米的一个学生叫克力木汗·艾沙扎达，在新疆1932年至1933年的叛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一个泛伊斯兰主义者伊敏·布格拉，1932年在和田叛乱中组织了一个伊斯兰教王国，他自称和田王，把自己宣布为艾米尔（国王）一世。1931年，和加尼牙孜领导的反对哈密王爷和新疆统治者金树仁的暴动一天天扩大。1933年，南疆也发动了农民暴动。这时，英帝国主义鼓动喀什的沙比提大毛拉组织了一个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把和加尼牙孜

推选为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总统，沙比提大毛拉自己当国务总理。他们还通过英帝国主义，聘请以马赫木提那得木为首的几个土耳其人当军事教练官，并接受英帝国主义的武装。

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也利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企图在新疆组织一个所谓“回教国”，与英帝国主义争夺新疆。日本培养的军官马仲英，于1932年带军队进入新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让前土耳其皇帝的弟弟阿布都·穆哈伊提阿比提当国王，与英帝国主义的走狗沙比提大毛拉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相对抗，以争夺新疆地区。由于1933年的“四·一二”政变，盛世才取代金树仁上了台，盛又戴上了伪装进步的假面具，骗得新疆进步力量的拥护和苏联的帮助，击溃了马仲英部队。马仲英部队在败退南疆的过程中，摧毁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马虎山率马仲英的残部退往和田，伊敏·布格拉的伪伊斯兰教王国也瓦解了。盛政府部队进入喀什以后，逮捕了沙比提大毛拉，说降了和加尼牙孜。随着新疆局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新疆组织“回教国”的阴谋，也就被粉碎了。

盛世才上台以后，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又隔得太远，只好伪装进步，投靠苏联。1942年，盛世才摘掉了“进步”的假面具，把中国共产党派到新疆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共产党员以及他们的家属150多人全部关押起来，随后，又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同志和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4年，蒋介石把盛世才调到重庆去当农林部部长，派吴忠信到新疆当省主席。这样，新疆就完全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了。

从此以后，英美帝国主义又利用起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来了。在他们的影响下，国民党反动派让青海的马步芳派马呈祥军长的回族骑兵进入迪化和新疆各地，并把1933年背叛祖国逃到外国的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土耳其主义者们都收拢回来，加以利用。如让麦斯武德和艾沙伯克经过印度来到重庆，给了麦斯武

德一个国府委员的职务；伊敏·布格拉逃到印度、阿富汗住了十年，到重庆后也当了检查委员会委员；另外还有阿布都哈德尔·沙马尼等也都作了安排。本来蒋介石对麦斯武德、伊敏·布格拉、艾沙伯克等人是不太相信的，后来经过英美帝国主义者的介绍，蒋介石才知道他们是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的。因此不仅在重庆给他们官做，还把他们派回了新疆。这帮人回到新疆以后，和英美帝国主义驻乌鲁木齐的领事经常联系，听取他们的指挥，进行反动活动。

他们的主要活动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1946年，麦斯武德到伊犁组织了一个所谓学术协会，通过学术协会进行泛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宣传，进行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宣传。

二、美帝国主义驻乌鲁木齐的领事派克斯顿也到伊犁去了一次，他把伊犁的白俄组织起来帮助土匪乌斯满。

三、在乌鲁木齐的反动宗教人士中组织了一个保卫伊斯兰教协会，并在新疆各地组织了分会，进行反动的宣传活动。

四、恢复了为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作宣传的“阿勒泰”出版社。

五、以麦斯武德为首组织了一个“得尔涅克”协会，他们每个礼拜都要组织文艺活动等，借以宣传泛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

六、为了在青年中间宣传泛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以艾沙伯克为首建立并控制了国民党的三青团组织。

七、英美帝国主义者帮助曾在土耳其留过学的泛土耳其主义者库尔班·库代出版《亚勒肯(火焰)报》，进行泛伊斯兰主义、泛土耳其主义和反苏、反共、反人民解放运动的宣传。

八、在以伊敏·布格拉和艾沙伯克为首出版的《伊里克(自由)报》上，突出地宣传：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信仰伊斯兰教，

我们的祖国和故乡是土耳其斯坦等等。他们企图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在新疆建立“独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

九、在南京国民党特务的支持下，一些人组织了“天山”学会，出版反动的书籍，如麦斯武德所写的泛土耳其主义的纲领性小册子《土耳克拉尼（Turk-urani）》一书，其意即：我们突厥人的口号^①。

十、在乌鲁木齐组织了一个专门进行分裂活动和反动宣传的“建设新疆会”。

十一、以艾沙伯克为首组织了“土耳其斯坦”歌舞团，说是为了发展维吾尔族和汉族的文艺，实际目的是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

十二、以麦斯武德为首组织起来的“语文改革会”，企图把新疆所有突厥语族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与土耳其的语言文字统一起来，他们宣传说，所有突厥语族的各民族都是一个民族。如1948年《新疆日报》第297期上刊载伊敏·布格拉的一篇文章说：“维吾尔族人是突厥族的一个部族，同样，土耳其人也是突厥民族中维吾尔族人的一个部族。”

十三、伊敏·布格拉和艾沙伯克开办了一个图书馆，从土耳其、埃及带来了大量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的书刊，用来毒害青年一代。

十四、向游牧民族如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的人民进行反动宣传，组织各种各样的所谓协会，帮助土匪乌斯满从事反动活动。

十五、1949年在头屯河哈巴地区（即现在的八一钢铁厂地区），马呈祥和伊敏·布格拉、艾沙伯克组织了100多个青年进

① 其口号的主要精神是：“对我们土耳其人来说，祖国不仅是土耳其、土耳其斯坦，而是伟大统一的地区‘吐兰’。”吐兰是指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居住地方的联合。

行军事训练，准备把他们派到新疆各地组建反动武装力量，反对人民解放运动。

十六、土匪乌斯满、贾尼木汗、色得克扎楞、乌拉孜拜的阴谋活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后，乌斯满的儿子谢尔得满和在伊犁的热合满夫、伊得立斯、马立克阿吉等又在一起进行活动，直至被人民解放力量全部粉碎为止。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者都是为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英美帝国主义虽然直接指挥并给予这些反动组织、反动人物以很大的支持，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还是把他们粉碎了。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肃清这些反动思想的流毒，并非短期内所能完成的，还需要进行长期不懈地努力。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9辑）

在列强的觊觎下

——抗战时期在新疆的一段往事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虽然不是直接的抗日战场，但外患引起了内乱，抗战时期每一个大的事件爆发，无不在新疆引起震动和反响。

当时，新疆上层的一些反动分子，在日本侵略我国的时候，投靠帝国主义，妄图依靠英、日等帝国主义的势力，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成立所谓“独立国”。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抗日问题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同年，新疆发生哈密事变，金树仁政权岌岌可危。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认为时机已到，便策动泛土耳其主义者对新疆进行露骨的颠覆活动。

这期间，日本驻土耳其安卡拉、埃及亚历山大的外交官员经常与泛土耳其主义者接触，搜集有关新疆的情报，策划分裂新疆的阴谋。东京出版的塔塔尔文《新日本通信》，大量刊载煽动新疆人民背叛祖国的文章。日本还招纳中亚逃民，成立御用组织，并豢养土耳其末代皇帝的弟弟阿布都·穆哈伊提阿比提，准备把他扶植为新疆未来的大土耳其斯坦傀儡国王。

聚集在柏林的泛土耳其主义者塔塔尔人阿牙孜·依斯哈克等人大肆活动，在他们出版的塔塔尔文《民族新路》上刊登煽动新疆人民背叛祖国的文章。活动于巴黎的泛土耳其主义者木斯塔发楚卡耶等人也出版了刊物《青年土耳其斯坦》，进行同样的煽动工作。

英帝国主义也趁哈密事变的机会，策动它豢养的走狗组织武装暴动。“九·一八”事变后，在动荡的岁月里，新疆爆发了一系列反对金树仁暴政的斗争。这些斗争的部分领导权，一开始就被泛土耳其主义者攫取，从而把反金树仁的斗争引到背离祖国、变新疆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所谓“独立”道路上去。在1933年11月12日，英帝国主义在喀什策划建立了以沙比提大毛拉为“总理”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在“东土耳其斯坦国”的策划期间，我正在阿勒泰，我十分担心我的一些朋友被拉下水，曾给我的一些朋友写信，指出新疆不能走“独立”的错误道路，所谓“独立”，其实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

岂知这些朋友中有一个是泛土耳其主义者，他给我回了一封信，除了驳斥我劝他的话外，还问我“将来是否还依赖伊斯兰国家——阿富汗、伊朗、印度、土耳其的政治支援？”

另一个朋友塔依尔别克则给我回信说：“你的主张——反对脱离祖国，是正确的。”

事实也证明，“东土耳其斯坦国”在新疆并没得到人民的支持，没过多少时间就彻底垮台了。

1937年，我在中国驻苏联斋桑的领事馆当领事。“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斋桑时，我们立即中止了准备组织到苏联各地参观的活动，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支援国内抗战的工作中去。

我组织领事馆全体工作人员开座谈会，讨论如何为抗日救国出力。我含着泪对他们讲团结在抗日中的重要性。为了抗日，我们全体工作人员节衣缩食，把省下的15000卢布邮回国内，支援抗日战争。我们还对在斋桑的华侨宣传抗日，动员他们捐钱以支援抗战。

当国内传来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成立的消息时，我激动万分，认为中国有希望了。当时斋桑的苏联军

政官员也纷纷赶来祝贺。那时，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物资都通过新疆，由公路运往前方。看到每天上百辆汽车，载着抗战物资，带着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情谊开赴祖国，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抗战时期新疆的历史说明，国内不团结，必然会引来外患，外患也必然会引起内乱，这是几千年来沉痛的历史教训。只有各族人民亲密团结起来，外部敌人才不敢欺侮我们，中华民族才能世代强盛。

（原载《人民政协报》1985年9月3日）

盛世才在新疆

盛世才上台前新疆的一些情况

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新疆的贪官污吏横行。杨增新表面上反对贪污，实际上是鼓励贪污的。他认为人一发财就不会造反。他曾说过：“他们贪污不要紧，只要不反对政府就行了。”所谓政府，就是指他自己。

当时，我通过给俄商伊斯哈克当翻译认识了迪化道尹（专员）樊耀南（湖北公安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我经常听樊谈论：要挽救新疆就要反对贪官污吏，主张民族平等，整顿财政，整顿军事，发展教育。他说：“杨将军（增新）今天利用这个民族反对其他民族，明天又利用另一个民族，挑拨关系破坏民族团结，他执行的完全是愚民政策，搞得教育不发达，连张报纸也没有，贪官污吏却到处都是。”当时杨增新非但不准出版报纸，甚至连其它省出版的报纸也不准看。我心里非常痛恨这些黑暗现象，听了樊耀南的话，感到樊的思想在当时的官吏中是难得的，我十分赞成樊的主张，并和樊交了朋友。

有一天我和几个好朋友：塔赫尔伯克（留克沁人）、马克苏提（阿斯塔纳人）和克里木汗（喀什人）在我家谈论新疆局势，大家感到杨增新的愚民政策太反动，我就给大家介绍了樊耀南的情况，说他很清廉，思想进步，并把他的主张告诉大家。他们一致认为：樊的主张是真正能挽救新疆的。如果他能当省长，新疆就有希望了。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秘密小组，宣传樊的主张，拥护他当省长，并选我当秘密小组组长。后来，阿山哈萨克族艾林

郡王的弟弟沙里福汗，库车人尼扎木丁，我的妹夫乌鲁木齐人海达尔，乌鲁木齐教师赫沙木丁也参加了这个组织。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秘密宣传樊耀南的主张，宣传让樊耀南当省长。当我把这件事告诉樊时，他也很高兴。

1927年，杨增新流露出自己要离开新疆到内地的意思，并把家属、财产都经过苏联送到天津去了。这时我们小组的人认为杨走后，樊一定能当上新疆省长，就更加替他大力宣传了。我还帮助樊结识了省议会议长肉孜阿吉，让他们搞好关系，使樊取得肉孜阿吉的赞同和支持。

1928年7月7日政法学校进行考试时，杨增新、樊耀南都去了，樊趁机秘密组织人把杨枪杀，随后到省政府拿关防信印（大印）。谁知当时民政厅厅长金树仁召集了自己亲近的同乡军人，调集部队包围了樊，把樊杀害，结果金树仁上了台。

事情发生时我在吐鲁番，并不知道这个情况。金树仁上台后杀了不少与樊耀南有关系的人，他虽然知道我与樊的关系很好，但当时我任省汽车公司经理，又管理修公路，且没抓到我什么把柄，也就没有马上杀我。1929年金树仁把我叫去，派我到德国买压路机。我就和潘治义（曾是我的秘书，后任汽车公司秘书）假道苏联去了德国，在德国买了压路机、盒子枪运回新疆。3个月后我打电报给金，要求回国，金却叫我长期住德国。这时我才明白，金树仁虽然不杀我，却要把我长期放逐国外，以除心头之患。于是我便安心长期住德国。

1933年1月，我经金树仁批准回乌鲁木齐。走到离乌鲁木齐十几华里的大石头时，我的家属和好友沙里福汗前来迎接，正说话间，突然跑来一个骑马的人，偷偷告诉沙里福汗说，金在乌鲁木齐把哈萨克的一个巴彦毛拉营长逮捕了，叫他不要回乌鲁木齐。于是沙里福汗直接逃到阿山去组织队伍反对金树仁。我的另一个朋友马克苏提在吐鲁番也组织了队伍与金树仁的归化军交战，受

伤后被归化军围捕杀害了，他们还把马克苏提的头挂在吐鲁番城里示众。

我回乌鲁木齐时，在老朋友赵德寿家里会见了陈中。陈中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当时他的公开职务是金树仁的军事参谋。他们几个经常谈论新疆的局势，陈中也认为这样下去一定会发生政变。

当回族反对金树仁的军队包围乌鲁木齐3天撤走以后，金树仁命令我立即返回德国，给金在德国留学的儿子、侄子们带100两黄金。因为金树仁催得紧，我便于3月底离开乌鲁木齐。

我走到苏联的斜米时，就听说乌鲁木齐发生了政变，但不了解详细情况。直到到了莫斯科，会见老朋友前苏联驻乌鲁木齐的总领事贝斯特洛夫、包国宁和普列霍夫，他们才告诉我是盛世才上了台，并告诉我说盛表现还不坏，对苏联挺友好。这时陈中也从新疆到了莫斯科，我见了他，向他了解情况，他说：他和陶明樾、张馨、赵德寿、格米林肯及归化军的领袖巴品古特把维族牧民秘密组织起来，由归化军于4月12日包围了省政府。枪一响，金树仁从后门逃出，到了塔城，后又经过苏联逃到内地去了。当时盛世才率军住在离迪化40里外的乌拉拜。金派人送命令给盛，叫他速返迪化扑灭叛乱。13日傍晚盛率军返抵迪化时，金已逃得不知去向。盛答应与政变方面合作，于是人们选他当了督办。这就是所谓的“四·一二”政变。陈中还告诉我：“目前看起来盛世才还不坏，如果将来不好的话，照样可以把他推翻。”陈中是盛世才派往南京政府汇报“四·一二”政变情况的，他觉得时间紧，不打算去南京，写个报告就行了，于是他写了很长一个报告，我还帮他抄写过。陈还告诉我：盛世才政府叫我赶紧回国，因阿山地区闹民族纠纷，互相残杀，派我去当宣慰使，安定阿山后让我当行政长。于是我立即乘飞机到柏林收拾行李，只住了两天就回国了。后来，陈中在回国后，与参与政变的许多人一起被盛杀害。

盛世才的困难处境

盛世才虽然用狡诈残酷的手段篡夺了“四·一二”政变的果实，夺得了政权，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他自己也没有信心保住这个政权，并且，当时这个政权所管辖的地区是很有限的，而且正在不断缩小。

就地盘而言，整个南疆早在1932年底就与迪化政权脱离了关系。北疆马仲英掌握着大部分地区，哈密、镇西、七角井以至吐鲁番、鄯善全归马军统辖，南疆的喀什也有马仲英的一部分势力，北边阿山则由马仲英的副师长马赫英占领，其后又向塔城推进，占领额敏。伊犁张培元经南京国民党政府联络，与马仲英结成了反盛联盟，张培元已向乌苏推进并占领乌苏、绥来两地。奇台亦被金树仁旧部魏镇国由阿山退来进据。魏虽表面上答应服从迪化，其实是貌合神离。昌吉、呼图壁、阜康等地都在马仲英军包围之中。而且马仲英所占地区出产丰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前线已越过达板城、柴窝堡，距迪化只有50里。而盛世才此时的防区，实际上只有迪化、塔城、哈图壁、昌吉、乾德、阜康、孚远等几个县城而已，广大农村都被维、回军占据，迪化也在被包围之中。

就兵力而言，此时盛世才在迪化的部队只不过6000人左右，（本地军约2000余人，东北军约3000余人，归化军不到1000人），还有少数部队分布在各外县据点，并都在被围困之中，不能起任何作用。同时，归化军已大部分厌战，希望和平；东北军又派系复杂，盛也不能全部掌握。而敌对的马仲英此时已扩张到万余人之众。盛军多系老弱残兵，马军皆年青力壮。伊犁张培元连同被其控制和拉拢的东北军约8000人以上，马、张联盟之兵力，超过了盛军3倍之多。

再就补给而言，马、张所占皆富饶之地，无论粮食或人力之补充都比较容易；而盛所占的几座县城，人力单薄存粮不多（粮食最多维持二三个月）。

就人心而言，盛世才在金树仁时代，因经常打胜仗，还能得到一些汉族人在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但自他不加审讯地阴毒惨杀了“四·一二”政变的诸领导人之后，他的影响即逐日下降，不仅是使“四·一二”政变的拥护者或同情者惴惴不安，也造成一般民众的恐慌心理。在混乱时期不少人从迪化逃到内地去了，留在迪化的军政各机关负责人也都战战兢兢，无所适从。尤其是金时代的旧官吏，多倾向张培元，其他各族人民对盛更无好感。回族多拥护马仲英，维族多拥护和加尼亚孜。

正在困难的处境下，南京国民党政府又对盛施加压力，派大员罗文干（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兼司法行政部部长）到新疆活动，委任马仲英为新编第36师师长，委任张培元为新编第8师师长，造成与盛的三足鼎立之势，以牵制盛世才。9月3日罗文干到迪化，9月9日即去吐鲁番见了马仲英，对马称赞倍至，以后又于10月7日去伊犁住了一周。

力量悬殊、补给困难、人心恐慌、南京压力，在这重重困难之下如何维持政权，迫使盛世才不得不认真考虑下一步棋的走法。

伪装进步 亲苏求援

盛世才为了克服重重困难，采取了伪装进步、假意与苏联友好的办法，以取得新疆各民族中一些思想进步的人们的拥护和苏联的帮助，稳住政权。

阿山地区的安定，就是通过我和沙里福汗等人的调解和苏联军队的帮助来完成的。

我在苏联听说盛还不坏，就立即赶回塔城给盛打电报说，经过

陈中转告，已回塔城，是否先回迪化。盛叫我立即去安定阿山。于是是以政府宣慰使的身份，到和布克赛尔蒙古亲王、鄂亲王、夏里瓦活佛家里去，把调解各族人民的纠纷、安定阿山、建设好新疆的意图向他们讲了，希望他们与哈萨克艾林郡王和解。他们同意了这个意见，便派了两个人护送我到阿山，这两人怕被哈族人杀掉，我叫他们放心说：“如果杀了你们，就把我也杀了。”他们把我送到艾林郡王家里，找到沙里福汗。因为沙里福汗是我的同志，所以马上就同意了联络蒙古族、和平解决问题的意见，让两个蒙古人回去。一个星期后，我、艾林郡王、沙里福汗3人一同到两个民族占领地交界处，由艾林郡王宰了几头羊，我亲自去请蒙古王爷，见了面，并进行了和谈。解决了哈、蒙两个民族的纠纷以后，又以我、艾林郡王、沙里福汗的名义给阿山各族头人写信，请他们派代表来和谈。他们发现哈巴河一带还有哈族和白俄打仗，又去帮助实现和解。这样除了回军，阿山地区各族基本上都和解了。这时我又动员阿山各族人民派代表到迪化承认盛世才政府。我考虑到阿山地区是哈萨克族为主，让哈族人沙里福汗当行政长比较合适，于是写了一个报告让代表带到迪化给盛，盛见报告后，同意任命沙里福汗为阿山行政长。这时，马仲英派他的副司令马赫英把所有回族人组织起来，武装了700多人，准备和阿山各族联盟交战。我、艾林郡王和沙里福汗知道这个消息后，带来了150多人，请哈族头目克内千户长派250人，请蒙古王爷、白俄各派100多人，组织了约有600多人的军队赶到布尔津河西岸。这时马赫英率领一支由700多人的正规武装部队和用长矛、大刀武装起来的家属，共4000多人赶到了布尔津河东岸。我们派代表请马赫英到河西来谈判，而马却叫到河东谈，双方相持，互不相让，马军便向吉木乃方向移动，结果在沙窝儿把我们包围了，派了一个代表叫我们去谈判。我和艾林郡王、沙里福汗商议：叫代表捎信回去说双方都不带兵到中间地带谈判。代表走后，我、艾林郡

王和沙里福汗估计马不会同意谈判，就事先把家属和财产全部移进山里。这时马的军队果然进攻，哈族军队也组织还击，由我当指挥。由于蒙古军队100多人和哈族250人全逃跑了，结果回军得胜，抢走了许多财产，把我的文件、衣服全抢走了。他们又开始向塔城方向前进。因为当时的伊犁屯垦使张培元与马仲英勾结，准备夹攻乌鲁木齐的盛世才。我逃到苏联的斋桑，立即打电报给盛报告了这一情况。盛接电报后，马上派黑洛夫斯基为团长、张义吾为参谋长的归化军去塔城解围。塔城作战时黑洛夫斯基团长阵亡，张义吾与别克铁也夫指挥，最后，解了塔城之围，收复了额敏。

我到吉木乃听了这个消息后，就开始向塔城方向走。经过蒙古王爷处，听蒙古王爷说马赫英到塔城时，塔城的哈族头目唐古特千户长等人服从了马，马失败逃跑后这几个人害怕了，准备带着家属、财产和大批牲畜逃往巴里坤哈萨克地区去。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派代表请他们第二天到帕孜洛家里会面。会面时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走，他们说：“马赫英来时我们服从了他，听说塔城枪毙了几个维族商人，我们害怕就要逃跑。”我怕他们带走大量财产牲畜，对塔城经济有影响，便劝他们说：“马赫英象洪水一样把你们冲得跟他走，现在他溜走了，你们留下了，你们服从他是不对的，但你们没有罪，和我一起去塔城吧。”他们动摇不定，我又说：“你们走这么远，大风大雪里，牲畜、财产一定会有很大损失，还是不要跑吧。”他们同意和我一起回去。路上每次动摇，我都向他们发誓：“我代表政府保证你们生命财产安全，如果对你们不利，我们就死在一块。”走到离额敏60华里的一个蒙古庙里时，省政府主席刘文龙的内弟杀了两个哈族人，这批人吓得又不敢走了，我只好当着这些人的面质问刘的内弟：“为什么杀人？”他说：“他们抢过我家的东西”。我拍着桌子厉声说：“你随便杀人不行，我要报告盛督办！”他也怕了，这些人看我

果然能代表政府，也就同意回去。在额敏，我遇见前往边界与苏联商谈武装问题的航空学校校长姚雄，便搭姚的汽车到塔城。

过了几天，盛世才发电报到塔城，说马仲英包围了迪化，伊犁的张培元也派兵到了乌苏，两面夹攻盛，塔城的陈继善、杨指挥、何营长都投降了张，盛已请苏联派兵援助。得此消息后，姚雄、我、赵得寿3人开会组成了剿匪司令部，姚任司令。把在塔城的依万诺夫（原汽车公司技术员）请来，让他组织一个团的归化军，盛世才任命他为团长，并用姚雄到巴克图跟苏联借的武器武装了这个团。随后，我们把陈继善等人包围住，结果叛兵投降，陈等3人被押了起来。这时，苏联军队以阿勒泰军队的名义向迪化进军，我们帮助他们准备了民族服装、交通工具，赵得寿以总指挥的名义和他们一起向迪化进军。同时苏联另一部分军队又从伊犁方面进攻，迫使张培元军于1934年1月份溃乱，3日张培元自杀后伊犁地区被收复。迪化的马仲英军也溃逃了。这时，马仲英又派人到阿山骚扰，我又回阿山与马的部下在承化寺（现名阿勒泰）谈判，马部回军撤退。投降马的塔城阿希木商总和吴马尔阿洪把自己的武装也交了出来。这样，伊犁、阿山两区和迪化基本平定。我经过塔城回迪化时，请示盛世才把阿希木商总和吴马尔阿洪的财产房子交还给他们后，就回到了迪化。

来到迪化，我这才和盛世才见了第一面。盛鼓励了我以后，任命我为设计委员会委员，新疆土产公司总经理，反帝总会的民政部代理部长。以后王寿成（真名俞秀松）来当反帝总会秘书长，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与我关系很好。他向我详细介绍过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一些情况。

不久，盛世才写了《政府目前主要任务》一书，宣布了所谓六大政策，即：反帝、民主、和平、文教、建设六个方面，我帮他翻译成维文。

盛世才亲苏是这样开始的：1933年9月，盛先试探性地派外交

署长陈德立到苏联领事馆去见孜拉肯总领事，表示愿意亲苏。苏联与新疆毗连数千里，苏联方面当然希望它的边界之外有一个友好的政权，孜拉肯表示愿意友好。第二天，盛即经陈德立将总领事孜拉肯、副领事甘宁和领事馆的译员请到家里吃饭，饭后到书房谈话，让领事看他的书籍，内有《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唯物史观》……等。盛向领事们夸耀这些书都是他秘藏的，他从年轻学生时代就相信社会主义，即使在金树仁白色恐怖时期，他也经常研究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只有走共产党的道路才有前途，因此他希望与苏联合作，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等。他还陈述了目前的困难处境，说马仲英、张培元都是国民党反动军队，一定要将他们消灭，才能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听了盛的话，孜拉肯答应将盛的意见呈报莫斯科，临走时盛给他们每人赠送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孜拉肯未能识破盛的阴谋，他向苏联政府呈报了盛是相信共产主义的，学习马列主义颇有心得等情况。但莫斯科还未了解透，故没有立即答复。在四面危急的时候，盛得不到苏方任何具体的答复，于是他决定派陈德立和姚雄到莫斯科直接求援。他以为陈德立、姚雄都是共产党员，容易办事（陈不是党员）。陈、姚于10月份去了莫斯科。

陈中被盛杀害的消息7月间才传到塔城。因为陈中从苏联回迪化路过塔城时，曾与张义吾商谈多次，塔城很多人知道张、陈关系好，行政长陈继善为了讨好盛，也曾向盛报告过这一情况，并请示如何处理，当时，张除了给赵得寿当秘书外，还任炮兵营营副，9月下旬，盛来电令张晋省。张的友人连赵得寿在内都劝张不去，张还是决定去。张住在迪化小旅店时，将带的枪交与勤务兵并嘱咐他说：“如果晚上我不回来，你就带着两支枪自找生路吧。”出乎意料之外，盛却请张与其共餐，餐毕请张到书室参观他的进步书籍，表示信仰共产主义。以后张到盛的书房几次借

书看，结果发现许多进步书都是陈中的，是陈中被杀后盛没收来的，其中好几本书有陈中批阅的笔迹，甚至有一本书上还有陈的印章，这是盛所没有想到的。第一次见张时，盛还解释了枪杀陈中等3人并非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而是因为他们阴谋叛乱，说现在新疆民不聊生，不能再闹乱子了。他说迪化还有20几个共产党员都没杀，以此证明他是不杀共产党的（其实迪化当时并没有20几个中共党员）。他问张有什么打算，当张说想回内地时，他立即假装诚恳挽留张，说新疆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张在新疆好好干。不几日就命张为团参谋长与赫洛夫斯基团长去解塔城之围。不久又让张帮他整编军队，将迪化本地军编为步兵一团，任命不认字的尤得胜为团长，张为副团长。

陈德立、姚雄的苏联之行，莫斯科还是半信半疑，决定派较得力的干部阿布列索夫于1933年11月到新疆任驻迪化总领事，希望通过他对盛作进一步了解。盛对阿布列索夫表示特别“诚恳”，遇事都和阿商议，对阿的话百依百顺，因而获得了阿的好感。张义吾等人向阿提出过警告，叫他不要过于相信盛世才，但阿却被盛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后来，确实给盛帮了大忙，除了直接的军事援助外，阿还要求所有苏联派去的共产党员尽力协助盛，服从他的命令。

盛世才通过伪装进步，求得进步人士和苏联的帮助平定伊犁和阿山区后，力量还是不足与马仲英抗衡。在张培元发动进攻的同时，马仲英亲自率领骑兵旅20000人（其中一半是临时扩充，只经过短期训练的新兵）从吐鲁番出发长驱直入，于1934年1月12日包围了迪化，占领了城东飞机场和无线电台，城西的蜘蛛山。盛军仓惶应战，抗马军于南关之外，张义吾率步兵团保卫南梁，击退马军多次进攻。马又派1000多骑兵攻城北，幸得东北军坚守未失，否则迪化难保。马仲英如果采取猛攻的办法，是可以攻克迪化的，但他不知张培元已溃败，自己不愿失去过多兵力，而且

认为迪化粮草缺乏，盛军不能久守，所以，只是围城，想等其困死或自动投降。在这万分危急之际，盛世才甚至连突围逃命的机会都没有，“只得求苏援助。盛为了表达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曾要求将新疆划为苏联领土，作为一个自治区或加盟共和国，以此骗取了苏军的援助。苏联当即派了所谓“阿勒泰”军解了迪化之围，迫使马仲英一直败退南疆。

迪化解围之后，张义吾本应随同部队南下追击马军，但盛却将张留在迪化，并伪善地对张说张新婚不久（张是马围城时结婚的），不必再去前线，留在迪化协助盛写一些必要的文件，如：安民告示、政策纲领、妇女协会成立宣言等。随即，又派张去苏联，表面上说是送教育厅厅长张馨去莫斯科治疗目疾和送盛的五弟世骥去莫斯科学习，实际上是要张到莫斯科去要一批军火援助。盛借口要整编新疆军队，要求苏联援助他武装一万军队的武器及冬夏季服装和各种装备。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还要求张到莫斯科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并告诉张说，回来可以成立党的组织，又要张请求苏联方面派些党员干部来新疆工作。

1934年4月张义吾送张馨、盛世骥到莫斯科。因等张馨目疾治愈，住了三四个月。苏联方面虽然知道盛是小军阀出身，屠杀过共产党员，只因政权危难才投靠苏联，对盛的“诚意”还有疑心，但为了边界和平，也给了盛一些可能的支援。本来盛是要10000军队的装备，但苏联建议盛不仅要整编军队，应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推广文化教育事业……等，要盛编造预算，答应给予贷款。1935年盛派我为全权代表，与苏联代表签订由苏联贷款500万卢布的合同。其中100万用以修公路，其它用以买武器、办工厂。苏联方面还派了苏联专家来帮助建立了炼油厂，派了考查矿物的工程师和许多顾问，建立学校、医院等。这样新疆才开始有些发展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

关于派遣党员干部的事，苏联答应派25人来，后来只派了十

几个人，如王立祥（曾秀夫）、王寿成（俞秀松）、刘贤成（任岳）、满素尔（维族）、栾宝庭（嵇直）、万献庭（张一范）、郑义均（郑一俊）、王宝乾（赵实）、于成发、赵云蓉、高秀影（王一）、陈培生（刘敬忠）、赵国元（赵雨时）、阿拜（哈族）、哈的尔阿吉（维族）、色以提阿吉（维族）、哈森木（维族）以及冀朝鼎之妻等。

张义吾苏联一行，使盛唯一感到不满的是没有办到介绍他加入共产党。苏联给盛的答复是希望他好好干，入党之事将来再说（1938年盛去莫斯科，回来后，据他自己说加入了苏共，但不知是否确实）。

其实，当时新疆另两派势力也都想投靠苏联。和加尼牙孜在哈密时就多次接受外蒙协助，到喀什后，他曾向苏联表示亲善。他于1934年7月与盛世才妥协，也完全是苏联领事从中调解的。否则他决不会将军队交盛世才改编，而自己到迪化来就任空头副主席。马仲英的部下也有些思想进步的人，其中有些是中共党员，因白色恐怖失掉了党的关系，才投入马仲英军中工作。如张雅韶、苏继善、吴应祺等，他们极力劝说马依靠苏联方可能在新疆取得胜利，所以马仲英占领奇台后，就派懂俄语的惠大山去阿山与苏联领事馆接洽，但因奇台失守而未成此行。马仲英退到喀什时，并不知道盛是借苏联的力量击败他的，还亲自到苏联领事馆去接洽过。马在喀什失败后，将10000余兵力交马虎山带领向莎车、和田方面撤退，他自己却退入苏联境内以表示亲苏，时为1934年6月7日。

因为盛世才身为新疆合法政府的正式首长，居住在省会迪化，可与苏联总领事直接接洽，又由于他善于诡诈和伪装，所以才捷足先登，骗取了苏联方面较多的信任，获得了苏联的大力支援，在新疆当了11年之久的土皇帝。

盛世才的反动本质

从盛世才的出身、经历，尤其是在新疆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伪装进步，假意亲苏，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耍弄的一套花招，这毕竟掩盖不了他的反动本质。

盛世才字晋庸，1892年生于辽宁省开源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幼时在西丰县初小、沈阳第五高小、辽宁省立农林中学学习。1915年毕业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1917年赴日留学，住过东京明治大学。1919年随留学生回国请愿团回到上海。其他代表都参加了全国学生总会争取收回国土（青岛）的运动，而盛却跑到广东，进入了李根源主办的韶州讲武堂，毕业后经李根源介绍回东北，在奉军第八旅郭松龄部下任排、连长及上尉参谋等职。此时其原配妻子病故，生下一女也病故，经郭介绍与郭义女邱毓芳结婚。1923年经郭推荐被张作霖送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其妻同去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学习。1925年郭倒戈反对张作霖失败后，张即撤销了对盛保送学习的公费。因盛善于钻营，获得孙传芳、冯玉祥、蒋介石的资助才完成了日本陆大的学习。1927年回国，投入国民党贺耀祖部下任参谋，以后又调总司令部任上校参谋兼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团教官。1928年代理行营参谋处科长，1929年调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任科长。

当郭松龄推荐盛上日本陆大学习时，盛在与郭夫妇的来往信件中称郭夫妇为“父母亲大人”。在日本陆大末期是蒋介石资助他的，在他呈蒋介石的函电中则称自己是学生。

1929年秋，新疆主席金树仁派其秘书长鲁效祖到南京公干时，因新疆想创办一个女子学校，而新疆妇女识字的极少，所以金令鲁顺便物色一个女教员带回新疆。经过彭绍贤的介绍，鲁效祖聘请了盛妻邱毓芳，邱要求与盛同去。鲁见盛系军事人材，另外，为

了在新疆培植自己的势力，就答应盛随邱同去新疆。当鲁电报金树仁时，新疆还是无战事的升平世界，金不愿军人进新疆，尤其是金之五弟树信极力反对。金令新疆驻南京办事处查明盛是参谋本部军官后，即电令鲁不准盛去新疆。而刚愎成性的鲁效祖因已答应盛辞去南京军职，整束了行装，不便拒绝，仍请盛同去。此时正值中东路事变，无法经过西伯利亚去新疆，盛只得在北京闲住了数月，又回东北活动，想在张学良部下谋一职务，未成。结果1930年秋仍随鲁效祖去了新疆。

盛到新疆后在鲁家住了一个星期，金树仁不愿见他。后因碍于鲁的情面，金才委盛为督署上校参谋兼卫队营教练，后又委盛兼任军官学校战术教官。那时，盛是新疆唯一的军事人材。在军校时他极力拉拢学生，培植自己的势力，后来这些学生都成了盛军中的骨干。至1931年哈密民变，省军屡败，金树仁才开始重用盛世才。先委盛为鲁效祖的参谋长，后又委为张培元的参谋长赴东路作战。1932年7月又委盛为东路总指挥，与和加尼牙孜作战。当时马仲英负伤回关内，而盛军作战相当顺利，被誉为常胜军，转战火、鄯等地。1933年因马世明部队逼近迪化，盛又被金树仁调回迪化附近作战，收复乾德、阜康等地。“四·一二”盛看金树仁大势已去，便答应与政变者合作，诈得督办一职后，又用毒狠的手段杀害了政变参预者。

由以上履历可以看出，盛世才出身于地主家庭，去新疆之前整个生活经历都是与军阀官僚打交道的，从而他学到一套诡诈、阴险和毒辣的本领。他娶官僚之女为妻，其岳父邱宗浚曾任奉军团长和张学良的副官长等职；盛的二弟、三弟都是乡村地痞，四弟、五弟都留学日本；连襟汪鸿藻、妹夫彭吉元也都是地主出身的官僚。

盛世才上台后并不是不想依靠国民党，但他知道国民党蒋介石只相信自己的嫡系和有实力的人，而他既不是蒋的嫡系，实力

又很小，远不如马仲英，甚至不如张培元，所以国民党派去新疆的大员——黄慕松和罗文干对他并不特别重视，甚至想吃掉他，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也使他不敢完全信赖和依靠国民党。但他在以后的整个伪装进步的过程中，与国民党还是藕断丝连的。他一上台便派陈中向南京政府写报告，又在南京经常驻有代表，即他的老友张之夫。1942年初，他在未揭开伪装面目之前，就派他的五弟盛世骥到重庆面见蒋介石。因而，1942年底，蒋介石派第一批国民党员赴新疆工作时，就要求这些国民党员到新疆后要绝对信赖盛世才（见朱家骅著《新疆壮行词》中一段：“昨天总裁训话，已经讲得很明白，最重要之点，就是中央对盛主任委员（世才）绝对寄以信赖。”）

盛世才在伪装进步的整个过程中，口头上叫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他在攫取政权时期的种种事实证明，他也是想与日本帝国主义拉关系的。

“四·一二”政变的当天晚上，在第一次维持委员会的会议上，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作掩护的日本间谍头子白毓秀曾自告奋勇，要到南山去找盛世才回迪化来参加新政权，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白一出城郊即被金树仁军打死，后被誉为烈士（因为当时谁也不知道他是日本间谍）。为什么一个日本间谍头子要冒生命危险去找盛世才呢？这虽然不能证明盛已与日本间谍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但最低限度，日本间谍是在拉拢他或认为他是可以被拉拢的对象。

日本特务机关曾于1932年派一个大间谍大西忠（化名于华亭）去新疆活动。此人行至甘肃安西时被马仲英军扣押，伪称河北商人去新疆，因他自称会电报技术，被马仲英留用。1933年6月马仲英自奇台撤退时，大西忠藏于民间，投了盛世才。盛即将其带至迪化，以上宾相待，多次约请大西忠与家人共餐，让他居于督办公署之内，令其翻译密电数月。1933年底盛伪装亲苏后，在苏

方要求下，不得不将大西忠扣押，在狱中还对大西忠特别优待。盛多次清洗监狱，屠杀过成千上万的无辜者，但对他却始终不杀。大西忠在狱中度过9年岁月，他常当着人说：他相信盛世才“亲苏”不会长久的，盛是亲目的，总有一天盛会释放他。后因病医治无效才死去。1933年日本出版的《世界知识》就曾报道说盛是亲日的，盛军中有日本人服务，这就是指的大西忠。

1937年日本参谋总部还派了一个今田少佐去新疆活动。此人是盛世才的旧相识（可能是同学），当然是想到新疆去会盛世才。但这个今田少佐和他带的几个随行军官因携带大批药品、照象机、探测器等可疑物品，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抵兰州时，正逢“七·七”芦沟桥事件爆发，全国掀起抗日高潮，他们被朱绍良阻挡，未能去成新疆。

以上事实，尤其是对大西忠的特别亲近，可以说明盛世才在他的政权摇摇欲坠之时，并不是不想投靠日本，但到最后只剩迪化方圆不到百里的地盘，靠日本远水救不了近火，国民党那条路又走不通，才只好决定伪装进步，要求亲苏的。

出于其反动本质，盛世才一面伪装进步，一面制造种种理由捕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不论是苏联人、中国人或少数民族干部，都常被盛说成是托派，不是逮捕屠杀，就是驱逐出境。

1937年，盛呈请南京政府任命我为驻苏联斋桑领事。我听说苏方阿布列索夫总领事被撤换了。有一天，阿布列索夫派人请我到他那里去。我去时见他低着头、背着手在房子里踱来踱去，他问我：“你相不相信盛世才？”我感到惊奇，说：“我还没看出什么问题。”他说：“他岳父在伊犁当屯垦使，贪污腐化刮地皮，他老婆的情夫做大量的买卖，也是贪污，还有很多其他不健康的事情，这些情况很不好。”他边说边摇头。我告诉他这些事情我也知道，他说：“我们今天的谈话不要告诉别人。”“五·一”节后，我和阿一起离开迪化到乌苏，在乌苏住了一夜，第二天离

别时依依不舍，紧紧拥抱，流下了眼泪。阿布列索夫从伊犁回苏联，我从塔城到斋桑。以后才知道，盛看出阿布列索夫对他不满，即先下手为强地诬告了阿，阿回苏一个月左右，苏联即把他枪毙了。

这都是盛世才反动本质的暴露。盛伪装进步时期时常高叫“清廉”，但他在篡夺政权初期已大发横财。他借口军事开支、战争费用，令财政厅加紧印发钞票，而印出的钞票每日源源不断地运入他的督办公署，混乱期间也无人查问，他也不向任何人报账，只凭他一个手谕，要多少就多少。除将财政厅库存黄金搜索一空外，还找来南梁几个宝石商人，为他买钻石，拿到钻石后即用担架抬纸币出去（这都是目睹者告诉我的）。他每次弄到黄金、钻石等贵重物品，不在新疆保存，都立即设法送回内地。他二弟、三弟在内地大做生意，资本即是盛贪污得来的。

盛有一次曾对张义吾说过：那时如果苏联领事不答应帮助他的话，他是准备放弃迪化，带领卫队逃往塔城，再经苏联回内地去的。

盛世才与政治监察机关

从盛世才的政治监察机关更可以看出他的反动本质。

为了巩固新政权，反对帝国主义间谍，反对反革命及贪污分子的活动，苏联向盛世才提出在新疆组织监察机构的建议，并提出张义吾任政治监察管理局的局长。开始盛同意了，但因张当时还在莫斯科等张馨治疗目疾，不能马上回新疆，苏联就派顾问包国宁（Приходко）、秘书长王立祥到迪化来筹备组织这个机构，这是1934年7月间的事。盛世才为了控制这个机构，利用张尚未回国的借口，委任了他的侦探队长王玉书代理局长职务，又委托他的友人陈东白、郎道衡、王延龄为科长，当时只有王一人到

职，后又任伊犁区公安局局长。

1934年八九月间，张义吾回到迪化，盛不愿让张到监察管理局去工作，假说南疆和平伊始，百事待举，要委任张到南疆担任负责工作（似乎任行政长一职）。经阿布列索夫的质询，盛才不得不履行诺言委张到该局工作，但又推说张的官衔不够（局长是中将衔），只委以副局长兼代局长职务。以后改组为公安管理处时，才正式委张为处长。为了监视张等共产党员的工作，盛还派他的老友王宜之及妹夫之弟彭吉桢到该局工作。

盛自始至终都千方百计地想把政治监察机构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因这个机构中的主要干部都是苏联派来的，除张义吾、熊效远、王立祥之外，还有副处长刘贤成，哈密区前、后任局长柰宝庭（嵇直，“文革”前在内政部工作）、于成发，科长色以提阿吉、科长哈的尔阿吉（以上二位系维族人），镇西公安局长阿拜（哈族），以及科长卞方明（卞福林）、胡鹏举（后二人是在大革命时期去莫斯科学习的，在苏联学习时犯过错误，但已改正。胡后被盛世才杀害，卞被盛押八年之久，至盛离新疆后才获释）。盛无法将这些人控制起来或拉拢过去，只好用各种阴谋诡计来打击这些人，慢慢缩小其权力。1935年1月盛将政治监察总管理局改为保安总局。1936年3月又改为公安管理处，企图将政治监察机构变为普通警察机关，同时又挑拨该机构与其它各机关的关系，以此来破坏这些人的威信。盛时常下令要该机构逮捕他所指定的无辜者，被捕者审明无罪也不准开释。对真正的犯罪分子，包括他的走狗或亲朋，他都极力袒护，不准惩办。这样时常引起这些人和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1937年春天，盛借口这些人调查他的军队，撤换了张义吾和刘贤成的职务，从此公安管理处就被抓到盛手中，成了他屠杀成千上万革命志士和无辜者的工具。盛撤了张、刘的职务后，企图以任张、刘二人为阿克苏正副行政长为名，将二人扣在新疆。张、刘二人看透了他的反对本质，坚决

拒绝了他的要求，但他坚持不发给二人出国护照，经阿布列索夫再三催促，直到阿被换回苏联时，才放张、刘二人离开新疆去苏联。

张、刘在公安管理处工作时，该处是政治监察机构，专门反对帝国主义的间谍、反革命分子和贪官污吏等。盛对这些工作并不感兴趣。同时他自己还有两个侦探系统，一个是督办公署侦探队，成立于1934年4月，先由军官学校毕业生（即盛的学生）王玉书任队长（后被盛杀了灭口），后由李英奇负责，主要还是盛直接指挥。其密探数千人分布在全疆，督署有特别监狱，可不经任何法律手续随便捕人，任意屠杀，这些密探在被利用一个时期后也多被盛杀害。此外，盛还有他自己直接指挥的绝密组织，这是他上台不久就开始组织的，人数极少（如李溥霖、王宜之是专门监视和侦察所有苏方人员、共产党及进步左倾分子的）。每次所谓的阴谋暴动案，盛都是根据这些人的报告臆造出来的。如报告说见某人与共产党员有来往，盛就推断他们有阴谋，滥加捕杀。这些特工都是顽固的反共分子，盛特别信任他们，一直用到他离开新疆为止。

1937年初督署政训处又增设了侦探科，专门在军队中进行特工活动。以后，盛制造了多次“大阴谋案”、“阴谋暴动案”等等，将苏联派去的干部、专家、顾问甚至总领事、领事以及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都诬为托派，一批一批地诬控、陷害和屠杀。盛公开撕下伪装后，他又改变腔调，诬说所有这些阴谋暴动案都是共产党干的，将罪责嫁祸于人。

1938年2月，盛打电报叫我回新疆汇报斋桑领事工作情况，我于3月底离开斋桑，经过阿拉木图回国，到精河县住了一夜，与姚雄见了面互相问候了一下。第二天我坐苏联运货车去迪化，在离精河20华里的地方，从后面来了一辆小汽车，赶到货车前停车，下来几个人截住货车，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包尔汉。”“请你下来，乌鲁木齐来电叫你回伊犁去。”把我的行李

拉下车后让货车开走，让我举手搜身，这样把我逮捕了。在伊犁公安局关押了一个星期后，公安局长对我说：“盛督办来电令你到迪化，派一个人护送你。”把我押到迪化，于4月12日送到第二监狱。同房有三四十个人，他们告诉我说，盛已扣押了好几万人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

大约1940年的一天，监狱看管员把我带到一个房子里，叫我把一些汉文文件译成俄文，并用打字机打出来。翻译的是盛世才给斯大林的信，大意是：调来新疆帮助他的人对他态度不好，是托派，请斯大林另派一些可靠的人来新疆。还翻译了一些案子的审问情况，交给苏联，共翻了3次。当时狱中有一个青年看管员王子青和一个维族看管员司马义勒同情我，他们偷偷告诉我说盛已杀了不少人，把我的家属也解到阿山去了。1944年4月份把我押到与监狱长和科长赵继良同一个院的小房子里，允许家属探望。我的母亲来探望时说：父亲已于1943年在阿山哈巴河故去了，当年盛把我们全家叫到迪化。1944年5月份盛离开迪化到重庆任农林部部长后，我被释放了，才知道中国共产党派来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同志被盛世才杀害了。盛于1942年叛变投靠国民党后，杀了60000多人。我被释放后不几天，回到狱中取自己在狱中编写的《维汉俄词典》书稿和一些书籍时，赵继良告诉我说：“盛两次派人来杀你，都因为来的人接不到允许行动的电话回去了，你真是侥幸。”

盛世才每次制造“阴谋暴动案”，目的都是要打击共产党员和消除他们的影响。他又怕人们识破他的本质，因此在每次打击共产党的同时，也逮捕和屠杀一些封建王公和富翁（巴依），既乘机发了洋财，又显示他“不是反共”的伪装。盛的另一个诡计手段就是打击一批共产党员，诬陷他们是托派和反革命，又立即起用另一批共产党员，这就使他的伪装假面具较长期地未被许多人所识破。最后在他下台之前，他也用同样的手腕来对付国民党。1944

年8月11日他大批逮捕国民党员时，诬控这些国民党员都是共产党员，他立即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另派一批国民党员来接替他们的工作。此时，盛感觉国民党的势力一天天大了，他的地位难保，于是又想再一次欺骗苏联。他逮捕国民党员后，一方面电请蒋介石再派人来，另一方面向苏联要求“悔过自新”，表示愿将新疆划为苏联领土，给斯大林打了电报，幸好苏联没有理他。听说斯大林将电报转给了蒋介石，盛弄巧成拙，不得不下台了。

盛世才在伪装进步初期，提出过许多进步口号，迷惑了不少人。但这些进步口号并不是他自己的主张，而是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帮他提出来的。他的所谓“六大政策”，以及他所著的《六大政策教程》、《政府目前主要任务》等，也多是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帮他提出或草拟的。

盛世才公开叛变以后，时常以他提出过“保障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的口号自我吹嘘，实际上这个口号完全不是他提出的。相反，他那时为了要骗取苏联的援助，巩固他个人的地位，曾两次要求将新疆划为苏联领土。他1933年第一次提出时，阿布列索夫总领事就认为不当。因那时新疆政权不稳固，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从事建设。为了不引起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干涉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挑衅，阿布列索夫曾提出并屡次要求盛世才加紧宣传“保障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的口号，这口号以后就成了盛世才投靠国民党的护身符了。

三区革命

1942年，盛世才无耻地取掉伪装进步的假面具，彻底背叛革命，打响了完全执行国民党反动政策的第一枪，屠杀革命人民，公开反苏、反共、反人民。为了反对盛世才的反动统治，伊犁各族人民于1944年上半年举行了革命暴动，组织了各族人民自己的

队伍，进行反对盛世才的斗争。苏联方面大力支援了这个革命运动，使伊犁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一直扩大到塔城专区、阿山专区，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三区革命”。其影响日益扩大到南疆和西藏。

1944年5月份，蒋介石将盛世才调到南京，又派了吴忠信任新疆省省长，并把各厅厅长都换成国民党方面的人。为了扑灭革命烈火，蒋介石又命令军阀马步芳派一个军的骑兵，驻扎在新疆各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1945年经南京政府与苏联交涉，双方同意派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南京方面派了以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三区派了团长热黑木江、政治顾问阿合买提江等3人代表团、苏联方面派了一位代表，进行了8个月的谈判之后，制定了十一条和平条款，取消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一名称，恢复三个专区的建制。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把三区民族军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三区革命政权派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但由于飞机失事，他们不幸牺牲。以后又重新选派代表赛福鼎等前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原载《中俄关系研究会通讯》1980年第1期）

汉语拼音方案的确定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的大喜事

我完全同意并热烈拥护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彭真副局长和吴玉章主任所作的几个报告。

现在我单就汉语拼音方案说几句。

汉语拼音方案是各族人民互相学习和沟通文化的有利工具。汉语拼音方案的实施，使少数民族能够更便利地通过学习汉语汉文，得到汉族人民的帮助。

当我们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满怀信心地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要求，我们的文化教育事业应以同样的速度积极发展，一同前进。这就要求更快地在全国范围内扫除文盲，普及教育；要求大力推广普通话，使汉语更趋于统一，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它还要求各民族能打破语言上的隔阂，更亲密地团结在一起，加快步伐，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汉语拼音方案正是满足以上要求所不可缺少的工具。

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是非常正确的。拉丁字母笔划简单，匀称优美，构形明确，便于认写，是世界上使用最广的一种字母系统，现在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6亿以上的人口已采用了拉丁字母的文字。事实证明，对于拼写各种不同类型的各民族语言，它确实是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我们用它来拼写汉语和其他民族的语言，能够使它充分反映各族语言的特点，这实际上就是国际化的字母形式，民族化的具体运用。

正如吴玉章同志在报告里所说的：“这个草案是经过专家长

期研究、各方反复讨论和多次修订的，它确实反映了参加讨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这个方案具备很多的优点，它的确是一个比较成熟、完善的方案，希望这个方案经过大会讨论批准之后，能很快地在各地大力推行。

八年来，通过种种的具体事实，各族人民深深地体会到，少数民族的幸福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各民族的友爱团结，离不开汉族人民兄弟般的帮助。占全国总人口94%的汉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是走在前面的。各少数民族为了更快地摆脱落后状态，发展为先进的民族，就必须通过学习汉语汉文，来学习汉族先进的文化、科学、哲学和经济生产等。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少数民族为了学习汉语汉文，从汉族的先进文化中吸取滋养，曾经作了很多的努力。但是难读、难认、难记、难写的汉字，实在是各族人民学习汉语途径上不易逾越的难关。现在有了这个拼音方案来为汉字注音，作为帮助识字、统一读音、推广普通话的有利工具，作为各族人民之间互相学习、沟通文化的有利工具，可以预料：今后我国人民文化的提高，必然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跃进。

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文和各民族根据必要与可能来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不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推动的。这就是说，在祖国平等友爱团结合作的大家庭中，作为这个大家庭成员、享有平等权利的兄弟民族，在发展和使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的同时，有一个各民族间互相交际的共同语言，并不意味着本民族语言作用的消退和减弱，相反的，这只会更有利于彼此的交往，更有利于民族的繁荣和语言的丰富与发展。事实上汉语已经成为我国各民族的第二母语。高度发展的丰富优美的汉语曾经是并且还将是丰富各民族语言的用之不竭的源泉。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掌握了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也可以通过参照对比，更快更有效地学习汉语汉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年以来，党和人民政府为帮助各民族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作了巨大的努力。从1950年开始，中国科学院相继派遣语言学家和民族语文工作者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各民族的语言，现在已经为16个民族设计了21种文字方案。文字问题尚未解决的民族，正在研究解决的办法；对已有文字的民族，正在继续研究改革的方案。在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深深感觉到，为了避免各民族文字字母的不一致，造成日后相互学习交流的混淆和困难，各民族文字字母形式应当尽量汇通一致。为此，1956年10月曾举行过一次“民族文字字母形式讨论会”，到会的代表一致认为：“为了便于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和便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各个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少数民族文字，应在字母形式上尽可能和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即以相同的字母来表达相同、相近或有对应关系的语音”。这充分反映了各少数民族人民共同的愿望。去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讨论壮文方案的同时，就少数民族文字方案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进行了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原有文字进行改革，采用新的字母系统的时候，也应该尽可能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关于字母和语音的关系，则认为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相同或者相近的音，应该尽可能用汉语拼音方案里相当的字母来表示。

大家认为，各民族的文字，特别是语言关系密切的文字，在字母形式和拼写规则上应尽量取得一致。这样做，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的。

字母一致，不仅有助于各民族语文的互相学习，也便于新词的互相吸收。随着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新概念的不断涌现，特别是解放以来，汉语的词汇正在成批地输入到各个民族语言里去，因而大大丰富了各民族的语言，促进了它们的发

展和提高。例如汉语里的“共产党”、“主席”、“总理”、“工厂”、“合作社”等词，今天已经成为许多民族词汇中的共同成分。祖国各民族语言中这些共同成分的日益增加，有利于各民族的互相学习交流。

可是，有些人对处理新词术语态度不够正确，翻译时把一些有本质差别的概念混淆起来，这样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各民族文化交流没有好处。

在某些民族当中，有些人对处理新词术语的态度是不够正确的。运用本民族语言原有的词汇来构造新词，这个原则本来是正确的，但是有些人因为怕借词似乎会“损害”自己的民族语言，把不该译的也译了，或是利用一些另一含义的语词，来兼作表达这一新概念之用，称为“旧词赋以新义”，把一些有本质差别的概念混淆起来，完全歪曲了当前所要表达的新概念的意思，那当然是错误的。比如，有一份藏文报纸，把“上海”这个地名也用本民族的语言译成“上面的海”（Yarco）了；有一份景颇文的材料，用本义为“独立”的本民族语词Shanglot 来译“解放”，于是上海的“解放”和加纳的“独立”就成了同一个词了；有的人强调借词要先从同语族的语言中（哪怕是国外的民族）吸收，然后才是汉语；有的人在翻译工作上，对外国语的借词比汉语借词感到更大的兴趣，有一些汉语借词群众口里已经普遍地使用了，他们却要另找一些群众所不了解的外来语借词。

去年我去新疆牧区视察，曾邀集当地一些教员、干部座谈。他们反映：《新疆日报》所用的一些新词汇他们很难理解。比方这次人大文件中，薄一波副总理的报告里有“事故”这个词，维文翻译用了一个外来语借词Avaria（是来自意大利语），我问了好几位代表，都说不懂。

这种作法，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与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交流都是没有好处的，只会造成多数人理解上的困难。当然，我们并

不反对在群众都已了解的基础上，适当地吸收一定数量的国际通用的语词。大家知道，我们国内各少数民族要在经济文化上很快地跻身于先进民族行列，首先要学习和吸收我们祖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先进的文化、科学等，并取得他们的帮助。因此，当一个新的概念、名词术语在本民族没有而在我们祖国共同语言词汇里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吸收它来丰富我们的民族语言呢？采用我们祖国共同语言的词汇，这对我们各少数民族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并取得他们的帮助，促进我国各民族的文化进一步融合贯通，加强我们祖国各民族的统一和团结，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总之，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行，是我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它不仅是汉族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喜事，同时也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的大喜事。汉语拼音方案的确定，不仅有利各民族学习汉语汉文，同时也可用作我国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我们热烈拥护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希望大会予以通过批准。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2月15日）

民族语文工作的道路

——在第二次少数民族语文 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有着50多个民族的统一的大家庭。各民族在为缔造统一的祖国和发展祖国的经济、文化的历史生活中，共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长期反动统治的结果，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些民族发展快一些，有些民族则落后一些。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党和人民政府便进行了许多艰巨的工作来帮助各民族发展，使每一个民族都成为祖国大家庭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有高度发展的成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必须相应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但有些少数民族根本没有文字或虽有但却不能适应当前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因此，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对某些民族必须帮助他们创立文字或进行文字改革，以便进行扫盲、教学，促进他们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几年来党和政府在帮助各少数民族创立和改革文字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同时，苏联专家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为了作好这方面的工作，首先必须对少数民族的语文进行科学的、周密的、深入的调查。因而，在第一次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之后，中央就派出了包括二十几种民族成分的700人组成的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在汉族语言学专家的带领下到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调查了33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情况，

分辨了语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帮助壮、布依、苗、彝、黎、纳西、傈僳、景颇、哈尼、拉祜、佤等11个少数民族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立了16种文字方案，并对傣族原有的文字进行了改革，给他们设计了两种改进文字方案。这就是说给12个民族创立了18种文字方案。其中壮文方案业已经过国务院批准，开始正式使用。其余的正在试行，试行之后，在不久的将来也将经过批准，正式使用。

在我们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展开的时期，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适应这一需要向前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在巩固我们伟大祖国大家庭的成员——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友爱合作和促进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方面将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科学院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持下，今年3月28日至4月16日召开了第二次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会议的结果表明，几年来少数民族语文工作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如在语文科学工作人员中出现了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有些人对于在共同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在经济与文化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人民之间所产生的思想统一、相互学习、亲密合作的关系，不能体会和不能正确认识。他们过分强调民族语言的差别和分歧，忽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各民族语言相互接近的趋势，表现出民族语文工作上的地方民族主义和本位主义倾向。在这次会议中，对于这样的现象给予了正确的批判，帮助有这些思想倾向的人建立正确的认识。同时，为了今后给少数民族创立新文字和对已有的文字进行改革，会议进一步研究了1957年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五项原则，决定今后创立和改革少数民族文字，尽量与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本民族没有的新词术语则借用汉语。这是这一次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不能说，问题由这一次会议就可以完全解决了，为此还需要在群众中，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和

干部中，在语言科学工作人员中，进行许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工作。

在这次会议中反映出：有些人主张“要保持语言的纯洁性”，他们企图把群众的语言中早就接受下来的从汉语中或从本国其他兄弟民族的语言中借用的词汇都清除出去，而另行创造新的词汇。这表明在语文问题上存在着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种主张不外乎是想把本民族装在一个狭窄的民族外壳之内，使之处于孤立的地位。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想使一个民族钻在自己的外壳之内孤立地生活，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知道，在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改变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之后，民族之间的关系，基于新的经济基础、政治和思想的统一就要变为新的关系，即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每一个民族都将通过和其他民族之间的友谊、合作关系，丰富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同时为发展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做出贡献。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建立，会使各民族间增强友谊合作的思想，建立高尚的爱国主义，实现真正兄弟般的关系。这样的民族关系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有阶级矛盾，反映在民族关系方面就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那里没有民族平等。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民族由于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各民族之间便产生了精神上接近的条件。每天都在迅速成长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促进了各民族相互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可以从苏联各民族40年来所得到的发展中体会到这一点。

苏联各民族，大多数都用斯拉夫字母为基础创立新的文字。这样做就使得俄罗斯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发生紧密的联系，更便于彼此间的互助合作。一切非俄

罗斯民族的人民都非常重视俄罗斯人民对自己的兄弟般的帮助。采用俄文字符对于在各民族学校学习本民族语文，同时对于学习俄文，都有很大的便利。凡是本民族语言中所没有的新词术语则由俄语中借用，从而丰富了本民族的语言。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经验。

在我们的伟大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民族大家庭里，占人口百分之六的50多个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和汉族人民的利益组成为一个整体利益，各民族劳动人民和汉族劳动人民的命运是一致的。我们从汉族人民和其他各民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来看，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进行兄弟般地合作并接受他们的帮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实际需要。为学习汉族语文、进而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创造便利条件，把汉语拉丁化拼音字母作为各少数民族文字的基础，从汉语中借用本民族语言中所没有的新词汇，这乃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一件大事。这样做能够使祖国大家庭的各民族更加接近，能够进一步加强他们的友好合作，丰富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同时发展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及其它建设事业，并且有利于巩固祖国的完整和统一。各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在我们伟大祖国民族大家庭中，汉语早已成为各民族人民之间共同的第二母语了。

在我们伟大祖国里，某些民族中有好几种方言。有些人极力主张扩大这些方言的距离，主张为每一种方言创立单独的文字。这种人没有认识到那一个民族人民一般的心理状态，没有认识到在一个民族内部统一文字所起的作用。社会主义时代是各民族语言、文学、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繁荣发展的时代。这种发展并不是以互相分开、远离为原则，而是以互相学习、互相从语言及文化中吸收新的东西，从而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为原则。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们的面前，摆着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语言文字的光荣任务。特别

是各民族语言文字学家们，应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密切联系实际，依靠各民族群众，完成党、人民政府与各民族群众所交给的光荣任务。我们相信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

（原载《民族团结》1958年第5期，
原题为《社会主义大跃进中
民族语文工作的道路》）

我的希望

——祝贺《新疆社会科学》创刊

得知《新疆社会科学》创刊的消息，我十分高兴。新疆社会科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综合性学术园地，各族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在这块园地上耕耘播种，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是件很有意义的可喜可贺的事情。

在我们祖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中，新疆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但具有重大的国内影响，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国际影响。在古代，地处“丝绸之路”要冲的新疆，对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流，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相互了解和影响，都起过重大作用。新疆不但地域广阔，历史悠久，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以及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都是丰富而多采的，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由于新疆与苏联、蒙古、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相毗邻，有些民族是跨国境的，因此新疆的地区史、民族史，以及语言、文学、艺术、民族、宗教、考古等学科的研究，早已成为国际性的研究课题了。加强对上述诸问题的研究，不但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与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需要，也是反霸斗争的需要。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提高自己的革命责任感。

自19世纪以来，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侵略的目的，都曾染指新疆，他们掠夺过大量珍贵的文物和重要资料。解放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腐败和无能，在新疆从未建立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少数民族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是寥若晨星。解放后，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与关怀下，新疆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才得以

建立，各民族的科研队伍才逐步发展起来。这是党的民族政策在新疆的胜利。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按照党中央的这个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努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大力培养少数民族的科研人员。我相信，《新疆社会科学》在自己的实践中，一定能为实现上述要求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虽已年老体弱，但能在自己的晚年看到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心中感到十分幸福和快慰。我希望新疆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老一辈的专家、学者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人人争当伯乐，奖掖后进，使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科研队伍不断壮大，使我们已经开创的事业不断发展。

祝《新疆社会科学》成为祖国社会科学园地中一株茁壮艳丽的花卉！

（原载《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创刊号）

《丝路游》创刊词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种桑、养蚕和纺织丝绸的国家。在海上交通尚未发达的时候，轻柔美丽的中国丝绸和其它产品，主要是通过河西走廊及新疆境内的几条通道输往中亚及西方各国的。由于中国丝绸的输出在当时中外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人们对丝绸的倾慕，这条连接祖国内地同西部边疆并进而通往西方各国的古道，便被人们称之为“丝绸之路”。自汉唐以来，这条古道就成了中外人民友好交往的一条主要通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条古道上虽然也有过战云密布的时候，但在更多的时候，它却始终是中外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沟通睦邻情感的一条友谊之路。张骞出使、玄奘取经，走的是这条路；鸠摩罗什、马可·波罗东来，走的也是这条路。在这条通道东段的广大地区，居住着我国维吾尔、汉、回、哈萨克等民族勤劳智慧的人民，文明昌盛，物产丰富，各种各样的名胜古迹星罗棋布，象一颗颗珍珠点缀在古道的沿线各地。因此，即使在海上交通发达以后，这条古道也并未失去它的重要性。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这条古道更成为沟通我国内地与边疆、沟通中外人民的物质和文化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它的周围，成了我国经济和文化建设中一个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重要地区和吸引中外游客的一系列旅游胜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局和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旅游杂志《丝路游》，系统地向中外游人介绍这条古道及其周围地区的文化和现状，宣传和促进国内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各国人民的友

谊，为祖国的“四化”大业服务，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不但为之非常高兴，而且衷心祝愿它成功。在目前众多的旅游报刊中，我希望《丝路游》能办出自己的特色，能显示出自己特有的个性；无论对历史或现状的宣传介绍，都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使人们能从中获得真知，以事实本身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吸引人们的兴趣；刊物本身要尽可能办得“艺术”些，生动活泼，图文并茂，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在可能的限度内，也使它具有某种学术价值。

（原载《丝路游》创刊号，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

总 论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目前还是一个拥有众多民族的世界。人们的民族区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具有广泛的影响。各个民族由于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所形成的民族差异和特点，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压迫制度所造成的民族矛盾和斗争，以及各族人民在不同条件下所创造的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在不同时期得到不同程度的研究。进入现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民族因素的作用显得更加突出，民族和民族问题已成为多种学科的研究对象。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广阔的知识领域，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理论意义。

民族和民族问题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和规律。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并不是自古就有的，也不是永世长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将来，当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以后，随着各民族的高度发展和繁荣，民族差别将逐渐消失，全人类将融合为一个没有民族区分的整体。

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再后是民族消亡。中国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民族最早形成于哪个时代，目前尚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一种意见认为，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至阶级社会初期，与国家同时或先后形成；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民族早在蒙昧时代便已形成。

在中国学术界，正由于对民族形成的时代看法不同，因而不同学者在使用“民族”一词时，所表达的含义也有所不同。此外，“民族”一词还有一种含义比较广泛的用法：既指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和现代民族、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也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各民族，如中华民族、印度民族、阿拉伯民族、大洋洲民族等。这种广义的民族概念，相当于英语 *ethnos*、*people* 和俄语 *этнос*、*народ* 的含义；而狭义的民族概念，则相当于英语 *nation* 和俄语 *национа* 的含义。本卷多数情况用于广义。

汉语“民族”一词出现的年代较晚，据现已查到的资料来看，最早是在19世纪后半叶。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和国外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民族一词便在国内开始普遍使用。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含义，常与种族或国家概念相混淆，直到近几十年，始逐渐区分开来。

民族与种族不同。种族亦称人种，以人们体质形态上具有的某些共同遗传特征（肤色、眼色、发色、发形、血型等）为标志，属于体质人类学和生物学范畴。同一种族的人，通常形成为许多不同的民族；而同一民族的人，有时也包括有不同的种族成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也具有同样的情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家疆界和民族疆界，有时是一致的，于是便形成了单一成分的民族国家；但多数情况是不一致的，在一个国家的地域内居住着众多民族的情况相当普遍，而同一民族的人们散布到几个、

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国家的现象亦非罕见，因而大部分国家是多民族国家。

目前，全世界共有大小民族2000多个。据1980年统计，人口上亿的民族，包括汉族在内有7个，共18亿多人。此外，人口在千万以上的民族有60多个，百万以上的有200多个，十万以上的有500多个。这些民族的人数，约占全球总人口的99%以上；其余1000多个民族，总共约有4000万人。这些民族在种族成分、语言系属、宗教信仰、分布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呈现出一派极其复杂纷繁的景象。

从种族成分上看，世界各民族通常被区分为三大人种（及各种混合类型）。在全球人口中，欧罗巴人种约占43%，过去主要分布在欧洲、北非、西亚和北印度，16世纪后逐渐扩散到美洲、大洋洲和南非；蒙古人种约占41%，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西伯利亚和美洲；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约占16%，主要分布在热带非洲、大洋洲、南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16世纪后一部分被欧洲殖民者强运至美洲。

从语言系属上看，世界各民族的语言通常被区分为十多个语系。在全球人口中，属印欧语系的民族约占45.5%，汉藏语系的约占25%，其次为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南岛语系、闪含语系、达罗毗荼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南亚语系。

从宗教信仰上看，现在已有一部分人是无神论者；但在绝大多数民族中，宗教仍具有很大影响。在全球人口中，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三大世界性宗教的人，约占50%左右；信奉印度教、犹太教、耆那教、锡克教、拜火教和神道教等地区性宗教以及各种原始宗教的人，约占25%。

世界各民族分布于五大洲四大洋，从冰天雪地的北极圈到烈日炎炎的撒哈拉大沙漠，从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到星罗棋布的太平洋岛屿，人们生活在自然景观和物产资源迥然不同的广大

地域上，从事着多种多样的经济活动，创造着多彩多姿的文化艺术，使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闪耀着人类智慧的灿烂光辉。然而，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水平上呈现出极大的差距。今天，当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人类的触角已伸向太空、正在进一步揭开宇宙奥秘的时候，而在亚非拉和大洋洲的孤岛荒野、偏僻山区和热带丛林里，仍有一些原始民族停留在钻木取火、以采集和渔猎为生的石器时代。如果将各民族现在所处的社会状况按历史发展顺序加以排列，在我们面前便会展示出一幅从原始公社制到社会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生动画面。在各民族的现实生活中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化石”，能为我们认识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和规律提供极其宝贵的实证资料。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远古起，我们各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和繁衍在中国这块辽阔富饶的大地上，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结合成伟大的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又共同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英勇斗争，缔造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大家庭。今天，在这个民族大家庭里，生同生活着56个兄弟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约占全国10亿多人口的93.3%；其余55个民族，约占6.7%，共约6723万人，因其人口所占比例较小，习惯上一般统称为少数民族。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在千万以上的有壮族；人口在千万以下、百万以上的，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等14个民族；人口在百万以下、十万以上的，有哈萨克、傣、黎、傈僳、佤、畲、高山、拉祜、水、东乡、纳西、柯尔克孜、土、羌等14个民族；人口在十万以下、一万以上的，有景颇、达斡尔、仫佬、布朗、撒拉、毛南、仡佬、锡伯、阿昌、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鄂温

克、德昂、裕固、京、基诺等18个民族；人口在一万以下的，有保安、塔塔尔、独龙、鄂伦春、门巴、珞巴、俄罗斯、赫哲等8个民族。

中国各民族的种族成分相当单纯，绝大多数属于蒙古人种的各个类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具有或混有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但在语言上则比较复杂。除汉族和回族共同使用汉语外，其余54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语言，分属五个语系：语言属汉藏语系的有29个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南和西南地区；属阿尔泰语系的有17个民族，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属南亚语系的有3个民族；属印欧语系的有两个民族；属南岛语系的有一个民族；还有一些民族的语言系属尚未确定。宗教在汉族地区势力不大，但在少数民族中却有着广泛的影响。某些民族甚至保持着多数信仰某一种宗教的情况，如藏族、蒙古族之信仰喇嘛教，傣族之信仰小乘佛教，回族、维吾尔族之信仰伊斯兰教等。这就使宗教具有了民族性。宗教信仰本不是民族特征，但在很多情况下，宗教问题又往往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问题。

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各民族在全国范围的地域分布上形成了汉族多住中原、少数民族多住边疆的状况，但在两者之间并无明显界线。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般都有一定数量的汉族居民；有的地区，汉族居民甚至还占多数。各少数民族除有或大或小的聚居区外，并与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交错杂居。此外，还有1700多万的少数民族人口散居在全国各省、市的大小城镇和乡村。这种分布情况，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密切关系。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虽小，但分布地区很广，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0~60%，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并多处于国防要冲，在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汉族人口众多，在其

居住的中心地区，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比较发达，长期以来，曾对各少数民族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汉族也不断地从少数民族中吸取经济文化成就和素养。正是在长期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中，形成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内在联系。今天，这一联系更不断增强。

然而，由于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所留下的不良后果，各民族间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事实上不平等，以及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影响，都给今日新中国的民族工作提出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因而，民族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依然存在。当然，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至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各国，民族问题表现得则更加突出。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是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或者是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民族问题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

民族问题，实际上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往往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在对抗状态中发生和发展的，其突出表现形式，就是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民族斗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但民族斗争不等于阶级斗争。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是交错发生的。总之，民族问题并不是什么孤立自在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演变和革命的发展，民族问题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而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自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当人类历史进入 17 世纪以后，在西方各国，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增长，资产阶级日益成为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为了争夺商品市场，遂以民族为旗号发动了推翻封建专制

制度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全民运动，从而使民族问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19世纪中叶以后，在东欧与亚洲爆发的一系列民族民主革命，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和内容。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已将世界瓜分完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的对立。这时的民族问题已超出了国家的范围，而扩大为世界性的民族殖民地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东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遂使民族问题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使殖民地半殖民地从过去帝国主义的大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前哨阵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一系列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冲垮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改变了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

我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开始迈进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和亚洲一些国家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尤其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更为近四分之一的人类奠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随着人类历史的这一伟大转变，民族问题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压迫制度以后，民族关系基本上已成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民族矛盾在多数情况下是人民内部矛盾。消除以往剥削阶级在民族关系上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解决历史上所造成的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加强民族团结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便成为新时期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出现在斗争的舞台上。每个阶级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理解和对待民族

问题的，而民族问题在不同时期也服从于不同的阶级利益。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并在各个方面形成对立。从而在对待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态度上，也就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民族观——资本阶级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无产阶级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来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认为：民族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民族只有发展上的先进后进之别，而无优劣、高低、贵贱之分；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赋有多方面的聪明才智，都是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都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现存社会的民族不平等现象，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阶级造成的，所以，无产阶级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主张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世界。

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看法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他们坚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以本阶级的利益充当全民族的利益，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则具有不同的历史作用。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性质，是进步的。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已演变为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领土扩张主义和殖民帝国主义，甚至借助荒谬的种族主义理论，以“优等民族”自居，统治压迫其他民族，这是一种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则具有反帝、反殖、反霸、反对种族主义的性质和内容，在当代已形成为一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这是一种革命的、战斗的民族主义。此外，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民族主义还有各种不同形式的表现，也应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即支持一切进步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反对一切倒退的、反动的民族主义。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两种民族观，是两种世界观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民族观既指导着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同时也指导着人们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因而，在民族研究领域里也存在着两种民族观的对立和斗争。

民族研究的历史发展

有关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一般简称“民族研究”。民族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领域，牵涉的范围广，涉及的学科多。在进行民族研究时，不论是对某一种民族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具体考察，还是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进行理论探索，一般都要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宗教学、心理学等专门学科。特别是关于民族来源、历史演变和社会形态的研究，离开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便难以进行有效的综合和深入的分析。至于有关各民族现实问题的研究，有时还要涉及到更多的学科。

作为科学的民族研究，至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历史上以民族为对象所作的观察和记述，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积累，则是源远流长的。早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出于和平交往或进攻防御的需要，便开始有了对周围民族的认识和了解。尔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对民族的认识越来越丰富和深入。人们关于民族知识的积累，经历了一个由近及远、由传说到实证、由粗略到翔实、由感性到理性的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从最早见于文字记载到19世纪中叶，大约经历了两三千年的时间。

在中国，早在殷契卜辞和周金铭文中便有了关于近邻民族的零星记载，《尚书》、《山海经》等先秦古籍中也有关于周边民族

的片断资料。至西汉司马迁作《史记》，特别重视实地考察，除大量记载历代社会经济情况外，并以《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形式系统地记录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情况，开创了为各民族作“传”的先例，这对中国史学有深远的影响。此后官方编史，代代相沿，从而使民族资料在二十四史中占有重要地位。除此以外，各民族学者还撰有许多包含丰富民族资料的著作，如《禹贡》、《水经注》、《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蛮书》、《桂海虞衡志》、《蒙古秘史》、《突厥语词典》、《满洲源流考》等等。历代的地方志、文集、游记、族谱和碑铭，也包含有关于许多民族社会结构、政治状况、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的生动记载。至于象《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经行记》、《诸蕃志》、《岛夷志略》、《真腊风土记》、《西洋番国志》、《瀛涯胜览》、《海国图志》一类的著述，则更详细地记录了中亚、南亚、东南亚乃至远达东非地区众多民族的生活状况。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所保存的极其丰富的民族资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在国外，有关民族知识的积累，也可上溯到遥远的古代。古埃及金字塔的壁画中绘有不同民族人物的形象，古巴比伦、亚述、波斯帝王的铭文中也有关于周边民族情况的早期记载。此后，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写的《历史》和古罗马学者C.塔西佗写的《日耳曼尼亚志》，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民族情况。公元1世纪初，古希腊的历史、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地理学》一书，曾提到从不列颠到印度、从北非到波罗的海这一广大地区的八百多个民族。中世纪时，在欧洲僧侣、商人和旅行家的著作里，也可以找到有关欧洲、北非和西亚各民族的记述。特别是《马可·波罗游记》，使西方人大开眼界，开始了解到中国、中亚和东南亚民族的情况。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促使欧洲各国的航海家、探险家、传教士、商人和殖民者泛舟远航，到达美洲、

非洲、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他们关于所接触到的各民族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的报道，大大丰富了世界民族资料的宝库。18世纪开始出现对各民族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如法国传教士J.F.拉菲托的《美洲野蛮人的习俗与古代习俗的比较》(1724)和C.德希罗斯的《偶像崇拜》(1760)等。法国的启蒙思想家J.J.卢梭、C.L.de孟德斯鸠、D.狄德罗和伏尔泰，在论证人类早期社会状况时，也曾广泛运用美洲和大洋洲的民族资料。

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揭开了欧洲近代史的序幕。在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欧洲，科学已冲破宗教和自然哲学的束缚，得到空前发展，并逐步分化为许多独立的学科，形成近代科学体系。然而，这时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各学科，主要都是以研究欧洲民族为对象的，而对于“地理大发现”后所接触到的非欧洲民族则是陌生的。于是，至19世纪中叶，形成了一门专以研究美洲、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落后民族为对象的独立学科——民族学(Ethnology)。至于当时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民族运动蓬勃发展时期所产生的民族问题，则不在民族学研究的范围，而属于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和历史学范畴。为了适应各国资产阶级争夺民族市场和建立民族国家的需要，这些学科曾进行大量研究，并留下一系列论述民族性、民族原则和民族主义的著作。后来，随着西欧各主要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向殖民帝国的转变，关于欧洲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降到次要地位；西方学者便把主要注意力转向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殖民争夺的广阔世界，遂使民族学得以迅速发展。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尚处在上升发展阶段，资产阶级学者多具有进取精神，并试图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时，在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进化思想影响下，首先在民族学中形成了“进化学派”。到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转向反动，甚至连进化论也难

以容忍。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影响相对抗，在民族学中也相应地出现了一系列反进化论学派，如德、奥的“传播学派”、美国的“历史学派”、法国的“社会学派”和英同的“功能学派”等。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些学派，则不同程度地具有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民主倾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殖民体系的崩溃，西方国家的民族学者已不能再局限于对殖民地落后民族的研究，而开始转向发展中民族和发达民族，从而造成民族学与民俗学、社会学的合流。战后国外民族学的发展，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第三世界许多新兴国家也开始进行本国的民族研究。过去西方民族学者对他们国家所做的调查、所写的著作，尽管在理论和观点上有不同程度的错误或偏见，在政治上曾被殖民主义国家所利用，但是在资料的积累上，对这些新兴国家的民族研究和有关学科的发展则是有益的，并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对世界各国民族情况的了解。

在中国，自近代以来，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影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首先传入中国的是民族主义思潮。当时，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不断深入，中国正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所有的维新派和革命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大力提倡民族主义，试图用民族精神促使全国人民觉醒并团结成一个坚强的民族，以抵抗列强的欺凌，挽救国家的危亡。这一思潮支配着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研究。在这一历史时期，曾涌现出大批阐释民族主义、论述民族概念、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疾呼民族危亡、维护民族尊严、宣扬民族精神、反对民族压迫和争取民族平等的文章和著作。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出现了对国内各民族历史、社会、语言、文艺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各种近代科学。早在19世纪末，章太炎便在《序种姓》一文中开始研究中国民族的形成、各民族的由来

和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1901年，梁启超便在《清议报》上撰文阐发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至20年代，他进一步在大学讲坛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源流、系属和分布的史学见解，在这一时期，其他学者也先后编撰了一些有关中国民族史方面的专著。这些前辈们的博识宏论，打开了当时人们的思路，为中国近代民族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进一步扩大了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影响。1928年，他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在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民族学组（1934年后改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并自兼主任，在他的主持下，曾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湘西苗族等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语言进行了综合调查或专题调查，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除中央研究院以外，当时燕京、清华、云南、四川等大学也分别进行了一些民族研究工作。1934年成立中国民族学会，第一次将全国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联合起来。同年，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推动了民族史地研究和边疆问题研究的开展。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民族学者、历史学者和语言学者集中到西南和西北各地，于是对于西南和西北各民族的调查研究逐渐增多，并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民族和边疆问题的书刊，遂使国内民族研究粗具规模。

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也象整个社会科学一样，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多受剥削阶级偏见的束缚，未能形成真正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则贯穿着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向前发展。

K.马克思和F.恩格斯吸收并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创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和社会科学，其中也包括民族研究。19世纪中叶，西方民族学刚刚兴起，当即引起他们的关注。1860年12月19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A.巴斯蒂安《历史上的人类》一书，马克思和

恩格斯还阅读了德布罗斯、梅纳斯、汉密尔顿、米莱尔、皮凯林等人的作品，研究了J.J.巴霍芬、J.F.麦克伦南、H.J.S.梅因、J.拉伯克、E.B.泰勒和M.M.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做了许多笔记和摘要。他们对L.H.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一书评价尤高，认为他在主要点上发现和恢复了人类成文历史的史前基础。马克思曾对此书做了详细摘要，并打算联系自己唯物主义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未能如愿。恩格斯执行了马克思的遗言，于1884年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其中关于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以及由野蛮向文明转变、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分析和论述，为研究古代民族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当时现实斗争的需要，还专门研究了欧亚许多近代民族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他们在阐述爱尔兰、波兰、匈牙利、中国、印度、波斯和中亚问题的一系列论著中，以及在《共产党宣言》(1848)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基本思想。他们将民族和民族问题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指出民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民族解放是劳动人民社会解放的一部分；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是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因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他们的这些思想，对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研究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B.I.列宁也对欧亚各国的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写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1916)、《民

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等重要著作，揭示了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和社会内容，建立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关于应区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关于民族问题上的两种历史趋向，关于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以及关于民族发展、民族接近和民族融合等等的论述，既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民族纲领和政策的指导思想，也是民族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И. В.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2～1913）、《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2）等著作中，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民族概念、民族问题发展三个时期、消除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发展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民族文化、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原理，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同时，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民族学也得到改造，而逐步发展为研究国内外古今一切民族的学科，改变了西方民族学只研究不发达民族的格局。苏联民族学于50年代传入中国，曾对中国民族研究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马克思主义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的日益丰富，推动着民族研究不断地向前发展。除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民族研究的指导思想以外，在西方也有许多从事民族研究的进步学者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断与西方民族学中的一些反动思想进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这种趋向更加明显。马克思主义对于第三世界一些新兴国家民族研究的影响更为广泛。

新中国的民族研究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并以丰富的

革命斗争实践为基础，创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建设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关于反抗帝国主义民族压迫和推翻国内反动统治的论述，关于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关系的论述，关于揭示中国民族关系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的论述，关于加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论述，关于社会改革和民族繁荣、培养民族干部和发展民族经济文化的论述，以及克服民族主义和搞好民族关系等等的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纲领，同时也是对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这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乃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中国的科学的民族研究，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始和逐步发展起来的。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十分重视了解、研究国内的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也注意了解和搜集沿途各民族的社会情况。至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建立了专门的民族研究机构，开始对革命根据地内所接触到的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进行研究，并写出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与著作。在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一些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各民族历史及现实问题。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研究有了良好开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族研究更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1950年，政务院在关于筹办中央民族学院的文件中明确规定：中央民族学院及其分院均应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不久，又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先后建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即民族识别、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民族识别是民族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许多过去在反动统治时期隐瞒民族成分的少数民族纷纷要求恢复自己的民族成分。至1954年普选时，自报的民族名称竟多达数百。为了弄清这些族称是否为单一民族或是某一民族的分支，曾组织大批民族学者、历史学者和语言学者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对各族称单位的语言、地域分布、经济生活、文化传统，以及各族人民的意愿进行了深入的调查。1956年，国务院根据民族识别工作的成果，公布了中国51个少数民族的名单。尔后经过继续识别，至1983年经国务院正式确定，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这项研究，在中国是一大创举，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少数民族语言调查是民族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语言学者（主要在西南地区）对某些少数民族语言作过一些调查，但对全国绝大多数的民族语言尚未作过调查研究。这种状况不能适应新中国开展民族工作的需要。因而，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56年组织7个语言调查队，共约700多人，分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语言普查。至1956年，已查清15个省和自治区42个民族的语言情况（尔后经继续调查，已弄清近60种语言的情况），对这些语言的语音系统、语法结构、词汇、语言系属等方面作了初步研究；为适应当时的需要，编写出版了一部分民族语言的词典、语法和教科书。通过这次普查，搜集到大量珍贵的语言资料，发现了许多过去从未见过的语言现象。这不仅为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改革、改进文字，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还为以后的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丰富和发展语言学理论开拓了前景。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民族研究的又一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样的调查研究一直在各级政府和有关科研机构中进

行着。自1956年起，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次调查历时数年，最先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领导，1958年后改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先后从各有关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抽调了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专业人员以及民族工作者，共1000多人，组成16个调查组，深入民族地区，对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力、所有制和阶级关系、历史发展和风俗习惯进行了普查，搜集编写了数千万字的调查资料。同时，还搜集了一批民族文物，拍摄了一批反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科学记录影片。所有这些工作，无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还是对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三次大规模的系统的民族调查，充分反映了建国初期民族研究工作的概貌和特点，为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科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自60年代起，逐渐转向经常性的调查和研究。民族问题理论、民族学、民族历史和民族语言等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

然而，在十年动乱期间，民族研究也如同社会科学其它部门一样，遭受摧残，陷于停顿。直至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始得恢复，并得到新的发展。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除民族研究所外，又建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不少省、自治区、自治州和高等院校，也分别建立了一系列研究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语言、文艺的科研机构。为了适应新时期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形势发展的要求，已初步开展了关于世界民族问题和国内民族经济问题的研究。自1979年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以后，在民族研究学术领域，许多群众性的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多种形式的学术刊物陆续出版，各种内容的学术讨论会接连召开，各种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经常举行，学术气氛空前活跃，标志着新中国的民族研究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目前，中国的民族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民族问题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党和国家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国内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以及与民族问题有关的统一战线问题和宗教问题。

民族学研究，主要研究世界上各类民族共同体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和规律；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民族来源和民族特点；研究新中国建立后国内各民族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变化过程和发展前景，以及在社会改革中的变化和经验；研究民族学理论和调查方法，以及民族发展史。

民族历史研究，主要研究国内古今各民族的族别史和民族关系史，以及各民族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和地区民族史；研究各民族在历史上亲密交往、互相影响、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过程和贡献，以及这些历史活动的规律和意义。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也属民族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民族语言研究，主要研究国内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现状及其发展规律，研究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亲属语言之间的关系）；研究各民族文字（包括古文字）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研究各民族文字的创制、改革、改进等问题，以及各少数民族语言在使用和发展过程中提出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世界民族研究，主要研究世界各国的民族构成，以及各民族的人口分布、种族类型、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族来源、历史迁徙、经济生活、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基本情况；研究各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研究第三世界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种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斗争。

以上只是目前民族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此外，关于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学、宗教、体育、音乐、舞蹈、绘画和工艺美术等

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与民族研究工作逐步开展的同时，大体上也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科研机构网。在中央和地方，这些研究机构分属三大系统，即社会科学院系统，民族学院和其它高等院校系统，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和少数民族地区各级党政机关中的调查研究机构。上述各研究机构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一般在专业设置上各有侧重，例如内蒙古自治区着重研究蒙古语族各民族，西藏自治区着重研究藏族和藏传佛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着重研究突厥语族各民族，广西壮族自治区着重研究壮侗语族各民族，宁夏回族自治区着重研究回族和伊斯兰教，四川省着重研究藏缅语族各民族和凉山彝族奴隶制等，而在北京则为多学科多方面的综合研究。在这些民族研究机构中，特别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研究人员，目前已有一批少数民族专家学者成长起来，开始担负起研究工作的重任。

从长期的科学实践中，新中国的民族研究还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直接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服务；着重实地调查；注意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各研究机构的各类专业人员紧密配合，并与广大实际工作者密切合作；民族研究的学科建设，也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形势的发展而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进展，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除发表一系列论文和专著外，当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正在主持和组织全国广大民族研究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参加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五种丛书，篇幅庞大，卷帙浩繁，共达数百册数千万字，现

已陆续出版。民族研究领域的广大专家学者和部分民族工作者，除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的编写工作外，还投入了《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民族词典》和《中国少数民族》丛书（图文并重）的撰稿和编纂工作。这些著作、工具书和丛书的出版，将反映出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研究工作的重要成果。

可以预见，今后随着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在少数民族地区，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思想意识到生活方式，必将引起一系列新的变化。这又将给民族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推动民族研究向学术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本文系作者与江云、牙含章、秋浦、马寅合撰）

附录：

我的自传

我于1894年出生在一个华侨贫农的家庭里。祖籍是新疆阿克苏县依列克村。18世纪末，祖辈们逃难到帝俄境内哈桑省的森林里伐木开荒，就在那里定居，将那个地方也取名为阿克苏。我就出生在那里。少年时因家庭贫穷，投靠舅父读过两年书，后来就去当学徒和店员。1912年，我独自回到了祖辈们日夜思念的祖国，在乌鲁木齐一家由俄国资本家开的“天兴洋行”当店员，后任会计。1920年开始在新疆省政府工作。多年坎坷的生活，使我看到官僚、财主（巴依）们对劳苦群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看到我们祖国各民族的深重灾难，使我不得不经常考虑拯救祖国和民族之路。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由于新疆所处的特殊地位，社会主义苏联的影响，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传播到新疆来，在一部分进步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尤为显著。我也是接受这种影响的年轻人之一。从那时开始，在我心中逐渐产生了一种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对人类未来的信心。1929年，我因公到德国柏林，后入柏林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利用离职读书的机会，我开始比较系统地自学马列主义理论，这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1932年路过莫斯科时，与苏联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回国后，又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同志建立了联系。1937年，我被当时伪装进步的盛世才政府派往苏联，任驻斋桑领事馆领事。1938年盛世才电召我回国述职，刚入国境即遭逮捕，直至1944年11月底被释放出狱。1946年新疆三区革命联合政府成立，我任省政府副主席兼新疆学院院长。1949年初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在党

的领导下组织新疆进步人士为新疆和平解放进行准备工作。解放后，于1949年11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曾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等职。

我被盛世才关入监狱后，1939年曾写了《向毛泽东致敬》等诗歌以及有关历史、语言方面的一些文章，并曾写过反映新疆教育事业状况的剧本《阿合买提校长》（初稿）。这些文稿，除极少数在解放后曾整理发表过外，其余绝大部分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我在狱中还编写了一部《维汉俄辞典》，1953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我主要从事革命政治活动和民族历史的研究，主要历史论文有《论阿古柏政权》等，还曾写过一本回忆录《新疆五十年》。文学创作除零散写过一点诗歌和散文外，主要是写了剧本《火焰山的怒吼》（原名《战斗中血的友谊》）。这个剧本的初稿是1942年在狱中写成的。初稿完成后，几经周折，逃过了反动派的多次查抄，终于保存下来，并于1961年重新修改定稿。《火》剧取材于1913年到1914年在新疆吐鲁番克孜里塔克山（即火焰山）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一带发生的维吾尔族农民领袖艾买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史实。这次起义是继1911年在哈密爆发的帖木儿起义失败后又掀起的一次有影响的农民起义。艾买提率领义军在吉木萨尔等地的山中转战，机动灵活地同敌人斗争。在斗争中，维、汉族人民结下了战斗的友谊。起义最后由于叛徒的出卖而失败。剧中的很多情节，就是根据这次起义的真人真事写成的，一些人物如艾买提、赵正奎、夏克尔、阿依木汗、依明、夏依提等，都是真实姓名。

我所以要写这个剧本，一方面是想要歌颂在新疆近代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农民斗争，另一方面是想要歌颂在新疆人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中，维、汉族人民结成的战斗友谊。当然，由于

剧本初稿是在狱中写成的，在写作的当时，还有一种对盛世才反动统治的仇恨和希望人民起来推翻这个反动统治的愿望。

《火》剧是五幕七场话剧，1961年10月最初在《天山》发表，取名《战斗中血的友谊》。1962年，《剧本》月刊又以同名发表，受到文艺界许多同志的热情关心和鼓励。中央有关领导如陈毅同志等对该剧的上演也十分关心，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中央实验话剧院、新疆自治区话剧团先后上演过。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话剧单行本，改名《火焰山的怒吼》，书前附有我写的序言《扑不灭的星火》。

我本来还计划写几部戏，总名为《扑不灭的星火》，准备以帖木儿事件为第一部，把《火焰山的怒吼》作为第二部，把在党领导下取得的革命胜利作为第三部。但由于日常工作繁忙，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遭受到诬陷和迫害，致使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根据本人口述，任一飞记录整理。原载
《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编后记

《新疆五十年》定稿之后，我曾请示过包老，定居北京的三十年，能不能写出来，作为回忆录的续集。包老说，原先的一些资料和日记，“文革”中都被抄走，“文革”中写的交待也都不在手中，加以记忆力越来越差，许多事情都回想不起来了。回忆录能写下去固然好，怕是难以如愿了。1985年春，领导上派我赴京时，我又问起包老，能不能将解放后的文字编一个集子，回忆录无法续写，有个集子留给后人，也算对后半生的经历有个交代。包老很谦逊，没有答应。

像包老这样一位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人，只有前半生的回忆录，许多人都觉得有些缺憾。尤其是他的后半生，一面从事繁忙的政务工作，一面从事历史和语言的学术研究、从事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他的许多作品，无论当时、目前还是将来，都具有重要意义，他的一些学术观点，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前年，在两位离休了的老领导——谷苞同志和乌依古尔·沙依然同志的提议和鼓励下，我利用年底赴京之便，再次向包老提出编一个选集的前议，并提出了两种选编方案。这时，包老才同意并授权我将他的文章选一些，编一个选集。

整个选编工作是在去年进行的，在进行的过程中，获悉邓力群同志慨然允诺为包老的选集撰写一篇序言，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鞭策和鼓舞。我约请阿德江同志和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张国杰同志协助我工作，他们用很多时间钻到图书馆里，翻检报刊杂志，编出目录，待我初选后又联系复印，后来由我从大量的复印资料中选出若干。大体上是学术文章全收，其它选收；近年

发表的多收，早先的酌收。最后又在谷苞同志的指导下，对选入的全部文章作了必要的技术上的删订。

如今，《包尔汉选集》的编选工作大体就绪。但愿在它出版发行之后，每一个关心新疆、关心新疆各族人民和关心包老的读者，对于包老在解放后的一段工作和生活，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虽然读起来不如回忆录那样连贯。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编选工作有种种不能尽如人意之处，敬祈读者见谅。

纪 大 榕

1988年1月于新疆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